炎黄春秋

第 7 期

2013年

为“人性论”平反

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

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3/7 (总第256期)

目　录

亲历记

1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李定中
5 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 …………尹曙生
10 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 …………季　音
15 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 …………杜婉华

一家言

20 为“人性论”平反 …………张显扬
26 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黄　钟

沉思录

35 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郭　建
40 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 …………穆广仁

往事录

43 安康文革第一劫 …………曾志信 何吉祥 邹服生 姚维荣
46 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鄢增华
50 我的“罪行” …………王蔼民

求实篇

51 “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石名岗

争鸣录

55 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高层争论 …………陈祖甲
58 也谈北上与西进 …………冯亚光

怀人篇

63 “离经不叛道”的经济学家何伟 …………张素芳

春秋笔

68 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 …………王菁珩
73 诸暨：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 …………何心乐

品书斋

77 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 …………陈启民
84 读《千古兴亡》 …………杨美艳

海外事

86 震撼世界的“布拉格之春” …………刘天白

编读窗

83 读者来信摘登 …………吴式超

顾　问
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编委会(以姓氏笔画为序)
方　实　王俊义　冯　健　冯其庸　卢跃刚
曲润海　何　方　吴　象　吴明瑜　宋木文
张文彬　张岂之　张希清　张荣华　张惠卿
杜　光　杜导正(召集人)　李一蠡　李大同
李冰封　李宝光　李维民　杨天石　杨奎松
杨继绳(副召集人)　沈志华　苏双碧　陈　敏
邵燕祥　周瑞金　金冲及　胡德华　赵德润
保育钧　钟沛璋　郭道晖　资中筠　凌　云
展　江　徐小岩　秦　晖　袁　鹰　袁伟时
高　放　高尚全　陶斯亮　钱理群　章诒和
萧蔚彬　韩　钢　董　健　曾彦修　鲁　谆
雷　颐　魏久明

社 委 会 杜导正(主任)　吴　思(副主任)　杨继绳
李　晨　徐庆全　胡竞成　张晓鸥
社　　长 杜导正
法定代表人　常务社长　吴　思
副 社 长 杨继绳　李　晨
社长助理 胡竞成　张晓鸥　杜明明

总 编 辑 吴　思
副总编辑 徐庆全
执行主编 洪振快　黄　钟

总 经 理 李　晨
副总经理兼网络总监　张晓鸥
财务总监 胡竞成
发 行 部 孔　屏(主任)
办 公 室 王海印(主任)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理事长 莊其環　李　琼
秘 书 长 吴　思
副秘书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010-68083211)
步凌云(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010-8586916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100045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编辑部邮箱　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
电　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部　010—68534879
68523512
68539058
财务部　010—68525374
办公室　010—68522852(兼传真)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单本定价　8元　**全年定价**　96元

本期：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杨继绳　　校对　英　进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惹祸

○ 李定中

王若水在他的著作中谈到他上书毛泽东惹出大祸一事，我是亲历者。这件事的导火线是《人民日报》1972年10月14日发表了一整版的批判林彪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3篇文章。其中两篇是我约稿和初步加工的，另一篇短文则是我动手写的。现在我写出本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并介绍王若水同志有关的深刻分析，以纪念这位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

（一）林彪叛逃摔死后的形势回顾

1970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与毛以及与“四人帮”的矛盾就日益尖锐了。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得知毛泽东已平安返京，就在夜间匆忙乘机出逃，并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荒野。当时毛亲自发动与领导，并得到林紧跟配合的“文化大革命”已进行了5年多，各地各单位群众派性对立并未消除，不参与不干活的“逍遥派”却不断增多。整个社会特别是城市无政府主义泛滥，国民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为了稳住局面，毛离不开周恩来这个“大管家”。他要周主持政治局的日常工作，并兼管《人民日报》。周利用毛对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态度有所松动的时机，尽力改善他们的处境，有的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有的病体得到了必要的治疗，有的安排了工作。当时《人民日报》一直在张春桥特别是姚文元的直接控制之下，新的领导班子还未成立。周要当时工作能力很差但主持《人民日报》日常工作的张、姚的亲信鲁瑛报个老中青三结合的“业务领导小组”名单（也叫“看大样名单”）。后来鲁瑛报的名单中除了他自己与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外，还有吴冷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林彪摔死后他写信给毛，表示要改正自己过去的错误，毛批示说：“欢迎进步”。）与王若水。王若水从此分管报社编辑部的理论部、文艺部的业务工作。

“文革”开始后，周恩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抵制、控制“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减轻无政府主义泛滥的危害。在批林整风中，他反复强调了要批林的极“左”思潮及其重要表现的无政府主义。1972年8月，周对外交部干部讲话中又讲要批极“左”。他强调“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9月他又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这些精神传到《人民日报》后，大家都很振奋。当时理论部负责人是胡绩伟同志。他原是《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辑，这时刚解放不久，负责理论部的工作。在他主持下，理论部拟定了一批组稿计划，其中批林彪的极“左”以及无政府主义，就成为重点选题了。

（二）《人民日报》发表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

当时我在理论部工作。根据上述精神，我组织了两篇批林彪无政府主义的论文。一篇是约请黑龙江省革委会写作班子写的；另一篇是约请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班子写的。

1972年3月，国务院业务组负责同志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专门约黑龙江同志汇报有关情况。当时黑龙江无政府主义严重，许多厂矿，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大厂矿，毫无纪律可言。职工无故缺勤，生产无人管理。华、李、余当场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因此，黑龙江省革委会写作班子也很乐意写篇反无政府主义的论文。论文写出后，作者署名“龙岩”交给了我。河北省革委会写作班子不久前曾给我们写过稿子，质量不错。这次约请他们就批判无政府主义问题再写一篇，他们也很乐意。不久稿子送来，标题为《坚持无

王若水（1926-2002）

产阶级铁的纪律》。两篇约稿我编好后交给胡绩伟同志，他审阅后同意见报。于是我又将这两篇稿子交给王若水同志审阅处理。

王若水认为龙岩的文章经过再加工修改，可作为头条来用。当时我送去龙岩的文章题目是《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王若水同意这个尖锐的题目，我对他建议，为了见报顺利，题目也可改得平淡一些。他点点头，表示由他相机处理。不久，王若水将龙岩的文章作了很大的修改，对另一文章改动不多。他通知我上述两篇文章准备拼一整版，但还有约一千字左右的空白，需要马上写出一篇千字文拼成整版。当时他手头有个介绍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的小册子，希望我尽快翻阅一下，写个介绍这个小册子的书评。于是，我抓紧时间将书评写出交给他了。当时，张、姚恰好离京去沪了。王若水抓住这个不用送姚审查的时机，次日即10月14日，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就见报了。

（三）王若水上书毛泽东，状告张、姚

这个版见报后，马上出现两种相反的反应。一方面有9个省级报纸进行了转载，另有8家省报陆续发表了自己组织的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但另一方面，马上受到上海《文汇报》的攻击。当时先由上海写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朱永嘉出面打电话给鲁瑛，询问作者是谁？谁组织的？送给什么人看过？他还说："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接着上海《文汇报》的《文汇情况》312期于11月4日刊登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说工人们纷纷指责这个版特别是龙岩的文章在否定"文化大革命"，在批判工人群众！同时，姚文元给报社看大样小组打招呼，要他们讨论《文汇情况》反映的意见。当问到姚文元自己的意见时，他却谎称自己还没有看龙岩的文章！

报社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4次，没有讨论出什么结果。姚文元又要他们学习中央文件，以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这倒使王若水安下心来仔细翻阅了一批中央文件。他发现由毛泽东批发的批林整风文件就多次提到反无政府主义。仅从1972年算起，就有26、31、38、42号文件提到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其中第42号文件是11月4号发出的，比《人民日报》那个版还晚了20天。不仅如此，姚文元当时直接主持的《红旗》杂志，在11月的11期中，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内容。这样，王若水认为"左"的根子就在张、姚身上，他们这样干，也是在与周恩来作对，但周恩来却无法纠正他们的错误。看来只有上书毛泽东才会解决问题了。于是，他决心上书毛泽东反映有关问题。12月5日，他通过《人民日报》机要交通人员把信发了出去。

他当时也感到这事多少有些风险，为不至于连累别人，他这封信并未给任何人看，并且把信的底稿也烧了。后来他回忆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姚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还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提法。我说这情况有些像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

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我不相信《文汇报》说的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是中央精神，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会这么快。

我表示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

我还引了张、姚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姚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指出姚的话和《红旗》杂志上的话并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不懂为什么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四）上书结果，竟惹出一场大祸

王若水上书四天后，于12月9日晚得到通知，要他与看大样小组的鲁瑛、吴冷西及报社军宣队负责人一起去人民大会堂等待首长接见。晚8点半，周恩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汪东兴共同接见了他们，直到凌晨2点，接见才结束。

接见开始时，周恩来先讲话。周态度温和，他说：“收到了王若水同志的信，主席批给政治局办。还有《人民日报》理论部同志的信，都联系到你提出的问题，就是左右问题。”后来，王若水还听说毛说了这样的话：“我认识这个王若水，他写过《桌子的哲学》；他在信里提出批极‘左’思潮，我看也不高明。”看来周这次接见时，就是本着毛这句话的精神，把王若水提出的问题，当作认识问题来对待的。

周接着解释了他8月的讲话，说那是讲外交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至于林的路线，那是右到极点了，不能说还有左的方面。但是，中央报纸上出现过这种提法，我们没有指出，我们也要负责。周还说：“现在批林是要批他的反革命，要揭露他。这是我们的主要矛头。”

周的说法显得缺乏说服力。看来是他言不由衷，讲的不是自己的真心话。他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局面。

周最后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张春桥说：“他们讲吧。”于是，王若水接着讲了如下的意思：林彪搞阴谋政变，这是极右。但他欺骗性大，流毒广的是他搞极“左”。这才需要从理论上深入批判，以肃清影响。王还回顾1967年主席曾讲过要批判极“左”思潮，深挖“5·16”反革命集团，也讲过批无政府主义。中央文件上也多次讲到批极“左”。王还念了中央1972年第31号文件说的“‘5·16’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子还是林彪。”王还指出，当时形势可以说“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当然右的也要注意。实际情况是“左”的危害大。只有认真纠正了“左”的错误才能很好地反对右的错误。

王讲话后，江青发言。她说：“你组织的这篇鬼文章矛头是对着群众！林彪的路线是极右。至于某一时期利用形‘左’实右，那同时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客观上起了挑拨作用。拿着总理在某一场合的讲话来利用。好像春桥、文元和总理闹别扭。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政治局常委对立起来呢？”

张春桥接着讲了话。他说：“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的意见可大了！我为了维护党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讲。”张在这里公然撒谎。“四人帮”垮台后，上海工人揭发：以《文汇报》名义召开的那个工人座谈会，完全是张授意的，调子也是他定的。

张春桥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说：“王若水同志的信引用了我说的一大段话。其实那些话也不是我的。……”王听到这句话时非常吃惊，并感到糟了！知道自己批到毛泽东头上了！

江和张的发言显然也出乎周的意料之外。后来王若水了解到就在他上书给毛泽东的第二天，12月6日，毛就约见了江青，要她将王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谈话。12月15日和16日，周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了王的信。12月17日周和张、姚到毛那里开会。毛说："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

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说："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见《周恩来年谱》）可是，张春桥所转述的毛的那些话，说到不要批"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等等，却一直未向周透露过。王若水估计毛有一次对张、姚讲话，时间当在8月8日张、姚去《人民日报》之前，内容涉及他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空头政治"。毛的这个精神只是江、张、姚对外保密的"独家新闻"，不仅《人民日报》不知道，连周恩来也被蒙在鼓里了。

接见快结束时，江青说："这个版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在全国起了干扰批林的作用。"她交代《人民日报》"要展开一场大批判，就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是非。通过这场批判，《人民日报》领导班子可能出来了。"

果然，《人民日报》在鲁瑛主持下，在一位原副总编积极配合下，一场以王若水与理论部为重点的大揭发、大批判猛烈展开了。王若水被免职，被迫到干校一边劳动一边检查交代。胡绩伟也被迫离职，前往当时邓小平主持日常工作的国务院新成立的政治研究室工作了。我被迫离开理论部到干校当工作人员，长期在干校劳动。不仅如此，从此，周恩来也被迫放弃对《人民日报》的领导，使《人民日报》完全掌握在张、姚手中了。

王若水曾概述自己对毛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尊敬走向信仰、崇拜，再到怀疑和批判的过程。这次接见可以说是从崇拜到怀疑和批判的转折点。在这次会前，王若水一直把江青与张、姚分开来看，只认为张、姚不好，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了，更重要的是，王还认为毛是信任周的，认为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会后王认识到自己错了。王若水说："真正使我震惊和痛苦的是认识到这样一个无情的事实：毛泽东不喜欢周恩来。这是我第一次在近处观察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他们几个明显地在压周恩来，而周恩来处于守势，因为他们后面站着毛泽东。"王若水认识到毛内心是对周不放心的，毛看出周实际上对"文化大革命"是不同意的。因此，毛正想做的事就是找机会整周。这次王若水的上书正好提供了一个整周的机会。王认为"毛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是周恩来"。王若水并预见到毛将进一步整周，周的厄运难免了。果然，不久后毛即批周对美国犯了什么"投降主义"的错误，接着毛又授意江青大搞"评法批儒"批周公，对周极尽影射攻击之能事。直到周含冤去世。

关于毛为什么反对批林彪的极"左"思潮与无政府主义，王若水经过进一步思索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后来我才醒悟，批'左'会产生一连串问题：如果林彪的路线是极'左'，那么有没有一条与之对立的毛的正确路线呢？这两条路线是如何斗争的呢？'九大'是哪条路线的胜利呢？这样一来，不仅会批到江、张、姚头上，甚至难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会有损毛泽东这面旗帜。即使主张批'左'的人（如我们），主观上丝毫没有这种企图，但是事情的发展会有它本身的逻辑，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比如批'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空头政治'，这些错误难道只属于林彪吗？"所以，这样批林，势必会批到毛的头上。这才是毛反对批林的极"左"的原因。

王若水认为真正的悲剧人物是周恩来。这个悲剧是由周的性格和他所受的党的教育造成的。他既要忠于毛，严格遵守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又真心实意地想为民族为人民做一番事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这两方面是矛盾的，周却想兼顾。王若水本来想在《新发现的毛泽东》这一巨著中写一章《周恩来的悲剧》，但因癌症精力不济终未写出。直到他弥留之际，还在念叨这个问题。■

（作者为《人民日报》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声明

为保护本刊和作者权益，凡转载本刊文章，请注明"转自《炎黄春秋》"。

我参加落实民族政策的经历

○ 尹曙生

1961年7月11日至8月4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召开了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会议“着重地讨论了一九五八年以来西北的牧区工作和牧区人民公社工作，同时，也认真地检查了一九五八年以来，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情况，初步总结了这一方面的主要经验，研究了改进工作的方针和办法”（《纪要》原文）。会议通过了《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纪要》，并上报中共中央。同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会议纪要（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

这个《纪要》是在“左”倾思想指导下，以“大跃进”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充分肯定1958年以来西北牧区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肯定在牧区全面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伟大、正确（见《纪要》原文），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牧区工作中“许多地方忽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民族问题，不认真贯彻执行甚至违背党的民族政策。最突出、最严重的是青、甘藏区（主要是牧区）的问题”；“目前在一部分地区，灾情特别严重，群众生活异常困难……必须全力以赴，救灾救人”；过去三年“有一些同志不以平等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不关心少数民族的疾苦，侵犯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强迫改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信任和歧视少数民族”；“近两、三年来，在青、甘藏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中存在许多问题，犯了严重错误，遭受了重大损失，造成了很大困难”。会议纪要决定放宽政策，恢复和发展牧业生产，改善牧民生活，并做了许多具体规定；调整民族宗教政策，开放被强行关闭的部分寺院，允许信教群众进行宗教活动；在一定范围内纠正平叛、镇反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坚决实行‘四不’政策，凡是（叛乱）来降的，不论罪恶大小，一律不杀、不关、不判、不斗”；“不要在社会上乱戴‘叛乱家属’的帽子，以利争取和分化敌人”；不得“强迫改革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犯有严重错误，屡教不改的干部，要给与适当处分，以资教育”；平反冤假错案，当务之急是立即释放那些还被无辜关押在看守所里的人犯。《纪要》明确要求：“错捕了的要释放，错戴叛乱帽子的要摘掉；已经死亡的也要恢复名誉，摘掉帽子。要根据划清界限，从宽处理的精神，继续清理释放一批在押人犯，以分化瓦解敌人，安定社会秩序”。（以上引文都来自《纪要》）

中共中央在批语中说：“《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很好，中央同意这个纪要中拟定的方针和办法，请西北局发各级党委贯彻执行”；“西北的经验，首先是青、甘藏区的经验再一次证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忽视民族问题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有的地方不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甚至在工作中违反这些政策，更会给工作造成损失”；“在我国各民族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中民族问题这一重要因素决不允许忽视，如果忽视这个问题，不做好少数民族工作，在工作中不坚决地按照民族政策办事，就会使我们犯错误”。

中央批语虽然指出西北地区牧区1958年到1960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忽视民族问题，不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犯了错误，造成了损失，但是没有指出这些错误是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不问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要求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使牧业区和农业区一样，在两三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才是错误发生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中央仍然坚信“三面红旗”伟大正确，所以不可能指出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而西北地区不仅仅是牧区，农业区在“大跃进”年代同样遭到劫难，人民群众同样死伤惨重，其损

失绝不亚于牧区。

青海和甘肃是西北地区贯彻执行《纪要》的两个重点省，而这两个省的牧区又是贯彻执行的重点地区。

青海省牧区有六个州，即玉树、果洛、海南、黄南、海北、海西，其土地面积约占全省土地面积85%，是以藏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地区，当时藏族人口约47万多人，约占全省总人口244万的19.6%，占牧区总人口95万的49%。除海西、海北两个州没有发生叛乱外，其他四个州，即玉树、果洛、海南、黄南四个州从1958年春开始发生叛乱，到1959年被基本平息。然而在整个青海省，无论是农业区还是牧业区，无论是发生过叛乱的地方还是没有发生过叛乱的地方，由于以高锋为首的青海省委，以极"左"的专政手段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在青海"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步并作一步走，在两、三年时间内，彻底完成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完成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果造成全省工农牧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几十万人被饿死、整死，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很多，需要释放的无罪人员很多。我在《炎黄春秋》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做了些介绍，但着重谈的是农业区情况，对牧业区情况，着墨较少，不少读者来信来电话，希望我对牧业区情况作些介绍。本文就青海省牧区贯彻执行《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纠正政法、公安工作极"左"路线、释放无罪被关押人员情况，再做些介绍。

1958年至1960年青海省公安机关在"公安工作大跃进"口号指引下，为推动"大跃进"运动的顺利进行，任意捕捉那些反对、抵制的人和潜在反对、抵制的人，三年共逮捕63064人，拘留6157人，判管制9918人，集训39419人，共计108558，占全省总人口244万的4.4%。其中在牧区共逮捕44532人，占牧区总人口95万的4.66%；农业区和西宁市共逮捕18263人，占总人口153万的1.2%。牧业区捕人比例大大高于农业区。

再看看牧区四个发生过叛乱的州的捕人统计数字：玉树州1958年至1960年（下同）共逮捕15402人，占三年该州平均人口100535人的15.3%；果洛州逮捕6593人，占三年平均人口75176人的8.77%；海南州共逮捕9682人，占三年平均人口202552人的4.78%；黄南州逮捕7866人，占三年平均人口148977的5.28%。

下面举几个典型例子。玉树州玉树县红旗公社新寨生产队，三年共逮捕176人，占人口总数的36.3%；海南州贵南县嘛多公社，共有697户人家，1360名成年人，被逮捕关押404人，占总人口的16.7%，占成年人口的29.4%，涉及292户人家，占总户数的41%；其中一户捕一人的有228户，一户捕二人以上的有70户，有4户全家捕光。海南州兴海县夏塘公社沙乃亥生产队，共有41户105人，共划"四类分子"和"反革命社会基础"91人，占总人口的86.4%；玉树州的一些地方，成年男性被捕光，以致公安机关去捕人时，当地群众要求"留下人种"。

以宗教改革的名义，干涉宗教信仰自由，大量寺庙被解体，宗教人员被还俗。"从1958年8月开始，到11月底统计，全省859座喇嘛寺庙，有731座解体；54281名宗教人员，有24613名还俗参加生产"（见青海省代表杜华安，在1958年12月18日于北京召开的第11次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的发言。见《民族工作文件汇编》第2辑）。

全省共有以民族、宗教上层人物为主的统战对象2290名，被逮捕、法办的1572人，占69%。海南州有统战对象257名，逮捕227名，占87%；没有发生叛乱的海西州，有统战对象69名，被逮捕58名，占86%；玉树州昂谦县有统战对象52人，除7人外逃，其余45人全部被逮捕。

那么逮捕这些人对不对呢？截止到1961年10月，玉树州根据省委的要求进行整风，自查自纠，第一批复查了2524个被捕的人，认为捕错了的2246人，占被捕人总数的89.2%，认为基本正确的203人，占8%，其他75人是可捕可不捕的（按中央规定：可捕可不捕的，捕了就是犯错误——笔者注）。海南州第一批复查了794人，错的494人，占62.1%，由于是自查自纠，不可能准确，省委工作组到海南州进行抽查，结果捕、判正确的，不到2%。黄南州泽库县1958年逮捕的517人，省委检查组去检查，发现有465人没有任何档案材料，有材料的只有52人，而有材料的人，材料字数最多的不超过100个字，有的只有几个字，比如犯罪嫌疑人姓名之后写着："叛匪""坏蛋""思

想反动”等等,没有具体罪行。该州被逮捕的人,90%以上都是不应该逮捕的。

被拘、捕的人,由于受到刑讯逼供和饥饿的折磨,大量死亡。玉树州看守所三年死亡在押人员4219人,占在押总人数7501人的56.2%;死亡集训人员1641人,占集训人员总数3354人的48.5%;黄南州公安处看守所仅1960年死亡在押人员212人,占当年在押人员385人的55.1%。果洛州1960年死亡集训人员698人,占总集训人员2251人的24%。

以上这些具体数据都是各地在整风中自查自纠统计出来的,重点地区还经过省复查小组核实无误,是准确、可靠的,只少不多。

乱戴“四类分子”“叛匪”帽子。三年中全省戴“反动分子”“坏分子”帽子的3.4万人,另有74091人被划为“反革命社会基础”,两项合计10.8万人,占总人口的4.4%.

那些还被关押在看守所、集训队里的人,到了1961年夏、秋,每天都还有人死亡,所以《纪要》要求以“从宽处理精神,继续清理释放一批在押人犯”的要求是非常重要的,人命关天,不得不这样做。根据《纪要》的要求,迅速释放无罪在押人员就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所以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西北各省尤其是捕人最多的青海、甘肃省委高度重视,立即行动,不得有误,并派出检查组到甘肃、青海督促检查。于是,西北局第一个检查组一行三人,于1961年12月9日到达青海。青海省委办公厅和省委政法组各派一人,省公安厅派一人,和西北局3人共6人组成联合检查组到玉树、果洛两个重点州去实地检查督促释放无罪在押人员情况。

笔者参加工作时间不长,没有工作经验,被指派参加检查组,诚惶诚恐。但是,听了联合检查组组长——中共西北局政法组组长张之轩的话,我就不担心了。他说,“临走前,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交代我们,你们此行任务很简单:就是督促放人,不能再让无罪的人死在看守所、监狱里。所以我们到这两个州去检查,程序简单,就是到这两个州公安机关看守所、拘留所去实地查看还关了多少人?为什么不释放?回答不出来的,就叫他们放人;谁顶着不办的,人在看守所、拘留所死亡的,就要他负责任”。

检查组12月12日从西宁出发,第一站到玉树州。车行至果洛州玛多县的花石峡,由于小雪路滑,只好在那里过夜。除两辆吉普车司机外,检查组6人全部出现高原反应,呕吐、头痛。兵站站长(当地没有旅馆,我们住在兵站)告诉我们,花石峡在这一带气候最恶劣,你们没有在高原生活过的人,不应该在这里住宿;玉树州结古镇海拔比这里低,到那里你们就没事了。第二天凌晨,我们吃了兵站准备的半生不熟的面条(高原,水温不到90摄氏度就开了),匆匆上路。下午到达玉树州首府结古镇。经过医生治疗,晚上睡了个好觉,我们6个人才逐步恢复正常状态。

玉树州委政法领导小组和公安处负责人向检察组汇报了贯彻执行西北局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精神(《纪要》在中央没有转发前,由于形势紧迫,青海省委以电报形式发各个州、县委,贯彻执行)情况,尤其是中共青海省委于8月23日发出的《无条件释放在押无罪人员的紧急通知》后,全州已经释放713名在押人员,州看守所目前只剩下12名在押人员,都是因为现行刑事犯罪而被关押;现在全州6个县在押人员不到100人,有两个县看守所没有在押人员。听了汇报,在范处长带领下,检查组到州看守所实地察看,确实只有12名在押人员,经了解其中有5人因为饥饿而偷宰生产队牛1头、羊4只,偷盗酥油3斤,证据确凿,本人供认不讳。检查组讨论后认为,他们是在吃不饱饭、生活极端困难情况下干的,罪行轻微,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况且他们都有病(饥饿造成),不释放就有可能死在看守所,应立即释放。州公安处处长当即命令看守所所长放人,并指示在释放前让他们吃顿饱饭,负责送到家。还有7人因抢劫、斗殴致伤致残他人,后果比较严重,没有立即释放,等待法院判决;但是检查组要看守所想办法让他们吃饱饭,有病的进行治疗,逐步恢复健康,实在不行的,保外就医,总的要求是不能让他们死在看守所。玉树县看守所也在结古镇,已经没有在押人员,检查组没有去检查,但是范处长还是不放心,要我单独去看一下,我随县公安局局长到看守所察看,确实没有在押人员。

我们只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完成了玉树州、玉树县的检查,比想象的要顺利得多。当晚,州委书记沈××要请检查组吃饭,被张之轩组长婉

拒。因为在西宁他听了省公安厅和省委政法小组汇报，玉树州这几年捕人这么多，和这位书记坚决执行“左”倾路线有关。1958年、1959年在他的高压下该州公安机关滥捕滥抓人，且大量死在看守所、拘留所、集训队，报告送给他，身为州委书记，他置若罔闻；到了1960年4月，他仍不接受教训，不释放被抓捕的人，还继续下令抓人，当州政法小组根据省里下达的捕人指标任务，提出全州全年计划逮捕1500-2000人，计划报上来时，他大笔一挥改为5000-7000人，并批示说：“你们可不受此数字限制”；该州昂谦县1960年计划捕人170人，他批示“太右倾”，结果全年逮捕了760人，几乎全是错捕。

检查组看到玉树州公安机关贯彻《纪要》立即释放被关押无罪人员的态度比较端正，措施比较得力，效果比较显著，原打算到该州其他几个县察看的计划取消了，经商量，直接到捕人比例最多、人民来信最多的果洛州久治县实地察看。经过三天的艰苦跋涉，我们来到和四川阿坝州接壤的果洛州久治县。

这个在1958年只有5918人的小县，三年中被逮捕1540人，占总人口的27%。其中死在监狱、看守所的848人，死亡率高达57%。根据《第一次西北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精神，无罪被关押需要立即释放的就有862人。可是大多数人已经死在看守所或劳改队，实际被释放的只有437人，到12月23日，全部释放。1961年12月19日，为落实省委“无条件释放在押无罪人员的紧急通知”精神，该县康赛尔公社（捕人比例最高的公社）通知被捕人员家属说，今天州公安处将该公社被捕人员全部释放，要家属到公社迎接亲人。所以被捕人员亲属早早来到公社，接亲人回家。可是当州公安处载人的大卡车到达时，从车上下来的在押人员只有27人，还有157名在押人员被告之已经在劳改农场和看守所死亡时，没有接到亲人的家属，当场放声大哭。当晚这些人在家中点上酥油灯，祈祷亡人。检查组全体人员到康赛尔公社亲眼目睹了这悲惨的一幕。检查工作结束后，检查组在给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写的报告中有一节的标题是：“接亲人被告之已经死亡，在家中点酥油灯祈祷亡人”。人死在劳改农场、工厂、看守所、拘留所、集训队、劳教所，开始还通知家属，以后人死多了，基本上不通知家属，而他们的家属、亲人还在不断写信，嘱咐他们“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日释放，回家团聚”。

这个县情况如此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县以县委书记郭××为首的县委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所谓宗教改革，执行“左”倾路线到了疯狂的程度。他不断指示公安机关抓人、抓人、再抓人。他说：“把坏人抓完了，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公安局人少，抽不出人下乡捕人，他就要公社对那些反对公社化、反对将牛羊无条件没收归公社所有、反对吃食堂的人，“私通叛匪”的人和小偷小摸的人，进行正常宗教活动的人，统统抓起来，没有人押送，怎么办？他出主意说：“叫他们自投罗网，找借口要他们给公社送信到公安局，给他记工分，在信上写着‘见信捕人’几个字，到了公安局就把他扣下关起来。”采取他设计的这种办法公安局就逮捕了76人。检查组到县公安局看守所看到一个名叫洛尔加的在押人员，问公安局长此人犯何罪，为什么不放？局长说不知道他怎么被关进来的，我们准备明天就放他。张之轩问洛尔加，你为什么被关在这里？他说，去年8月，公社叫我给食堂送牛粪，我去迟了，社长叫我给公社送信到公安局，信送到后，公安局把我扣下，不让回去。问他信送给谁了，他说是公安局的赵秘书。我们找到赵秘书，他说他记不得了。我们要他打开办公桌抽屉，找到了那封“见信捕人”的条子。同时找到5张同样的条子。通过这5张条子，查找到该县白玉公社三大队一个名叫邓山的人，因为偷了公社食堂一副羊下水，公社决定逮捕他，对他说，你把这封信送到公安局，就不追究你偷盗的事。邓山因为孩子病了，自己无法到县里去，只好要他的好朋友周朴加代替他送信。周朴加到县公安局，将信交给赵秘书，赵秘书见信上写着“见信捕人”几个字，将他关到看守所里。周朴加反复说他是替邓山送信，赵秘书没有理他，结果三个月不到，死在看守所。张之轩问赵秘书：被你关押起来的这些人，你问过他们都犯了什么罪吗？答：我只要看到“见信捕人”几个字，就把他关起来，至于他有罪没罪不是我的事，那是预审员的事。我是在执行领导指示。

郭书记不仅指示公安机关滥抓滥捕无辜群众，

自己也身体力行，他亲自批示逮捕的就有几十人。

1960年3月21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郭书记在会上批评县直机关干部精神萎靡不振，消极怠工，对克服暂时困难信心不足；自由主义思想严重，随意议论、诽谤领导，挑拨同志之间关系。……郭书记越说越激动，突然使劲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大声喊道（真名、真姓、真实场景——笔者注）：公安局长陈希贵来了吗？陈希贵吓了一跳，迅速站起来，忐忑不安地回答道：郭书记，我在这里。

郭书记说：我们县委机关有的干部思想作风不正，自由主义思想严重，必须严厉惩处，才能刹住这股歪风，像县委宣传部的王万成就是这样的人。现在我命令你马上把他抓起来！

王万成不知所措，惊恐万状。陈希贵来到他跟前，对他说：你都听到了吧？请跟我走！

王万成站起来对郭说：郭书记，我冤枉啊！

郭书记大声呵斥：你冤枉？我才冤枉呢！陈希贵，把他带走！

就这样，王万成被关进了县公安局看守所，直到省委紧急通知下达，才被释放。

王万成被关在看守所一年多时间，没有被提审过，因为公安局也不知道他犯了何罪，又不敢问郭书记。

王万成被释放后回到宣传部，向同事打听自己为啥被捕。一位同事告诉他，你是不是说过，郭书记文化水平太低，把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念成中心耳火耳火为人民服务？

王万成恍然大悟。他确实说过此话，被人打小报告给郭书记。他自认倒霉。

一次郭书记到县牧场视察，厂长招待喝酥油奶茶。他将自己骑的马交给牧工曲乎介牵去喂饲料。喂好后，曲乎介感到郭书记的马膘肥体壮，在好奇心的驱使下骑上马，学着郭书记骑马的模样，被郭看见，喝令他下马，斥责曲乎介冒充县委领导，招摇撞骗，当即命令随他同到牧场的公安局长陈希贵将他捆起来，骑马牵着他到公安局，关进看守所，罪名是“冒充县委领导，招摇撞骗”。后被法院判三年徒刑。

县公安局看守所根据郭书记的指示逮捕的两个叛乱归降人员，被刑讯逼供，奄奄一息。陈希贵向他报告说这两个人有病，快要死了，公安局准备释放。郭书记说：放回去他要叛乱怎么办？不如把他勒死算了。结果这两个人被民警用绳索活活勒死。

1960年4月，郭书记有病住县医院，要护士肖××给他按摩，要她给他手淫，她非常害怕，但是又不能拒绝；她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寻求摆脱的办法，谁知被传出去。郭书记恼羞成怒，说她“侮辱领导，血口喷人”，将她开除公职、开除团籍，劳动教养2年。

以郭××为首的久治县委，在人口极端稀少、居住十分分散、纯少数民族地区，不管青红皂白，竭尽全力推行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完全忽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盲目蛮干，到了疯狂的地步。1958年9月5日全县强行建立175个牧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到10月10日又将175个牧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立6个人民公社，强令全县牧民1587户、5123人全部加入人民公社，将牧民私有牲畜79092头非法无偿剥夺，成为公社集体财产，到1961年牲畜减少近一半，牧民生活陷入绝境，不得不靠挖野菜、蕨麻和打猎维持生命。1959年4月，全县强迫办公共食堂104所。牧民居住十分分散，多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固定地址，强迫吃食堂后，有的牧民为了吃顿饭，不得不骑马跑几十公里。他下令将全县12座寺院关闭，将喇嘛赶出去开荒种地，还从河南省引进2000多人移民办农场，到1960年，全县开荒112477亩，实际播种53950亩，其中种粮食48950亩，1960年粮食总产量16.85万斤，平均亩产3.44公斤，连种子也不够，而久治县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很多开荒种粮的人惨死在草原，包括1000多个河南移民。

检查组离开久治县不久，郭××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到1962年春、夏，青海牧区的州、县委主要领导和政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领导，大多数被撤销职务，有的受到党纪、政纪和司法处分，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被关押的无辜人员，包括在农场劳改的1.8万多人得到释放。这是贯彻执行《纪要》的主要成绩之一，值得记载。■

（作者为安徽省公安厅原常务副厅长，曾在青海省公安厅工作）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

○ 季 音

一

1958年深秋11月初的一天，我戴着沉重的右派帽子，黯然离开北京，前往河北唐山柏各庄农场接受改造。车站上只有我的弟弟谷斯涌冒着政治风险前来给我送行，带来了亲人的一丝温暖。

和我同行的还有三人，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胡骑，摄影记者高粮，文艺部编辑杨建中（蓝翎）。蓝翎是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事件中受到最高领导人表扬的“两个小人物”之一，如今也沦为右派。在胡骑之前，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也划为右派，已先期来到四分场。国际部主任黄操良在划为右派后自杀。反右斗争使人民日报国际部受到重创。

在反右斗争中，人民日报共打出右派32人，先后分两批送往柏各庄农场。第一批人数多，已分到四分场。我们4人是第二批，被分送到三分场。

柏各庄农场（现为唐海县所在地），是在渤海湾边一大片盐碱荒地上开辟出来的一个大国营农场，主要种植水稻，工人大都是附近的农民。反右派斗争后，这儿成了一个收容右派改造的场所。三分场共有右派28人，大体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央直属单位的，如中央办公厅、中央事务管理局、中央监察委员会、中苏友协、人民日报社等。另一部分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人数较多，其中很有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所谓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陈企霞，因《电影的锣鼓》一文获罪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他也是《文艺报》副主编），著名翻译家与作家萧乾。另外还有《文艺报》支部书记杨犁，《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唐达成，《文艺报》编辑组组长侯敏泽。看来《文艺报》的头头们是一锅端了。其他还有些文艺圈里的人，如《人民文学》小说组组长杜黎均，《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中国作协《文学遗产》编辑何寿亭，《新观察》杂志编辑黄沙等。文艺部门显然是反右重点。陈企霞是兄弟俩双双被划为右派，他的胞弟陈适五是新华社驻国外记者，他被分配在四分场。兄弟俩同在柏各庄农场，却见不到面。

我来到三分场以后，见到的第一个熟人是《中苏友好报》总编辑廖经天。他原是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后来调到中苏友协。他矮矮的个子，圆圆的脸，一副忠厚相，为人随和亲切，年纪比我大。我们在报社就相识，两人一见面，都感到有些意外。一次，背地里我俩聊了起来。他问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我简略告诉他，我的主要“罪行”是“为右派鸣不平”。那是1957年反右高潮时，我在新华社一本“内参”上看到一篇报道，揭露南京大学讲师刘敬坤的右派嘴脸，上面说的大多不是事实。刘曾在南京市委和我一起工作过，是个老实厚道的知识分子，一心啃书本做学问，南京地下党党员。怎么把他说得不像个人样呢？我对边上几个人说：“我们要吸取肃反时整错人的教训，在反右中再不能整错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还说：“我要找熟人去了解一下这件事。”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旁边的一位记者悄悄地把我的话记在小本子上，在1958年反右派“补课”的关键时刻，他拿出小本子当众检举。为右派说话不也是右派吗？于是我被戴上了帽子

廖经天听了我的介绍，深深叹了口气：“真是不可思议！”

“老廖，你是怎么回事呀？”我问廖经天。

他连连摇头：“不说它了，还不是说我反苏吗！”原来他无意中对人说了苏联红军1945年进入东北后拆走我国工厂机器设备等一些事。其实这些全系事实。我听了他的话，也感到难过。廖经天是个老同志，抗日战争年代就在晋察冀敌

后做新闻工作。一句真话，就犯了“反苏”大罪。《中苏友好报》还有三个中层领导干部李林、欧阳惠和赵洛生，也因类似的罪名，划为右派，来到三分场改造。

二

到三分场没几天，我就脱下鞋袜，走进一片茫茫无际的水稻田。

农场主要是大面积种植水稻，这是一项很累的重活，从翻地开始，播种，插秧，放水，收割，外加还要不断挖水渠，这活在农村都是青壮年干的。我从小没干过农活，笨手笨脚，干了一天活，傍晚收工回宿舍，倒在床上不能动弹，连饭也不想吃。萧乾、廖经天这些岁数较大的人，他们在劳动中更是狼狈，特别是萧乾，更是多次出洋相。有一回，我们下地割稻子，干这活儿要手脚麻利，不停地弯腰。萧乾已年过五旬，身体又胖，干了没多久实在支持不住，他干脆就跪在地里，一把一把地割，边上的工人看了既好笑，又同情。

干完活回到队上，紧急集合，开会批判萧乾。少数几个积极分子指着萧乾大声斥责：“你瞧，边上的工人哪一个像你这样干活的？你是丑化工人阶级的形象！”

农场干部大概也看出，我们有些人不是偷懒，而是实在干不了重活。于是，他们抽调了一些体弱的人，到割完稻子后的地里去拾散落在地上的稻穗。按说这是一项轻活，在农村里是妇女们干的。其实，轻活真干起来并不轻松，整天不断地弯腰，一天下来，腰仿佛断了似的，收工时一拐一拐地勉强走回住地。

我不但干农活不熟练，还有个致命弱点，就是干活动作缓慢，不麻利，这使我吃了不少苦头。有一次，农场的队长把我们带到一大片刚割完稻子的地里，让我们拾稻穗。队长说，今天拾稻穗要开展一次竞赛，每人拾一整块地，看谁拾得又快又干净。在农场改造期间，谁不想在竞赛中夺取优胜？这可是关系改造前途的。于是，人们都争着往前赶。同伴高粮拾得最快，他简直像小跑似的往前冲，把大伙远远甩在后面，拾的稻穗堆起了一大堆。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向前追，腰酸腿疼难以忍受，好像要断了似的，也不敢喘口气，可是这样依然赶不上，眼看距离越拉越大，远远地掉到了后边。同伴中多数人都已经把自己那块地的稻穗拾完了，正坐在地头擦汗休息，我还呼哧呼哧地在那里拾个不停，足足比他们晚了好几分钟才算拾完。走到地头，人都不能动弹了。队长走来逐块地验收，我原以为冠军肯定是拾得最快最多、手脚麻利的高粮，不料队长指出，最先拾完稻穗的人，快固然快，可是拾得不干净，地里丢下了许多稻穗，光图快不顾质量，不能表扬，还要受批评。我拾的这块地，慢是慢了些，但拾得干净，没有发现丢弃的稻穗，应当受到表扬。这使我感到意外。

秋收结束，农场进入农闲时期。右派是来改造的，当然不能休息。一天，队长派我和蓝翎去海边抓螃蟹。这渤海湾边的盐碱地沟里盛产螃蟹，秋风起，蟹儿肥，正是捕蟹的黄金季节。来到一个水塘边，我俩脱光衣服，跳进冰冷的水里，我在水塘里瞎摸了半天，一只也没摸到，只弄得浑身泥水。心灵手巧的蓝翎，却不断把摸到的活螃蟹往岸上扔。他告诉我，抓螃蟹不必用手去摸，只要用脚踩就行，一踩到脚下有硬硬的一团，就把它抓起来扔到岸上，准是只大螃蟹，这家伙在泥水里不会蜇人，不用害怕。我照着蓝翎说的去做，果然灵验。约莫干了两三个小时，我俩各背

作者与蒋元椿(左)合影于1985年

了一麻袋螃蟹，回到了场部。

我在农场还种过菜，饲养过牲口，以及其他各种农活。在饲养牲口的日子里，一个人整日与骡马为伍，倒也清静，摆脱了人与人之间整日相互监督的紧张感。

三

体力劳动固然很辛苦，但流汗不流血。残酷无情的思想斗争，却让人从心底里流血。

农场分工管理我们的干部，在会上宣布："你们到农场来是改造思想的，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对罪行必须心服口服。"他给我们规定了几项制度，一个星期开几次学习会，汇报思想，向组织交心。月末要作改造小结。到年终作改造总结。要相互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反改造的言行要展开毫不留情的斗争。这样，干了一天活，已经劳累不堪，工人们都呼呼地睡了，我们还得硬撑着开会，尽管眼皮子打架，也不敢打瞌睡。后来，为了开会方便，农场干脆把右派集中住在一起。

三分场28个右派，被编成一个大组，设一个大组长，由《文艺报》的侯敏泽担任。下边又分成几个小组。从此，我们在劳动之余，就没完没了地开会，在会上翻来覆去地交代自己的"罪行"，挖掘思想根源，务必做到对"罪行"心服口服，大彻大悟，以便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实，这是在演戏，谁都心里明白，对硬扣子头上的帽子，要做到心服口服，是根本办不到的。可是面对无理可讲的现实，谁敢当面顶撞？于是，不得不做出沉痛状，拐弯抹角地进行自我批评。也有少数几个表现积极的人，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仿佛他从娘肚子里生出来就姓"右"。我听了心中大不以为然，这分明说的是假话。但继而一想，觉得这些人也情有可原，在那种政治高压下，为了早日跳出右派苦海，说几句假话可以理解。

我是属于口服心不服一类。我家里老小一大家人，都在眼巴巴地盼望我能早日改造好回家，我在这里硬顶能行吗？可是要我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心里实在痛苦。我打从16岁入党以来，何曾有过一丝反党之心？每次写个人改造总结，我就拐弯抹角地做文章，左一个"错误"，右一个"错误"，就是绕开了"右派"这个刺人的字眼，我打从心眼里不愿意自己给自己扣上这顶帽子。我的文字游戏瞒不过明眼人，农场干部对我说："你在劳动中表现还不错，比较老实，思想改造进步不大。"

蓝翎和我是心相通的。他因一篇未曾发表的短杂文，被人揭发，打成右派，他怎么也想不通。有一次他偷偷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抛却壮志，面对蒿莱。
"洗心革面，脱骨换胎"。
夹紧尾巴，头颅莫抬。
忍辱负重，早求轮回。

我看了赶紧塞进口袋，对他说："别胡来，这东西给人拿走，你又得挨批。"他笑笑。这个文学青年在苦难日子里，还留着几分幽默。他说得对，面对现实，只能"夹紧尾巴做人"。

农场干部说，我们中间有三类人，一类是对罪行口服心服，第二类是口服心不服，第三类是口不服心也不服。大概是听了积极分子的汇报，指出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个人在改造中表现最差。他严厉地宣布，对右派的改造不能和平地进行，对反改造言行一定要坚决批判和斗争。

于是，激烈的思想斗争展开了。会议一个接着一个，批斗对象主要是陈企霞、钟惦棐、萧乾三人。

陈企霞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大帽子坚决不接受，拒绝作任何检查。写思想汇报之类草草交卷。看来他是横下一条心，对粗暴的批判顶到底了。开会时，批判别人他很少发言，只是一味地抽叶子烟。当批判到他时，他的态度很微妙，杨犁、唐达成、唐因等这些老部下发言，虽然对方嗓门很大，他大都沉默，听得出来，对方说的尽是些不痛不痒的空话，是应付而已。当听到积极分子发言揭批，他就火冒三丈，一一痛加驳斥。有一次，他嘲讽积极分子："同是右派，相煎何太急！"公然抗拒改造，这还了得！暴风雨般的批判又掀起了。他又抽起叶子烟，不作回答。

钟惦棐对反右时指责他《电影的锣鼓》一文是大毒草，也坚决不同意，他在写改造小结一类文字时，从不提这件事。他是陕北鲁艺的高材生，写得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农场常调他去写宣传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类的大标语，因此参加劳动较少。积极分子就抓住这件事大肆批判，说他利用写标语逃避劳动，实质是抗拒改造。钟惦棐

反驳道："那让你们去写标语吧，我不怕劳动。"批判归批判，后来农场还是调他去写标语。

陈企霞和钟惦棐都是来自延安的老同志，他们在原则问题面前寸步不让的硬骨头精神，着实使我佩服，我自愧自己不能做到他们那样。

对萧乾的批判是另一回事。其实，萧乾并没有像陈企霞那样硬顶，相反，他在会上一再表示"服罪"。平时寡言少语，小心谨慎，唯恐出错。比如有时我们在闲聊天，他却捧着一本英语大词典，坐在炕头啃书本，一言不发。没有什么尖端材料可以批判萧乾，积极分子就抓住些鸡毛蒜皮的事，上纲上线，大加挞伐。萧乾在他的回忆录《我这两辈子》的一篇文章里，回忆了他在农场里受到的一次批判：他的夫人文洁若十分关心老伴在农场的健康，有一次在信里附了一小包灰锰氧药粉，要萧乾在吃生果菜时用来消毒，免得生病。萧乾在拆信时不小心，小纸包掉到了地上，被一个积极分子拾到，报告了队部。于是又招来一场批判，农场干部痛斥他"是资产阶级劣根性的表现"。萧乾在文章里说："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服，难道无产阶级就该让蛔虫在体内自由繁殖？在批斗时，能保持缄默，或说上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敷衍，就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季音在发言时却说：我看灰锰氧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在劳动中避免生病，也是为了省得给组织上添麻烦。一席话说得那位复员军人组长（即农场干部）也哑口无言了。"

还有一次批判萧乾劳动中怕苦怕累，贪生怕死，也与我有关。那时，农场里建起了一个菜园子，把几个体力弱的人调到菜园劳动。菜园里的菜，经常在夜间被附近的农民偷割光。为此，场里搭起了一个草棚子，派专人守夜看管。场部决定派萧乾去干。老萧年岁大，在漫漫黑夜里一个人蹲在野外草棚中，万一遇到情况，叫他如何对付？为此他紧张得整夜睡不着，他来找我说，自己委实干不了这活。我当时是管菜园小组副组长，觉得他说得在理，就同意他不去，另派了一个年轻些的人。

不料，这件事传到队部，队长十分恼火，就对萧乾组织了一场批斗。我这个小组副组长，也因此被撤了职。不过最后还是没有让萧乾去菜园值夜班。

萧乾是个老实厚道人，他不会投机钻营、见风使舵那一套，也许是被整怕了，有时候他表现得过分软弱与自卑。有的积极分子也就"雷公打豆腐"，捡软的欺，在欺侮别人中显示自己改造得好，由此使萧乾凭空多吃了不少苦头。我们睡的是一个大通铺，老萧夜间起来小便，黑暗中摸索，不小心摸到了一个积极分子的头，那人破口大骂，萧乾连连说"对不起"，从此萧老晚上不喝水，得了肾病。我有时劝萧老，不要凡事过于软弱，该争的还得争，他听了只是苦笑。

萧乾得到改正后，送给我几本新著作，在一本书上写了这样一段热情的话："感谢您在柏各庄给我的温暖——在北极得到的温暖，特别难忘，特别可贵。"其实，我在农场里只是对这位长辈表示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同情，谈不上什么温暖。况且，我那时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有助于他？我只是觉得，在那个人性被扭曲的年代，作为一个正常人，总不能丢弃了应有的一点人性，别人要把你打倒，你怎么能自己打倒自己？

四

三分场有些右派的所谓"罪行"，听了真让人哭笑不得。有个姓姜的女青年，二十岁左右年纪，长得清秀，她丈夫是个小军官，新婚不久即长期分居两地。一天，某报上刊登出一幅漫画，画的是牛郎和织女天各一方，中间隔着一条天河，不能相聚。这画得到许多人称赞。小姜看了连连说好，对人说："两地分居问题就该解决嘛。"有人汇报到领导那里。一个军属，居然攻击部队制造两地分居！这不是反军吗？就此打成右派。在会上，让小姜交代"罪行"，小姜竟呜呜地抽泣起来，会再也开不下去。

天天无休止地开会，你批我，我批你，大伙其实心里都明白，强加在头上的罪名都是"莫须有"。那时，农场里要我们唱一支歌《社会主义好》，歌里有一句词："右派分子想反也反不了！"唱到这里，心不觉往下沉，难道我们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吗？

1959年9月，北京传来消息。为庆祝国庆10周年，9月14日，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

出了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犯特赦的建议。9月17日，第二届人大常委会第9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的建议。接着，国家主席刘少奇颁布了特赦令。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同一天，即9月17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决定》。《决定》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在庆祝国庆10周年的时候，摘掉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决定》规定："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的数目，以控制在全国右派分子的10%左右为好。"

听到了上述两个消息，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摘帽子有了希望，固然可喜。可是把摘帽子与特赦战犯并列，作为庆祝国庆10周年实施宽大政策的一项内容，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令人费解的是，反右派斗争的时候，划右派、处理右派，都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也没有一份由毛泽东署名的党的正式文件，为何右派摘帽子不但党发出正式《决定》，而且特别指出，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这是怎么一回事？也许是想告诉人们，伟大领袖对右派还是宽大为怀的。

柏各庄农场很快落实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国庆节后不久，在农场的大礼堂召开大会，传达党中央指示的精神，宣布给第一批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农场领导在主席台上滔滔不绝地训话，大意是说右派只要改造好了就有前途。我坐在台下的一角，聆听高论，心情平静。对"罪行"口服心不服，这正是党中央文件中指出的不能摘帽的规定之一，何况又在农场思想斗争中同情重点批判对象，因此我早料到摘帽与我无缘，我不抱任何奢望。

大会最后宣布全农场10人摘帽子，其中三分场2人。在宣读名单时，都在摘帽者名字后边加上了"同志"二字，说明他们已回到人民行列。摘帽的代表最后上台发言，表示衷心感谢党的宽大，今后一定要继续努力改造，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

也许是三分场摘帽的人太少，几个月后，三分场又单独召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再给两个右派分子摘帽子。三分场共有右派28人，这样摘帽子的就有4人，正好七分之一，符合中央规定的比例。

摘帽依然没有我的份。蓝翎苦笑着对我说："咱们慢慢熬吧，反面教员总还得有人当。"

我原以为将在农场无限期地改造下去。事出我的意料，1961年6月的一天，报社突然发来通知，调我回北京。在柏各庄农场改造了两年半，接到回去的通知，心中既高兴，又不免惆怅，因为右派帽子依然戴在头上，颇有"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但能回到家中和妻儿团聚，毕竟让人兴奋。

我背着简单的行囊，来到唐山火车站，只见车站内外空荡荡的，什么食品都买不到，连开水也喝不上，幸亏我从农场带来几个馒头，只好啃着干馒头充饥。周围一派萧瑟的景象告诉我，祖国处在严重的困难中。

回到报社后，党委告诉我，仍回编辑部工作，分配到工商部做编辑。大约一个月后，工商部主任张沛给我打电话说："季音同志，组织上要我通知你，你从即日起摘掉右派帽子。"一下听到了久违的"同志"二字，心头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辛酸。

1978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55号文件，批准统战部、公安部的报告，同意对错划右派复查改正。9月17日，党中央又作出批示，指出"对于过去错划的人，尽管时隔多年，也要坚持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人民日报党委很快落实中央的批示，全社32个右派全部改正。我是1958年8月被划为右派的，1978年11月得到改正，正好20年。20年前，划我为右派的主要"罪行"是："站在右派分子刘敬坤立场上，不信任党对刘的揭发和批判。"人民日报农村部党支部这次在我的改正决议里，对此予以彻底否定，说："季音同志对新华社内参刊登刘敬坤的材料，认为其中有些情况与事实不符，想到南大党委了解情况，向华东局负责人反映有关情况，是党纪所允许的，也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不能说这样做是不信任党组织。"一个道理极其简单的问题，反右积极分子们却揪住不放，上纲上线，把我打倒在地，整整折磨了我20年，还使我全家受牵连。今日回顾这段往事，真是百感交集。（刘敬坤的冤案也于1978年得到改正。）

岁月流逝，五十五年过去了。当年共患难的陈企霞、廖经天、萧乾、钟惦棐、唐达成、杨犁、蓝翎……都已先后仙逝。我深深怀念他们。■

（作者为人民日报社原干部部主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北京林学院清查“五一六”

○ 杜婉华

1969年末，我作为北京林学院教师，被集合到云南，卷入了耗时数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

从昆明搭乘卡车，弯弯绕绕了两个白天，辗转到了深山老林的清水江林业局。它位于茂密云松林的半山腰，山下是传说有麻风病人的苗族村寨。我们住在用木板搭建的女生宿舍里，生活了几个月。不到夏天，分散在各个林场的全体师生就集中到丽江去了。原因是来了中央文件：要彻底清查“五一六”。到达丽江后，数千人的林院师生分散居住，指挥部就设在丽江的四方街（现在成为旅游胜地），师生分散在丽江的学校和各村老乡家。我和部分学生住在新二中学校。林院已经由驻云南下关市的解放军11师掌管，学生要求毕业分配工作，于是军宣队和“可靠”干部组合的指挥部，找一些与林业沾边儿的单位，把大批学生胡乱安置打发走了。留校的学生都是文革中的显要人物，如“东方红公社”的头头们，还有紧跟他们的造反群众，再加上全部教师，这些就是搞运动的清查对象。

学生走了以后，新二中剩下的教工也就百人左右，指挥部正对清查“五一六”的对象排查摸底，负责指挥我们这群人的是被军宣队选中的可靠教工。春节过后，气氛逐渐紧张了。清查“五一六”运动开始，军宣队认为搞清楚“五一六”组织，应该先拿造反派的“东方红公社”的头目做头靶。为了给运动的开场造声势，租个礼堂，集合丽江全体人员开大会。会场气氛严肃，原来挺窝囊的所谓“保皇派”此时扬眉吐气了，选定的女将在讲台上一站，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把王××带上来。这位掌权仅几个月，还没过够掌大权瘾的王××垂着头被连拉带扯地推上台，女将厉声问他“五一六”的事，发展了多少组织？干了哪些勾当，从实交代，否则群众绝不会轻饶你。王某嘴里嘟嘟囔囔，似乎全部否定。于是又叫另一个嫌疑人宋某上来，这位却不肯移动半步，他站起来大声否认说：我不是“五一六”。一个文革中顺风摇摆的孟某主动跳过去抓他的头发，要扯他上台，惹怒了他，回头抗议：“你干吗这样使劲，把我的头发都抓掉了。”宋某就是不肯上台。当天虽然没抓住“五一六”的一根毛，光喊“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之类的口号，但军宣队并不失望，他们各个击破，希望有辉煌战果出现。

“摇煤球”摇出了第一个“五一六”

大会之后，忽然刮来一股风，要批判“先验论”，说这是陈伯达的反动理论，此时陈伯达已经倒台，这种哲学意义的名词，被文革各个阶段不同口号搞昏了脑袋的群众，谁也说不清它的内含。一位平日最不爱出头露面的何教师，不知他的哪根神经搭错了线，公开说了一句“不是‘五一六’，偏说是‘五一六’，就是‘先验论’。”军宣队正发愁该从谁下手呢，居然有送上门来的开场宝贝，太好了。马上下令开批斗会，批他宣传“先验论”，说他反对毛主席。

批斗何教员的方式别开生面，不知是哪位高人的创新，诨名叫“摇煤球”。何教师站在中央，批斗他的人围在四周（这时我还算革命群众，也是围他的一分子），主持人先宣布他的罪状：“反对批‘先验论’的人，一定是‘五一六’，大家一定要狠斗，要他交代。”说完就用劲将他推向对方，还没等他站稳，对方又把他推到另一边，还问他，“你这个‘五一六’，说谁是‘先验论’？”何教师自始至终就一句话，“不是‘五一六’，你们说是‘五一六’，就是‘先验论’”。这样推来推去，直到大伙儿都推得累了，死心眼的何教师要虚脱了。主持会的人这才庄严宣布：“这个‘五一六’分子认罪态度相当恶劣，要向军宣队汇报后再处置。”就

这样新二中的第一个“五一六”分子被摇出来了。

最老实善良的人被逼死了

新二中的清查“五一六”声势步步扩大，人人自危，说话都倍加小心。运动后期冷下来后，女教师小白对我详细说了她的经历：刚开始，还没人找她说“五一六”的事，她就去白桦村看望好友王秀琴，王问小白：“你对我说实话，你加入‘五一六’了吗？”白说：“我没有。”王就特别强调：“你不是‘五一六’，我就放心了，你可不能胡说冤枉别人。”白答应她绝不胡说。可是她刚回到新二中，军宣队的人就找她谈话，说已经有人揭发她了，让她认清形势，老实交代，争取早日解脱罪名。她记得王秀琴的嘱咐，就咬住牙根不肯胡说，但是她从北京来云南带着三岁的小儿子，专案组把她带出宿舍，找个空房每日早中晚三次批斗，把她小儿子独自关在宿舍。每次批斗完，她回宿舍都忍不住地哭出声来，小儿子更是哭个没完。小白说，她担心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斗下去，儿子出了毛病怎么办？既然有人胡说我，我也只能胡说了，于是承认自己是“五一六”成员，还揭发了别人，这样，对她总算过了关，可是她万万没有想到，批斗她的人，同时也去白桦村找王秀琴，谎说小白什么都说了，也包括你王秀琴，最好你主动说清你们“五一六”的活动，你不说更增加小白的罪行。王听了这话犹如霹雷炸响，她为人本分老实，在文革中除了开大会跟着喊口号，参加集体对毛泽东、林彪的请示汇报表演外，连大字报都没兴趣看。说她是“五一六”，当然她要矢口否认，还不忘替小白申冤。军宣队对她日夜连番批斗，给她挂牌子游街，组织几个人敲锣，一路喊：“打到‘五一六’分子王秀琴！”“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住在丽江的纳西族老乡哪见过这等阵势，围观的人都呆了，一些不懂事的半大小伙子带头向她吐口水、扔石头。王秀琴痛不欲生地回家，而她的丈夫不仅对她没有半点同情安慰，反而不住嘴地骂她，说他自己的脸面都被老婆丢光了，训她不该包庇小白，逼她马上去专案组交代罪行，不然他会立即声明和他断绝夫妻关系。街上羞辱和家人冷漠的双重打击，使王秀琴心身冷透，终于用半瓶敌敌畏结束了她不到40岁的生命。

大突破：“三停，两罢，一炸”

林学院有一部分师生，住在距离新二中较远的玉龙雪山边的师范学院。一次我在四方街遇见了熟人孙老师，她和我谈起师范学院清查“五一六”的情况。说揪出了罗某某，罪名重大，每天日夜连续批斗，不让他睡觉。参加批斗的群众也很疲倦，大家都挺有意见，不敢公开说，都在下面嘀咕。

我很奇怪，我和罗有过接触，他思想比较活跃，会木工。搬迁时他用教室的桌椅做成的小柜，很精巧。当时几乎全校男人都把学校的桌椅、床板、床架、木门等拆掉做成箱子或其他家具，毁坏公物又不是他一个人，他能有什么大罪？孙说：“你糊涂了，现在是请查‘五一六’阶级敌人，军宣队才不管毁坏公物的事哪。说老罗勾结校外‘五一六’分子搞‘三停，两罢，一炸’。”我问：“这是什么意思？”孙说：“就是北京的‘五一六’分子要让首都停水，停电，停煤气。罢工，罢市。再炸中南海。”

我惊呆了，老罗能干这种大事？北京的“五一六”会有这样大的能量？太让人不可思议了。我再问：老罗怎么说？孙说：“老罗被批斗了三天，听说能站着睡觉了，他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这人爱在家干活儿，极少出门。怎么能和校外‘五一六’合谋呢？太离谱了。”当时我和孙老师都处于箭在弦上的位置，谁也不敢随便议论军宣队的是非，我只能满腹狐疑，叹息地和她分手。

老罗这事情如何结尾的呢？听说是老罗的老婆后来想起来了，问老罗，你被专案组抄走的小本子里提到“中南海”了吗？她的话猛然提醒老罗，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老罗为住在林学院的外地红卫兵做服务工作。老罗每天把红卫兵的活动都记在本子里，来林院的红卫兵分成两派，其中一派就叫“中南海战斗队”。两派打嘴仗，另一派就攻击“中南海战斗队”，说要砸了“中南海战斗队”，老罗把“砸”误写成了“炸”，还简化了“中南海战斗队”全名，只写“中南海”。另一派还说要控制自来水截门。不让“中南海战斗队”喝水。老罗就简写成他们要“停水”，这基本

上就是“三停，两罢，一炸”的源头。老罗笔记本上的记录简化语太多，误导了他人。军宣队立功心切，以为抓住了大案要案，充分发挥了想象力，既然“停水”必定“停电”，既然要“炸中南海”，必定以“罢工罢市”威胁。

在劫难逃，我也成了“五一六”

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拖了半年多了，我在林院的文革中算是著名的活跃分子，可是清查指挥部没动我，没被列为第一批清查对象，我自认为是我不够加入“五一六”的资格。因为文革刚开始那会儿，不少学生响应号召，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工作和生活作风问题（林学院的学生多数来自农村，比较纯朴，学校从没出现过像清华北大那样斗“黑帮”的胡闹行为），但大字报也被派来的工作组污蔑为反革命活动，把部分学生当做另类。我是去国务院接待站为学生鸣不平的唯一教师。事后，在开全院批斗反革命分子大会上，我又是被吼上台的唯一女教师，发言人把我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反右运动时受处分的“丑事”全抖搂出来。为此我绝食两天。一周后对我监管放松了，我就外出听在北大的弟弟说，江青、陈伯达去北大为造反学生鼓劲打气，称他们为革命小将，向他们致敬。我感到了形势有变化，就贴出唯一的一张为林学院的“反革命师生”翻案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轰动了林院，我又成了千夫所指的对象。直到8月份工作组撤了以后，我才被认可为名副其实的造反派。可惜好景不长，就在这时出事了，我的父母被他们工厂的红卫兵扣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驱逐到农村，我去父亲工厂交涉，与工厂的工人红卫兵发生争执，很快，工厂来人在林院贴出醒目的大字报，说我为“反动”父亲鸣冤叫屈，消融了我头上正牌造反派的光环。以致造反派学生成立“东方红公社”时，拒绝我成为社员。

“我连‘东方红公社’社员都不是，机密的‘五一六’组织能要我吗？”我想得太美了，当所有人的交代材料凑在一起成了一团乱麻时，清查指挥部还指望从我这里找到线头呢。

住在新二中的教工只占林院教工的一部分，这里所有的文革活跃人物基本上都成了“五一六”分子，负责的军宣队李营长非常得意，他先召集少数人开会授意，然后公开讲话：“每个人开始都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七斗八斗之后全都承认了。”他讲话时有意把我名字顺了一下，说要争取主动，把自己过去的罪恶活动说清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他的讲话使多数群众对我脸色立即由晴转阴了，我肯定自己在劫难逃，心里七上八下。为了自救，我花了半天时间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竹筒倒豆子全写出来了，还特意写信给军宣队总头王师长。这封信王师长看到了没有，我没法知道，但至少被军宣队李营长看到了，他立即召开了新二中全体教工大会，批斗我一个人。主持会的是军宣队依靠的积极分子邱教师，她翻来覆去吼叫的内容是：“你什么时候参加的‘五一六’？你和哪个人联系？”“我不是‘五一六’。”“你要老实交代，已有人揭发你了。”“他揭发我什么了？”“你做什么你自己清楚，我们能告诉你吗？”“我又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做了什么错事。”“你敢说你没犯错误？你太不老实了。”

有人过来按我的脖子，强迫我低头，他手松开，我又扬起来，他再使劲按，直到我站不稳，摔倒。又重复了两次类似的这套问答，这人就使劲扯我的头发，又一次摔到地上。邱教师再问：“你和‘东方红公社’的头目×××、×××、×××都有哪些交往？他们和你都说些什么话？你要老实交代。”说实在的，我对这些“东方红公社”的头头还是很尊重的。他们最早贴大字报揭发院领导的错误，很得人心，是有勇气的正当举措。但是我基本不和他们往来，我们之间有个鸿沟，就是不同的家庭出身，他们都是红彤彤的贫下中农子弟。在他们面前，我有自卑心理。我回答：“我和他们极少接触，我也不能捕风捉影的胡说一气，这样做不是搅乱了批清运动的大方向吗？”立即有革命群众大喝：“你不交代和他们的关系，还挺有理了？”那只大手又一次抓我头发，使我再一次摔在地上。爬起来后，我摸着被抓疼的头皮，十分害怕群众再动手，苦苦思索，到底什么是“五一六”罪行呢？哪个环节上我和主流唱了反调呢？我想起一件事，成立革委会的时候，要三结合，结合哪位干部是关键，掌权的“东方红公社”大力扶持姓单的院长进革委会，就开大会捏

造罪名，把姓许的书记说成是特务，在会下，我提出了疑问，为她抱不平。也许这就是“五一六”的错误罪行？于是，我回答：“我有错误，我不该保许书记。其实我并不了解她……”我这句话还没说完，立即被主持人厉声打断，“你真狡猾，谁让你说这个，说你是怎样反周总理的！”天啊！总算明白了，原来“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太不可思议了，为什么林学院的造反派要反总理？记得1966年秋，周恩来总理穿军服，戴红卫兵袖章，召集首都大专院校所有被污蔑为反革命的造反派开会。他表示支持首都造反派新成立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当时在场群众那个激动啊！从心底涌出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什么原因造反派忽然又翻了脸，反对他老人家？“我从来没想过反总理，我干吗要反总理？我也不相信林学院的‘五一六’是反总理的！”我正申辩，感到我的后脚跟被重重踢了一下，我晃了几下。回头看，踢我的人居然是军宣队李营长。

第二天一早李营长就命令我搬到楼下原来住军宣队的单人间。搬进单人间后，门从外面锁上，从此不能自由活动，开始了被监管隔离的日子。每天革命群众全吃完饭后，才有专人给我开门放风20分钟，抓紧时间到厨房买已冷了的剩饭菜，打水，上厕所。晚上就被叫到楼上，接受三堂会审。坐中间的邱教师，以前和我有过交往，她想加入共产党，曾向我交过心，说她揭发了她丈夫的反动言论致使她丈夫被处分，她想得到我的认同，赞赏她靠拢党，立场坚定。我没接茬，因为我不愿为迎合她而假惺惺地说违心话。她现在被军宣队重用，有了入党的阶梯。坐右边的是杨教师，她是为孩子，我能理解。每次去房间提审我的是何教师，他绷着脸命令我上楼接受批斗，装出与我界限分明的严肃形象。我想他定是被“摇煤球”摇怕了，只好不再说清查“五一六”是“先验论”了。邱是主要审判官，态度严厉，不过声音再大也没新词儿，只有干巴巴的“你要老实交代”，“别想蒙混过关”等，我站着，还要被迫弯腰低头。何教师从不问话，专管按我的头。双方问答是车轱辘话来回转，我稍有顶撞，就说我不老实，我必须表面忍受着。日复一日，除少数几天，一直这样延续，真不知何时终了。

厕所里的信息使我改变了初衷

我唯一能接触其他人的机会，是去公共厕所。一次遇见刘教工，她虽然也是“东方红公社”社员，但她贫农出身自然能得到优惠待遇。她对我说：“你不要再扛了，安××（学生，‘东方红公社’骨干，负责发展组织工作）开始不承认，说他分工组织，但从来没发展过‘五一六’。一吓唬他，他又说‘东方红公社’社员和老造反派都是‘五一六’，这不是把你也交出来了。”我想，她们说得也有道理，既然小安同学把所有运动初期造反的都说成是“五一六”，我硬挺着也挺不住，老吃剩饭菜，肠胃病发作，腿疼，实在受不了精神身体双重折磨，干脆也胡说吧！说完暂时没事了，我也可以过上正常生活。于是我马上写了交代材料。

我想随便编一些蒙混过去，实在糊涂。我挨整的时间已经是运动后期，众多七荤八素的交代材料已经让运动领导头昏脑涨，我这不咸不淡的所谓交代，对他们没有任何价值。正好我发生了一件事，却让新二中的李营长有了峰回路转的快感。

写信上告加重了“罪行”

这件事就是我给家人写的信，我的丈夫老杨已经恢复了工作，过去说他是“假党员”之类莫须有的帽子已经摘掉。他一贯是“驯服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我放弃了给他写信的念头，就写给自己的弟弟，信中提到林学院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已经搞了8个月了，没有结论，现在又说我是“五一六”骨干，希望他把云南11师搞扩大化的情况反映给中央。

我的信没寄出去，反被军宣队扣下，李营长在信上用红笔加了按语：此信思想极反动，建议召集全院教师开批斗大会狠批。可是当时我不知道，原来，我趁上厕所扔进信箱的信，已经被专管邮件的人特意挑出来，向上级献礼了。

估计李营长向王师长请示全院批斗我的事，碰了软钉子。师长掌控全局，经过大量乱七八糟的假交代，他或许已感觉到林学院的清查“五一六”运动多半是冤假错案。但是中央文革没发话，他只能硬挺着。他没及时回复李营长。李营长却不甘心，他

一方面等着师长的回复，同时放口风，要开全体大会批斗我，我在女厕所里听到了风声，非常紧张，该怎么办？到了晚上，趁看管我的同事不注意，我不假思索，从后窗跳了出去，我要去下关市找上级军部告状。我绕过几个山后。停下了脚步。不对，现在可能还没走出村子，以我的体力再走一段路多半就走不动了，也没力量返回来了。难道要睡在夜间低温的旷野里？即使在野外睡了，真能再走两天或是三天安全地来到下关军部的驻地吗？我没有介绍信，谁能接待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更别指望有人听我的告状。我白跑这一趟，人们会认为我愚蠢透顶，我将成为全院的笑料。算了，还是回去接受狂风暴雨的袭击吧！幸好我回去了，看管我的是很熟的同事，他正焦急的四处找我，他害怕失职，军宣队会把他也算做“五一六”的。我敷衍他几句，外逃的事只字未提。

两个小纸条险些惹出大祸

我就像被判死刑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问斩，每天焦虑不安，夜夜失眠。估计李营长也在焦急地等待上级的回复。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前一时期我被通知搬家，换了个房间。换房间时却丢掉了两个很小的纸条，要批斗我的前夕，小条被积极分子捡到，上交给李营长。那天我要睡觉了，忽然李营长怒气冲冲跑来，让我解释两个纸条，一个写“不交”，另一个写“交假的”。很明显这能证明“五一六”分子在搞攻守同盟。他凶神恶煞，咆哮不止：“说！你这条子打算交给谁？你和谁接头？”唉！我被监管，能和谁接头呢。这两个小纸条是我犹豫不决的时候，自己写小条抓阄决定自己的去向。李营长很失望，还是召开了教工大会，对我进行批斗。

这种日子又拖了好久。直到林彪外逃摔死的消息传到“五一六”分子的耳朵里。才认为出头的日子到了。果然，第二天关押我的门敞开了，再也没人锁门了。

清查“五一六”运动最后是不了了之，可是全国挨整的人以千万计，整死的人以百万计。文革打倒的干部落实了政策，大多官复原职，至今没有人为挨整的群众说一句公道话。■

（作者杜婉华，时年81岁）

（责任编辑　杨继绳）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Hearing Aids

服务热线：010-84608877

声望听力
www.sw-tl.com

请认准西门子听力集团授权证书 西门子听力仪器（苏州）有限公司

数字型耳背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字2010第2460986号 数字型耳内式助听器 苏食药监械 （准） 字2010第2460987号

注：请认准西门子标识/请详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苏医械广审（文）第2010040048号

为“人性论”平反

○ 张显扬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我在“人性论”三个字上加了引号，是为了表示这个概念和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有所不同。

欧洲哲学史上的人性论，作为以人为“本体”而建构起来的哲学体系，例如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有翻译为“人本学”的），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没有人可以给它做什么判决，戴什么帽子，因而不存在平反摘帽问题。

我这里说的“人性论”，是我们中国的“土特产”，它并不是成型的哲学体系，也没有试图去解释历史。它只是一个很朴素的看法，一个观点，认为人是有人性的，文学艺术离不开人性。就是这么一个观点，却遭到严厉批判，被戴上“抽象人性论”的帽子。结果，“人性”便成了有害而危险的东西，致使人们谈“人性”色变，唯恐避之不及。谁要是不小心和人性沾上边，那就非遭殃不可，甚至要搭上身家性命。这就成了一个案子，而且至今没有平反。

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其意义不只是解决文艺界一个历史冤案；更重要的，是要澄清一系列理论是非。贯彻“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这些理论是非是非澄清不可的。

究竟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

按理说，这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人有人性，物有物性，无论欧洲还是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哲学家们就已经讲清楚了。所谓“人性”，无非是人之为人的本性，包括饮食男女、喜怒哀乐、趋利避害，珍惜生命，等等，只要是人，就有这种本性。但是，几十年来在我国理论界，却流行着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口头上也承认有“人性这种东西”，实际上却用偷梁换柱的手法，予以彻底否定，认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抽象肯定，具体否定，而且气势逼人。在这种强词夺理的诡辩的淫威下，这个土生土长、尚未成型的可怜的“人性论”便一命呜呼。

人们一直把这种观点，当作人性问题上的经典之论，奉为圭臬，讲人性论，没有不加引用的。实际上，这种观点除了表明在人性问题上坚持极“左”的“阶级论”，即绝对化了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立场，否定有“人性这种东西”而外，没有说出任何道理。

“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人性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既有具体的人性，又有抽象的人性。人性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大而言之，有三个层次，即个别、特殊和一般。以友情、爱情、亲情为例，这是任何（正常）人都有的感情，属于人性一般。这些感情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则既和个人禀赋（先天的遗传因素，后天的经历和文化素养，等等）有关，又和个人所属的不同社会群体（种族、民族、国家、阶级、宗教、地域，甚至行业，等等）的特点有关。和个人禀赋相联系的人性，是人性的个别。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点相联系的人性，是人性的特殊。人性的个别是具体的，也就是“具体的人性”。人性的特殊和人性的一般，都是抽象的，也就是“抽象的人性”；二者的区别在于抽象的程度不同：人性的特殊是从特定的社会群体中抽象出来的，人性的一般是从“人”这个族类中抽象出来的。

“在阶级社会里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没有超阶级的人性。”这种论断在逻辑上犯了三重错误，因而同样不能成立。首先，把“带阶级性的人性”当作“具体的人性”，混淆了个别和特殊，是概念混乱。带“阶级性的人性”是一个阶级的成员所共有的人性，不是单个人所具有的人性，因而不是人性的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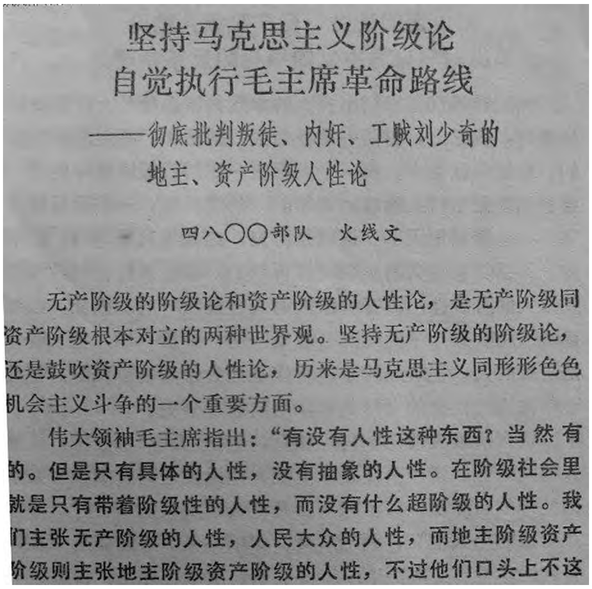
别，即“具体的人性”，而是特殊的人性。第二，“在阶级社会里”，也不是“只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这样的人性只是人性的特殊性的一种内涵。人性的特殊性还有其他种种内涵，例如带民族性的人性、带国民性的人性，带不同宗教色彩的人性，等等，都是人性的特殊性。第三，“在阶级社会里”，并非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只要是人，不管是哪个阶级的人，都具有人之为人的本性。把“带阶级性的人性”看作阶级社会里唯一的人性，或人性的唯一表现，一方面用以冒充“具体的人性”，否定人性的个别；另一方面又用以否定“抽象的人性”，抹杀人性的一般，从而在人性的三个层次上都和真理背道而驰。

在极左的“阶级论”眼里，只有“阶级”和“阶级性”是实在的和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人及其具体的人性和“人”这个族类及其普遍的人性，都是不存在的。这里，用“目中无人”四个字来形容，是再恰当不过了。

众所周知，讲人性，真正的意义，不在于有没有“带阶级性的人性”，而在于确认每个人和全人类都有“人性”。只有确认这一点，才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真正把人当人，才能确认每一个人的人权，才能理解和构建人与人之间合乎人性的关系。否定“人性”，无异于崇尚野蛮的“丛林原则”。曾经横行一时的“斗争哲学”，动辄把人往死里整，哪怕是亲密战友，手足兄弟，同生共死的患难之交，也决不手软，对待他们，就像某些食肉动物对待自己受伤的同类那样，无情地予以杀死并吃掉，就是这种野蛮的“丛林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表现。

从“需要”看人性的一般、个别和特殊

人性的一般、个别和特殊，可以从多个角度去考察。这里，我们仅从马斯洛关于人的五个层次的需要上来考察一下。无论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的需要，还是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只要是人，就有这些需要，皇上是这样，乞丐也是这样。这是人性的一般或人性的共性。但是，这些需要在每一个人身上的表现，即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和方式，以及对满足与否和满足程度的评价，则是具体的，皇上和乞丐大不相同，因为他们的身份不同，社会地位不同，所属阶级不同。



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论
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

——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

四八〇〇部队 火线文

无产阶级的阶级论和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根本对立的两种世界观。坚持无产阶级的阶级论，还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历来是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机会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

文革中大批资产阶级“人性论”

以安全的需要为例。身居深宫大院，又有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护着，皇上还未必感到安全，而乞丐只要有一个挡风避雨的栖身之所，就会有安全感。又比如尊重的需要。对于皇上来说，不给他三跪九叩，三呼万岁，就不能满足他对尊重的需要，就要治你的罪。而对于乞丐，只要你用平和的、关爱的目光看着他，并予以些许帮助，他就会觉得受到了尊重，至少不会感到屈辱。之所以有如此区别，是因为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生存条件分不开。乞丐不具备皇上的条件，他的想法，他的需要，自然和皇上不可同日而语。这既是人性的个别，又是人性的特殊：乞丐的需要是乞丐的，皇上的需要是皇上的。

人性的特殊性，归根到底，来自于人的社会性。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人的社会性的内涵，它构成为人性特殊性的社会基础。只把“阶级性”当作人性的社会性予以肯定和强调，是很狭隘、很片面的。实际上，即使在阶级社会里，人的社会性也不只是阶级性。作为民族的成员，人有民族性；作为国家的成员，人有国民性；如果是宗教信徒，还带有特定的宗教信仰的印记，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是人性的社会性，都使人性表现出特殊性。怎么可以借口“在阶级社会里”，就把人的社会性仅仅归结为阶级性，只承认“带阶级性的人性”，而把带其他不同社会群体特点的人性统统否定，把人之为人的普遍的人性也一并予以否定呢？

极左的“阶级论”者无法摆脱的梦魇

为了进一步用“阶级论”否定“人性论”，极左的“阶级论”者又说，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资产阶级主张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他们以为，这样就强化了自己和“抽象人性论”相对立的“阶级论”的立场了。殊不知，这不但没有否定“超阶级的人性”，反而确认了“超阶级的人性”。

既然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又何言“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两个不同阶级，如果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哪儿来“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说“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就是承认地主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是承认“超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是个什么概念呢？据毛泽东说，“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这就是说，“人民大众”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三个不同阶级构成的政治联盟。如果没有“超阶级的人性”，哪儿来“人民大众的人性”？说“人民大众的人性”，就是承认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人性，也就是承认“超阶级的人性”。

“超阶级的人性”是极左的“阶级论”者无法摆脱的梦魇。他们想否定它，但又不能不把它作为理论前提，包含在自己的论证之中。事实上，只要他们不敢为公然否认有“人性这种东西”而承担恶名，并且使用“人性”这个概念来和“人性论”作斗争，他们就摆脱不了“超阶级的人性”的纠缠。因为“人性”这个概念，说到底，它的规定性就是超阶级的。只要使用它，就不能不受到它的规定性的制约。

历来被奉为经典的反“人性论”的观点，解构出来，就是这样。这里除了否定人性这一点是清楚的，其他一切，从概念、提法到论证，都是一笔糊涂账。什么是人性，什么是具体的人性，什么是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有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所有这些，没有一个是说对了的。然而，就是这么一笔糊涂账，却让我们顶礼膜拜了几十年，岂不哀哉？

“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

极左的“阶级论”者如此强词夺理地否定“人性这种东西”，批判“超阶级的人性”，这和他们奉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分不开，也和他们自己抹煞人性的社会实践特别是残酷的党内斗争分不开。当然，也和那个时候莫斯科御用的第三国际的极左的思想文化路线，特别是和这条路线的守护神、斯大林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分不开。后面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且不予讨论。

马克思主义在人性问题上是自相矛盾。在理想的层面，也就是在马克思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上，主张自由和人性，主张人性的复归，主张人道主义，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不管现在人们怎样看待共产主义，他的这份理想是值得嘉许的。多年前，英国曾经把马克思评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入选的理由，就是他对人类有着崇高的人文关怀。但是，在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上，也就是在革命和社会改造的问题上，它主张阶级斗争和暴力，主张专政和剥夺：“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他还有一句名言，叫做“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3卷，第819页），这就是说，从旧社会到新社会，只能借助于暴力，舍此别无他途。这就把暴力提到了历史杠杆的高度。其实，靠暴力这个“助产婆”接生下来的，并不是民主、自由的社会。这个旗帜下进行社会变革的人们，除社会民主主义者外，一无例外地主张并实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后，又实行蔑视人性和自由的“专政”。

斯大林认为，列宁主义的实质，列宁主义的核心，是无产阶级专政，是说得一点不错的。列宁关于“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马克思的暴力论发展到极端。什么是专政？“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拘束而直接凭借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二版第3卷，第216页）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

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选集》第3卷，第623页)在这样的政治文化和政治权力下面，哪里还会有自由和人性可言?

待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实际是列宁主义传到中国，和中国几千年传统的专制主义互为表里。这样，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充满人道精神的奋斗目标，被实现目标的反人道的途径和手段所代替，途径和手段本身成了目标，剩下的只有赤裸裸的暴力和专政。专政不仅要“落实到基层”，而且要“全面专政”，即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其中包括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都要专政。这样，自由和人性，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恶。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与实现理想的途径和手段之间的矛盾，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它要“用锁链把人类拖进天堂”。我们曾经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现实社会主义，波尔布特的兵营社会主义，在驱使人们攀登“理想境界”的过程中，在破坏“旧世界”、创立“新世界”的时候，不就是这种情景吗？否则何至于害死数以千万计的无辜的生灵，株连数以亿计的更加无辜的民众?

上述反“人性论”的观点被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主张自由和人性的知识分子，就开始遭殃。首当其冲的，是从白区投奔延安参加革命的年轻的翻译家、作家王实味。他因为在1942年3月，分两次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一组杂文《野百合花》，表达自己朴素的人性观点，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表示不满，就被打成“托派”。第二年被逮捕，关押4年之后，1947年在撤离延安的路上，被用大刀片(为了节省子弹)砍下头颅，时年41岁。王实味是确立反“人性论”的话语霸权以后，为自由和人性殉难的第一人，但绝不是最后一人。

只认阶级、不认人，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曾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它的一切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设计，都以此为基础。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一个人只要被抹上负面的阶级色彩，或负面的政治色彩，就不再被当人看待，就要受到非人的对待。一搞政治运动，就发生无数骇人听闻的侮辱人、虐待人、折磨人、摧残人，以至无端致人死命，还要牵连家属子女、亲戚朋友、老师同学、领导属下这样残酷的事情。这种意识形态及其政治和社会实践，毒化了人们的心灵，贻害无穷。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和社会风气如此凶险，许多人动辄恶意相向，除了社会转型期的恶劣环境的影响而外，其历史根源就在这里；社会转型期的问题，也和这个历史根源分不开。不彻底肃清极左的反人性的意识形态及其社会实践的流毒，谈何“和谐社会”?

“以民为本”，还是“以人为本”

现在，明目张胆地否定人性的言论已经不多。但是，几十年来对所谓“抽象人性论”的批判，还没有做过认真的清理。一边承诺“以人为本”，一边继续批判“人本主义”，就是这种矛盾的突出表现。

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本来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可是有些理论家们在诠释的时候，却还把目光盯在“抽象人性论”上面，还在使劲地批判所谓“西方的人本主义”，认为它“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人的社会性，以抽象的、永远不变的人性说明社会历史，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取得和维护统治服务的。”(《科学发展观读本》，学习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多少熟悉一点过去那个年代意识形态斗争史的人，都知道，这完全是“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调。就算说得都对，也总不该抹煞“西方的人本主义”肯定人性、把人当人看待的合理性吧？再说，“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东西，就不能“为无产阶级服务”？自由、民主、人权、法制，也曾长时期地被认为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现在不也写进了我们的宪法？而最重要的是，这个“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西方的人本主义”，对我们这个东方“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发生过什么影响；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时候，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它，岂不是弄错了对象？难道“以人为本”的对立面，是“西方的人本主义”，而不是否定人性的极左的“阶级论”?

既然决意和“抽象人性论”划清界限，那么，把“以人为本”的“人”，用“民”来偷换，自然再方便不过了。“以人为本”是什么意思呢?“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同上，第18页)

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理论家该不会不知道“人”和“民”，是两个不同概念吧，怎么连一句过渡的话都没有，就径直从“人”蹦到“民”上去了

呢？如果“以人为本”的意思，就是“以民为本”，那何不直截了当地说“以民为本”？

把“人”换成“民”，一字之差，面目全非。人是多层次的丰富多彩的历史主体。而“民”只是人的一种政治和社会身份。他一方面与“官”相对应，一方面与“敌”相对立；而“官”是“民”的领导，自然也属于“民”的范畴。这样一来，在他们的思维框架里，人便只有两种可能的身份：或者人民，或者敌人，除此而外，再不是别的什么。这种“不是人民就是敌人”的二元对立，正是以往几十年所遵循的“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那时候，特别是文革期间，不是“革命人民”，就是“阶级敌人”。谁如果不幸被归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资（走资派）、臭（老九）”的行列，那么不管他是工人、农民、官员、知识分子，还是士兵、将军、元帅，甚至国家主席，外国友人，都再不被当人对待。

提出“以人为本”，从治国理念上说，最根本的，就是要打破原来那种思维定势，把人从“人民－敌人”的二元对立中解放出来，使他回归到大写的“人”，承认人有多重身份，多种角色，从而真正把人当人，做事想问题，都以人的利益为重，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果真照此办理，那就可以省去许多残酷争斗，避免或减少国家民族的痛苦和灾难。可是，经过这些可爱的理论家一解释，一切又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可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肃清批判“抽象人性论”流毒，有多么重要。

“抽象”在科学上的意义

把主张人有人性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予以否定和批判，完全是极左的“阶级论”作怪，不承认人除了是某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而外，还是而且首先是“人”这个族类的成员；不承认人的各种社会身份，其中包括阶级身份和政治身份，都是人这个实体的具体规定。如果承认这一点，承认人都是人，都有人之为人的本性，那就不能把这样的观点称之为“抽象人性论”。

这就好比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贬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一样，除非不承认鸡犬豕马牛羊、老虎狮子大象是动物；不承认萝卜白菜、花草树木是植物；不承认动物植物是生物。如果承认它们是动物、植物、生物，那就不能把动物学、植物学、生物学称之为“抽象动物学”、“抽象植物学”、“抽象生物学”。事实上，也没有哪一个头脑正常的人，会这样来贬称它们。可是，长期以来，恰恰就是这样来贬称“人性论”。不摘掉“抽象”这顶帽子，“人性论”便名不正，言不顺，理不直，气不壮。

在科学上，“抽象”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没有抽象，就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没有抽象，就不能用概念和语言来表达。因此，凡科学，形式上都是抽象的，人性论也是这样，但内容并不抽象。只有单纯的感觉，不需要抽象，也无法抽象，因而也不能言说。这是黑格尔早就说清楚了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说到“酸甜苦辣”，可是谁能告诉我们，什么叫酸、什么叫甜、什么叫苦、什么叫辣？这些东西只能靠相同的体验互相沟通。凡是科学的东西，都离不开抽象。抽象不仅是科学方法，而且是科学形态。

一概否定抽象，无批判地把它当贬义词使用，认为抽象的东西都不能成立，这是对科学的无知。试想一下，如果人性和“人性论”因为“抽象”而不能成立，那么其他一切科学概念，例如数学上“数”的概念特别是“0”概念，几何学上的“点、线、面”，物理学上的“作用和反作用”，化学上的“化合和分解”，生物学上“遗传和变异”，等等，不也都是抽象的，因而也都不能成立吗？进一步说，哲学上那些概念，包括“物质”、“精神”、“存在”、“意识”，“唯物论”、“唯心论”，“经验论”、“唯理论”，“决定论”、“唯意志论”，等等，岂不更抽象，因而更不能成立吗？就说极左的“阶级论”者奉为神圣的阶级和“阶级性”吧，其实它们也是抽象的。不进行抽象，一个一个如土豆般分散的个人，怎么能成为“阶级”，又哪里来的“阶级性”？

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自己1966年撰写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费尔巴哈人本学批判》。（见《西方哲学史讨论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那里简直把费尔巴哈批得一无是处，凡是他说到“人”和“人性”的地方，我都大批特批。那时候，对外正在批判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国内思想理论界笼罩在一派极左思潮的毒雾之中。人性论、人道主义被认为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我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一切，把它作为自己写作费尔巴哈的指导思想。现在回想起来，既惭愧又可怕，很对不起这位在上帝面前

勇敢地恢复了“人”的权威的哲学家。他还说过一句感人至深的话:“我是一点也不排斥人性的东西的人。”(《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53页)有这样的思想,这样的情感,真是了不起！今天,我呼吁为“人性论”平反摘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我自己曾经误入的理论迷途所作的自省和检讨。

早该为人性论平反摘帽了

历史上曾经有许多思想家用人性去解释历史,那是过于天真了。历史是不能单单用人性去解释的。在这个意义上,人性论作为一种哲学体系,特别是作为一种历史哲学体系,当然有许多需要批判的地方。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定人性。人性是一种客观存在。离开人性,历史将成为不可理解的东西:参与历史过程的人,哪一个没有人性?

在任何历史条件下,为善为恶都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决定如何选择的,有各种因素,其中就有人性这个因素。人类自从跨进文明的门槛以后,历史过程的能动性,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而外,最终都被归结为两个东西:或者是“上帝”,或者是人。上帝有神性,人有人性。而上帝和神性,其实都是人的创造,是人的心灵的需要,归根结底,还是属人的东西,是人性的一种表现。用爱因斯坦的话说,是人性弱点的表现。抹煞和否定人性的原本的历史,一定是野蛮的历史;抹煞和否定人性的笔底的历史,一定是伪造的历史。这类历史,我们不仅听说过,而且亲身经历过,许多人还为之牺牲了性命,其中有我们的长辈,也有我们的平辈和小辈。但愿今后的历史,能够和人性同行;写出来的历史,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

同时,作为个人,我们做事想问题,首先要想到自己是人,然后才是某种特定的社会角色。就像通常所说的,先做人再做事;做不好人,也做不好事。共产党员当然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但是共产党员也是人,首先应该想到自己是人。如果把人性、人的意识抛在脑后了,是不是“共产党员”,有没有“党性”,还有什么意义？现在有些大权在握(小权在握也一样)的共产党员,贪污腐败,挪用公款,转移黑金,包养二奶,出境赌博,勾结黑帮,为非作歹,丧尽天良。这当然是玷污共产党员称号的,但首先是违背做人的基本道德,违反人性的。人们在痛斥这些败类的时候,常常愤怒地质问他们:“你还是人不是？还有点人性没有?”可见,什么是第一位的,人们心中都有数。

人性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对立面。在文艺复兴时期及其后几个世纪的欧洲,主要的对立面是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人性论的出现,标志着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对上帝和君王的抗争。我们国家,古代诸子百家,也有不少人性论思想。所谓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性本恶”,争论的就是人性问题。文革期间人性论的对立面,主要是上面所说的极左的“阶级论”。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历史观,我们不妨称之为“阶级斗争史观”。其实,“阶级斗争史观”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主义,只要看看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特迈的那封著名的信,事情就清楚了。

马克思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其中第一点就是“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老版第28卷第509页)可见,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到历史唯物主义,中间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把阶级的存在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联系起来。离开这一点,抽象地(这里正是在贬义上使用“抽象”这个词的恰当的地方)谈论阶级和阶级斗争,充其量只能与马克思以前很久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媲美,只是沾了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边,远没有把握住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这个问题细说起来话长,需要另文研究。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30多年来的变化,中国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那个时代曾经显赫一时、所向披靡的历史观,已经走下神坛,现在连主流话语中也很少提到它。作为“人性论”的主要对立面,给“人性论”戴上“抽象人性论”帽子的这个最后根据,已经失去往日的权威,再不能禁锢人们的头脑了。这既是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人们解放思想的结果。现在该是为“人性论”平反摘帽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宪法视角下的毛泽东与刘少奇

○ 黄 钟

在八二宪法中确立党在法下原则，是吸取了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教训。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党在法上，在政制上形成了一种阴阳体制：宪法规定的明面体制是一套，权力运行的实际体制又是一套。在这种体制下，出现的极端事件之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打倒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刘主席。这一事件，凸显了党在法下之必要。

一、1949–1959：确立独特体制的关键十年

1. 党在法上体制之形成

自1949年9月颁布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共同纲领》，至1959年毛泽东卸任国家主席，十年里，中国政制形成和发展出了一种独特的阴阳体制。《共同纲领》、五四宪法及其他宪法性法律所规定的明面上的体制是一回事，权力的实际运行又是另一回事。

一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机构中，迅速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完整、严密、集权的组织体系。早在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会的决定》。同月，《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要求："凡党中央一切有关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

二是，中共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严密的"党管干部"制度，而人大对重要人事的任免则成形式。在1951年3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党除开管理我们党的干部外，对于非党干部的任免调配及其他问题，也必须发表肯定的意见，因此，对于非党干部也需要间接地或直接地予以管理"。195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要求"逐步建立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下中央及各级党委的各部分管干部的制度"。1955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颁发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提出"今后，凡列入这一职务名称表的干部的任免和调动，均须报经中央批准"。该决定同时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制定各自管理的干部的职务名称表，以便统一管理干部体制。

三是，排他性地在军队、外交、情报等国家机关中自由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若无党员或党组织的配合，任何国家机关都将无法正常运转。1950年7月19日，中共中央《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要求，"各民主党派不在人民解放军包括公安部队在内的部队中及其军事机关、学校以及军事企业中发展党员"，在情报机关、革命大学、旧人员训练班和使、领馆，"亦不进行组织活动"。而中共党员人数和党组织则迅速膨胀，在各级领导班子中占绝对高的比重。

四是，国家的大政方针政府必须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

"为了使政府工作避免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要求：

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

或请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

五是,自上而下建立起了同级中共党委领导政府的体系,而政府不能对中共党委发号施令。1953年毛泽东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一切重大问题都要由中共各级党委决定,对政府工作,中共各级党委普遍实行分口领导,将政府工作分为若干"口",如工交口、政法口等,由同级中共党委的常委或分管书记负责。

与此对比鲜明的是,政府对中共党委缺乏权威。财政部党组1955年1月11日关于目前税务干部中贪污盗窃国家税款情况给国务院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请求国务院将该报告批转各省市党委。1月13日,毛泽东批示:"这种请政府命令党委的观点是错误的,并且不止一个部如此,请作纠正。"1月17日,毛又批示:"由国务院向各省市委下达命令的办法不妥,此类内部命令,似由国务院与党中央联名下达为宜。"

就这样,党在国家之上,形成了一套不见诸于宪法规定的、控制一切国家权力的机制。对于这种撇开宪法的做法,并非没有反对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在反右中被严厉地镇压下去了。

1959年4月,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接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2. 党在法上体制之强化

在反右运动中,连"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独揽用人权"等等,都被当成右派分子"通用的说法"。把党权约束在宪法之下的问题成了禁区。此后,党在法上的体制进一步强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也随之水涨船高。

据薄一波回忆,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南宁会议上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是无权参与设计。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毛泽东还批评:有人想把大权揽过去,让党委搞点小权。这样就没有集中了。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常委、书记处,只能有一个核心。

随后,周恩来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在经济工作中,有些重大问题没有及时地向中央请示报告,更没有经常地系统地向中央反映情况。周说,"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1958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毛泽东写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发[58]84号文件)。"六十条"在毛生前没有公开发表。

"六十条"明确了中共对政、军事务全面直接掌管。比如,要求"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建设工作",列有工业、手工业、农业等十四项。"县以上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工业工作",又列有产量指标等十四项。"各级党委要抓社会主义农业工作",也列有产量指标等十四项。

"六十条"提出中共的领导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所谓"大权独揽",指的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六十条"还说:"是否事事都要过问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

1958年6月8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稿做了批示和修改。按照通知稿,中共中央财经、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故乡韶山,同家乡人民亲切交谈

在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前夕,中共召开了八届七中全会。毛泽东在全会上的讲话提纲里写道:“权力集中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为副帅。”邓,即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毛完成了卸任国家主席后依旧能大权在握的制度安排。

3. 统帅权的归属

1949年9月27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管辖并指挥全国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

这也就是说,统帅权并不授予任何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1949年10月组织的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其成员也不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有一位军委副主席和6名军委委员的公开身份不是中共党员。

可是在《共同纲领》生效之初,就出现了国家的军委和中共中央的军委并存的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总政治部仍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1950年4月才改称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

国家军事工作的大政方针,也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就是例子。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50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援助朝鲜问题,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出兵朝鲜的主张。次日,周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现在朝鲜政府一再要求我们出兵援助,我们怎能见死不救呢?党中央、毛主席决心已定,因此现在不是考虑出不出兵的问题,而是考虑出兵后如何争取胜利的问题。”10月8日,周代表中共中央赴苏会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中国军事援助及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问题”。

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组长分别为陈云、彭真、陈毅、聂荣臻、陆定一。对组长人选,毛泽东未做改动。毛修改后的通知说:

党中央决定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黑体字表示是毛所加改——引者注)

这等于是在国务院、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之上,另立一个“太上”机构。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自此之后,国家的行政和司法机关,将原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改为了向中共中央和各级中共领导机关负责。依葫芦画瓢的地方,比如在山西,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成员明确分工,“有工业书记、农业书记、文教书记、财贸书记、政法书记之称”;“各项工作都强调‘书记挂帅’,以体现‘党的绝对领导’。在组织工作中强化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实行省委及各级党委组织部门分级统一管理各系统干部的制度”。

可见，在五四宪法颁布之前，就已牢牢确立了统帅权名义上归国家，实际上属于政党的成规。

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宪法，同样也没有把统帅权授予任何政党或其他社会组织，而是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宪法颁布八天后，195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来担负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毛泽东任主席，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五四宪法规定的国防委员会被虚化。1954年10月6日，彭德怀在关于军委直属的总参等部的称谓问题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到，“国防委员会则为咨询机关性质”。依照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的有关决议规定，国防委员会被定性为“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

1958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地方党委对军队的领导和密切地方党委同军队关系的指示》。7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改变组织体制的决议（草案）》，规定：“中央军委是中共中央的军事工作部门，是统一领导全军的统帅机关，军委主席是全军统帅。国防部是军委对外的名义。军委决定的事项，凡需经国务院批准，或需用行政名义下达的，由国防部长签署。”这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成了中共中央军委的一个执行机构。

这也就是说，七五宪法规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和七八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在1958年就已成为五四宪法之外的定制。

对党的效忠进一步发展为对个人的效忠。1956年11月2日，在第二〇二师的军人俱乐部，彭德怀看到墙上挂的“军人誓词”第一条“我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就说“这个写法有毛病”，“现在的军队是国家的，不能说只是在哪一个人领导之下。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死了谁领导？”彭的看法并没有导致军人誓词的变化。1963年9月28日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正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军官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

从体制的角度来说，毛泽东手握军权，不是因为他任国家主席，而是因为他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这种体制不仅违反了宪法，而且还存在严重漏洞。一是五四宪法对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职位没有党派限制，因此依宪也可选无党派人士及中共之外的任何合法政党之成员；二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难以做到同时就任和离任；三是国家主席是中共党员时，不当国家主席却不辞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因此，在国家主席由于去世、辞职、罢免等原因缺位，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或国家主席因健康原因长期不能工作而由副主席代行主席职权，以及选举新一届国家主席时，都可能存在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或代行国家主席的副主席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不是同一人的现象。由于统帅权至关重要，漏洞就可能导致国家的危机。

二、宪法角度：毛主席打倒刘主席

毛泽东在卸任国家主席之后，从宪法角度来说，就不再是“国家领导人”了，但他绕开五四宪法，以政党首脑的身份，继续执掌国家大权。

1. 一个违宪的先例

毛泽东1954年9月27日当选国家主席，按照五四宪法，国家主席任期四年，任期理应于1958年9月27日结束。并且毛本人在法定任期内，也一再提出不想任下届国家主席。吴冷西说，“毛主席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早在1956年八大之前就在中央内部提出过”。

可是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959年4月才召开，结果第一届国家主席的任期违宪，比宪法规定的任期，多了整整七个月。

就在毛依宪已满任期却仍未卸任期间，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于1958年12月10日通过《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2月17日新华社公布全会公报。1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该决定和全会公报。

《决定》和全会公报宣布，毛"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决定》还称："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在将来，如果**出现某种特殊情**况**需要他再担任这种工作**的时候，仍然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党的决定，**再**提他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应当根据这些理由，在党的适当会议上，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在工矿企业工人的集会上，在机关、学校、部队的集会上**，向党**内党外的干部和**群众进行**充分的**解释，**以便大家了解这件事的理由，而不致有所误解。**"（黑体字表示是毛所加改——引者注）

无论是做出该公报和决定之行为本身，还是公报和决定的内容，都是违背五四宪法的。它所凸现的，是党在宪法之上。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公报和决定赋予了本党主席拥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特权。这个特权就是毛将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太上主席"。

12月1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整版刊登公报和"决定"的同时，在第二版头条用通栏大标题《毛主席永远领导着我们》与之相配合。该报道称，"全国人民热烈讨论并同意毛主席的建议和党中央的决定"。"许多人在讨论中指出，毛主席不做国家主席，专做党中央的主席……这也并不妨碍作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他的英明的领导作用。在全民讨论中，大家认为毛主席虽然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职务，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一致爱戴的伟大领袖。"报道还说：

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12月10日通过了这个决定之后，为了让人民在报纸上发表的时候不感觉突然，推迟决定公布时间，先逐级召开电话会议，把决定的内容传达到全国各族各界人民中去。从11日起，在全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各级机关、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厂矿、各农村人民公社、各部队、各大中小学、各商店、工商界和街道居民、宗教界、归国华侨和少数民族人士中都先后召开了会议，传达了这个决定，进行了全民性的讨论。讨论深入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全国城乡的男女老少居民普遍地听到了传达并广泛地热烈地参加了讨论。

之所以如此大力地传达这个决定，是为了"不致有所误解"。要让全国每一个角落的人，包括"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知道，毛不再当国家主席了还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还要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2. 宪法之外的"头衔"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卸任国家主席后的毛泽东，除了是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外，没有再担任其他任何国家公职。

4月28日，在《人民日报》上，毛有了个宪法里没有的"新头衔"："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一版头条，发表的是新华社27日讯《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报道称，"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参加了今天的会议"，并引述了《决定》的话："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

一版下边，是《全国欢呼选出新的国家领导人》。该报道的提要称："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党的八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大家深切认识到：毛泽东同志专做党中央主席……并不妨碍他对于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在刘少奇当选为国家主席的日子里，国家通讯社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一道明确地宣称，已经不在"国家领导人"之列、仅仅是一党之主席的毛泽东，才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而且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此后"国家领导人"也公开讲"毛主席领导"。比如，1959年9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题词中写"中国青年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国庆十周年庆祝

大会上讲“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1960年9月在宴会致词中说：全国各族人民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当选为第三届国家主席。第二届国家主席任职再次超期，并且长达1年零8个多月。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报道说，“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出席了今天的大会”。二版发表了题为《团结在党和毛主席的周围》的“新华社上海三日电”。依五四宪法，全国人大有“监督宪法的实施”之职权，可是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月4日通过的决议也称“大会号召……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云云。

自1959年到1965年，在中国人民面前同时出现了两个“主席”：“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这六年的《人民日报》，每年10月1日的头版，都以最为显著的位置，一左一右并排刊登“毛泽东主席”和“刘少奇主席”的大幅半身照。不过，地位高低，一目了然。

3.“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1959年4月27日，刘少奇成为国家主席，依照五四宪法，即日起应由刘统率国家武装力量。但是，此时毛泽东依旧是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庐山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有所变动。195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10月，新的中共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常委会议。据列席会议的吴法宪回忆，林彪宣布，“新军委实行集体领导，一切问题经过讨论研究后，报毛主席审定”。林还说，“重大问题集体讨论，最后都要请示毛主席，由毛主席定。”

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可他并不在中共中央军委组成人员之列。依照五四宪法不再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之职权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掌统率之权，而依据宪法本该有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之职权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则有名无实。北海舰队的组建，就是例子。1960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说，总参谋部和海军党委建议，以青岛海军基地为基础组建北海舰队。5月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同意，送呈主席批示。”5月8日，毛泽东对组建北海舰队报告批示：“照办。”

1959年10月，林彪说出了一句法治国家很忌讳的话：“人民解放军是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等于说掌控军队者可以用军队来进行政治斗争。次年，林彪提出：“我们军队的光荣传统就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这是人民军队本质的问题，如果离开了这三个‘忠于’，军队就变质了，变为反毛主席，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军队了。”

军队对毛个人的效忠不断得到强化。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要求“必须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号召人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提出“政治挂帅，也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当把传达和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当作首要职责”。

1963年军队大规模发行《雷锋日记》，全军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2月，林彪题词：“学习雷锋同志的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3月，朱德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1965年，王杰又被树为榜样。11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称死去不久的军人王杰“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同日，《解放军报》社论则以“向毛主席的好战士王杰同志学习”为副标题。而解放军报编辑部编的《王杰日记》，其中一节的标题就是“毛主席怎样说的，我就怎样做”。1965年11月，林彪提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

这样一来，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依然是军队至高无上的统帅。违宪，违得大张旗鼓。日后《红旗》杂志社论在批判罗瑞卿时，提到他说过，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

4.体制性恶果：毛主席打倒刘主席

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

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一次，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并重新选举了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在政治局常委的排名，由第二降到了第八。

1966年10月23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作检讨，历数自己犯过的种种"错误"，说"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并表示"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11月9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印发至县、团级。

刘少奇遭到了批斗、抄家、限制人身自由。据刘少奇机要秘书刘振德回忆，"随着对他批斗的不断升级，送给他的文件种类和数量逐渐减少，直到停止"，并且电话也撤了，以至于刘少奇处于一种"没有工作可做，没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药又睡不着觉"的状态。1967年8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内遭批斗后被押回住处，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五四宪法保护不了刘少奇。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批准《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做出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打倒了。假如1949年后厉行宪政的话，刘少奇在一个政党内的身份变化，包括地位下降甚至被开除出党，最多只会削弱其在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并不影响其法定职权的拥有和行使。但是在党在法上的环境里就不同了。1969年10月，刘少奇"于重病中被强行从北京押送到开封'监护'"，11月12日去世。临终时身边没一个亲属，直到1972年，妻子儿女才知道他已不在人世。而绝大多数国民，更不知国家主席的生死。到了1974年，长春青年工人史云峰还在写"祝少奇同志……身体健康！"

三、毛主席打倒刘主席的政治教训

1. 政治悲剧的根源就是党在法上

在谈到毛泽东的"晚年错误"时，人们常常说到毛搞"终身制"。

事实上，1949年《共同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没有任期限制，但毛只当了近5年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五四宪法对国家主席有任期规定，但无连任之限，毛任国家主席虽然超期，也不到5年。这两个任职时间加起来，只有9年多，比华盛顿当总统的时间，只多了不到两年。并且卸任国家主席之后，毛只是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75年后，连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也不当了。从宪法角度来说，毛从来就没有"终身制"过。

毛1976年9月9日去世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全国政协名誉主席，均非国家公职。因此，所谓毛的"终身制"，只能是指其担任中共党内职务。但这只是一个党务问题。

依据五四宪法，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三军统帅，若非辞职或被全国人大罢免，无论担任何种政党职务的人，要打倒国家主席，只有暴动、暗杀等非法途径可用。毛作为政党首脑能打倒宪法意义上的三军统帅，所依凭的，就是党在法上的体制。毛主席打倒刘主席的政治悲剧，实质上是党在法上的悲剧。只有实行宪政民主，确保党在国家之下、在宪法之下，才可能消除这类悲剧的制度基础。

2. 八二宪法：国家的归国家，政党的归政党

党在法上，无须经过法定程序即可执掌国家权柄，使得权力在宪法之外运行，这是导致1949年之后一系列政治悲剧的重要原因之一。八二宪法就是在吸取这一教训的基础上订立的，国家的归国家，政党的归政党，任何政党都没有法外的特权，可以凌驾于国家之上，甚至把国家当党产。

正如胡乔木所言，执政"不能解释为党直接成为政权即国家机器"。任何政党都不应拥有和

刘少奇在河南省开封市含冤离世

行使只有国家机关才能拥有和行使的职权。即使一个政党是执政党，依照八二宪法，法定的国家权力也不是授予政党，而是授予具体的获得某个国家公职的人来行使，而担任国家公职的人，不能混淆党员和公务人员的身份。

八二宪法明确了政党的领导和执政之不同。依照宪法，任何政党的党员要获得人大席位，谋得国家主席、总理、部长、法院院长等职，都必须经过法定的选举和任命程序。如果不通过选举，就不能产生人大代表、乡长、市长、省长、国家主席，就组织不了人大和政府。通过选举授权，是任何政党和任何人都绕不过的一道关。而国家主席、总理、部长、省长、市长、厅长等重要公职，在资格上，除了年龄、是否剥夺政治权利等等限制外，并没有党派限制。这也就是说，在八二宪法里，不存在天然的、一劳永逸的、无须按届选举来确定的执政党。

3. 权力必须在宪法框架里依宪运行，职由法设，权由法定

由于长期实行党在法上的体制，对于许多重大问题的判断，不是依据宪法这个“国标”，而是根据中共“党标”。1949年之后，在一些人头上扣篡政、篡国、篡军的帽子，依据的就是“党标”。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中“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妄图……篡政、篡军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说，就是例子。按照《新华词典》的解释，篡夺，就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地位或权力）”。既然宪法是“根本大法”，何为“篡国、篡政、篡军”，标准只能是宪法，而非“党标”。否则，就容易是非颠倒。

而为了防范发生国家权力旁落之“篡”，必须使权力在宪法的框架内依宪运行，杜绝阴阳体制。一是，国家机关只能依宪通过法定程序废立，包括政党在内的任何社会组织，都不能凌驾于国家机关之上行使宪法赋予国家机关的权力。二是，国家机关办公场所独立，不与包括政党在内的任何社会组织的办公场所混同。三是，获得宪法规定的选举或任命类国家公职，必须通过合乎宪法的法定程序，且职、权、责统一，有职有权，有权有责，与该公职人员是何政党成员无关。四是，无论担任何种政党职务，没有出任国家公职就不能行使与该公职相应的法定权力，而卸任了国家公职就是平民。五是，基于五四宪法的实践经验，中央政府选举类官员的就职与卸任的期限，应该固定在某月某日，其官邸固定，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不与包括政党在内的任何党派组织混处一处，官邸的使用与任职时间相对应。

4. 军人效忠宪法

如前所述，作为国家主席，刘少奇是领导全国武装力量的统帅，可是他却被打倒了，主要因素之一，就是全国武装力量问题上的阴阳体制。军人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刘少奇作为三军统帅却无军可率。

1966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

会议上说："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这火为何烧得起来？1967年3月上旬，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里说得极明白："没有人民解放军，就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可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是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进行。"同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林彪的"八·九"讲话里，林彪说发动文革靠两个条件，其二就是"靠解放军的力量"。而依照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的说法，也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支持下"，"摧毁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

正因为如此，八二宪法吸取了历史的教训，明确了军队属于国家，并规定武装力量"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张友渔1982年发表文章说，宪法修改草案改变了七八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这样党政不分的情况"。1987年，又在《中国法学》上发表文章说：

……1982年宪法修改了1975年宪法的规定，明确了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不是党领导下的下级机关；人民解放军属于国家，不是由党中央主席统率的"党军"。

5. 宪政民主重于党内民主

驯服权力是中国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目标之一，是原子弹爆炸、卫星上天等等所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表明，卫星上天易，驯服权力难。因为不能驯服权力，中国遭受了反右运动、大跃进、文革等等巨大的政治灾难。

而在中国，要驯服权力，其中一关就是必须确保党在法下。在政党与国家之间没有防火墙，完全依赖党内民主，危险而不可靠。即使党内民主，也不可以替代宪政民主。在遵守宪法的前提下，政党内部是民主多一点还是少一点，是首脑终身制还是限任制，是个人独断还是集体领导，这都是政党的党务。无论政党情形如何，对整个国家而言，宪政民主重于党内民主，分权制衡重于党内集体领导，以使任何政党无法凌驾于国家之上，从而使得政党之错——无论这种错是基于党内民主还是党内不民主，都难以直接演变为整个国家的灾难。即使是来自任何政党的国家领导人有践踏宪法的念头，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也不可能无法无天。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所言：

在这种制度下，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受到立法机关（国会）和司法机关的制约，受到社会舆论的制约的。他不能滥用权力而严重破坏法制。他如果这样做，就会被赶下台。

6. 党在法下，是政治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

1949年之后，中国长期未能解决的一道难题，就是政治斗争文明化，或者说把政治斗争约束在宪法的框架内。可以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去世，中国的政治斗争从来未能摆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血腥气。毛主席打倒刘主席只是其中的一例。

1980年10月25日，邓小平曾这样说毛泽东，"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而彭真1979年9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中也说过：国家的主席，要抓就抓；党的副主席、总书记等，要整就整。什么副委员长、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国家元帅，什么党员、团员，什么干部、群众、劳模，什么统战对象，要整就整。随便可以抄家，随便可以抓，随便可以捕，随便可以关起来，随便可以诬陷，随便可以诽谤，随便可以非刑拷打，随便可以杀人。

正因为中共意识到了这种政治斗争的野蛮，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就提出了"党内不准用""违犯国家法律的手段对待党员"；"要绝对禁止采用""法西斯手段解决党内问题。"这是中共对党内斗争文明化的一种努力。

但对整个国家而言，政治斗争文明化的关键，在于遵循八二宪法确立的党在法下原则，任何政党不仅不能通过操纵国家机关来进行残酷的政争，而且政党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无论是对待党员还是非党人士，也不能直接行使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机关才能行使的权力，并运用这种权力来进行政治斗争。■

（责任编辑　杜　晋）

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 郭 建

一、大国崛起

2008年春夏时节,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家地方报纸刊登了一则佳话:两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在战场上曾是敌人,如今成了好朋友。一位是我所在大学的退休教授,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士兵;另一位是1955年迁居美国的德国农民,曾是纳粹士兵。这两位老人又恰恰与我相识。他们的故事刊出后不久,我碰到我那位退休的同事,闲聊起来,提到那篇报导,并问:“爱德华近来怎样啊?”(爱德华是那位德裔老人的名字)“怎么人人都这么问我?”我的同事答道,“我又不是他的监护人。你自己去问他吧。他否定一切。(He is in total denial.)我对他说,要是到了今天你还不相信的确有过大屠杀,到了今天你还觉得希特勒是最伟大的领袖,你的脑子实在是出问题了。”几天以后,我在游泳池碰到了爱德华,他主动和我讲起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我们那时候的日子好啊!不光是国家强大,我们生活有保障,而且贷款利率锁定在百分之二,每个工人家庭都能买房子,买车……我们的奥运会办得也排场,人人都喜气洋洋的……”然后,他对我翘起大拇指说:“你们中国真棒!越来越强大,很有希望啊……”

只有将这段话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看,我们才能明白这位德裔老人的意思。从2007年年底开始,美国经济陷入了由银行呆账、坏账和房地产泡沫引起的危机,其规模仅次于1929年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失业率达到百分之十。当时,两次经济危机的对比几乎是街谈巷议的题目,爱德华也在暗示这样的对比。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以极权的力量推动经济的发展,卓有成效,使德国先于西方民主国家走出经济低谷。在排斥“异类”的同时,当政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开动宣传机器,鼓吹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也推行了有利“大众”的实惠的经济政策(如今驰名世界的大众牌汽车就是当年为希特勒“生日献礼”而设计的)。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首创火炬传递,盛况空前,以向世界展示德意志的大国崛起,并兜售德国特色国家社会主义的救世良方。当时的国际知识界也出现了分化,对资本主义的失望使得一些知识分子或倒向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或投入苏联的怀抱。希特勒也曾明言,西方民主国家没有政治,因此软弱,不堪一击,德国的真正对手只有苏联,因为只有苏联如德国一样,有意识形态,只不过是错误的意识形态而已。

再说这位显然缺乏反思意识的爱德华老人,他把自己对德国上世纪30年代的怀旧之情与他所看到的当下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危机中中国的强势以及北京奥运会的辉煌等等)并提,自然是对他自己所了解的强国之路有感而发,并想让我感到振奋。但他没有想到,他的一席话竟会在我的心头蒙上一层历史的阴影,使我感到忧虑,并由此想到中国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与德国30年代纳粹政治的相似之处。

二、灾难

其实,文革与纳粹政治的可比性在60年代就已经被一些了解德国情况的中国人所察觉。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一批现当代外国作品,包括哲学、历史、社会科学、文学等领域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内部发行”(即仅供中共高干层阅读)。到了文革期间,这些译作流传民间,俗称灰皮书和黄皮书,其中流传最广、最有影响的译作之一就是威廉·夏伊勒所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不少读者为此书所震撼,就是因为他们在夏伊勒笔下的德意志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看到了自身经历的影子。他们所看到的

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不愿意承认、但最终又确信无疑的极“左”和极右之间的相似。

粗略看来，中国60年代与德国30年代的共性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两者都是精神统治登峰造极、官方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然而，“统治”“控制”之类的说法很容易引起误解，因为，与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不同，在强权高压之外，以各种文化手段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包括口径完全一致的各种媒体、频繁的群众集会和首长讲话等），进而导致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及其理想主义的狂热是30年代德国和60年代中国政治的独特之处，它更接近原教旨宗教的虔诚与狂热，而有别于30年代斯大林官僚、警察体制统治下的苏联。这种思想控制是极权主义的思想控制：如果强权专制多半是让人由于惧怕而驯服、顺从的话，那么极权的控制同时还要依靠“灵魂深处闹革命”，以至于迫害人的人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在为了一个无限崇高的事业而奋斗，在通往这个理想目标的道路上理所当然要清除一切障碍，“扫除一切害人虫”。正是这种极权主义的教育和思想控制，造就了那些在“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和“红八月”之类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行暴的热血青年。

在希特勒的德国，“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人民才是一切”，类似的口号在60年代的中国不是也叫得极为响亮吗？两时两地的群众狂热都曾以领袖崇拜的形式出现，这种崇拜的确显示了领袖的思想对全党、全民的绝对统治。人们甚至相信，只有在自己所生活的体制之下才有真正的大民主。

其次，德国和中国的群众运动都是从制造敌情、激发群众的种族或阶级仇恨开始，将社会的一部分成员妖魔化，从而对他们实行大规模迫害甚至杀戮的。在希特勒的德国，犹太民族首先成了打击对象：根据纳粹的宣传，犹太人贪婪、狡黠，是劣等人种，他们不仅正在败坏优等种族雅利安人的血统、精神和文化，而且已经开始控制世界金融，以实现其征服世界的野心。在60年代的中国，所谓“阶级敌人”在地、富、反、坏、右、资本家之上又加了文教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根据“九评”和“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中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说法，这些党内党外的阶级敌人串通一气，并与国外的“帝、修、反”相勾结，试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结果会使红色江山改变颜色，使千百万人头落地。不管是德国的所谓“劣等人种”，还是中国的所谓“阶级敌人”，这些人都首先被描绘成将给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罪恶势力。他们不仅被敌视，而且被非人化了，以至于愤怒的群众不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同类，可以任意处置。

再进一步说，种族和阶级虽是不同的概念，但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和中国的阶级斗争，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上，却都有相通之处。比如说，为纳粹所推崇的血统论在文革初期的中国也曾猖獗一时：1966年夏天广为流传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明确地显示了早期红卫兵作为“自来红”的优越感以及他们对那些出身“黑五类”家庭的同学的蔑视。出身“红五类”的不仅不许那些异类加入红卫兵组织，而且称他们为“狗崽子”，甚至对他们抡起了带铜头的军用武装带。在1966年8月的北京大兴、昌平惨案和1967年夏秋之交的湖南道县惨案中，数以万计无辜的人仅仅因为“成分不好”而被杀害；在道县，有上百户人家被满门抄斩，连老人和婴儿都没有放过，只因为他们的血管里流着“黑五类”的血。尽管官方在媒体上从未公开支持过这副对联，而只是为当时热衷于将对联意识付诸实践的“革命小将”叫好，但其阶级路线（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及其具体实施（比如，家庭出身要查三代，一般只有所谓“根红苗正”者可进入要害部门工作，而且如果他们想和“黑五类”结婚，党组织都要出面“做工作”干涉的）恰恰就是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统意识的渊源所在。

其实，纳粹思想意识形态并非只讲种族、血统而不讲阶级。“纳粹”本来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缩写，这一政党的纲领包括反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而犹太人则被看作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其“劣根性”具有种族和阶级双重属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纳粹的种族理论得到了较为彻底的清算，而其阶级理论却被淡化，甚至遮蔽了。为什么在“去纳粹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总之，无论是种族主义、血统论，还是阶级斗争学说，其要害说到底都在于否认人之为人的基本认同这一价值底线，否认人类一体理念的正当性，将共同体的人强行割裂为

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敌我两类。

三、记忆与反思

灾难如此相似。那么，灾难之后德国和中国民族反思过程是否也应该有相近之处，可以相互映照呢？

二战结束后，纳粹德国主要战犯的罪行在国际社会的干预和监督之下逐步得到清算，但是，为什么在1933年以后的12年里，德意志民族会落入纳粹政治的陷阱，多数人成了希特勒的追随者和崇拜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那场空前的人性灾难，这个问题却是要每一个德国人自己回答的问题。

在战后十几二十年中，沉默、否认、推卸罪责以及有意无意地夸张战时德国人对纳粹政治的抵制，这在德国民众中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战后的联邦德国恢复了民主宪政，还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批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去纳粹化”的进程中能够畅所欲言，一再提出民族悔罪和复兴德国古典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的问题。就拿卡尔·雅斯贝尔斯来说吧，这位被阿伦特称为“世界公民”、有深厚的心理学背景的哲学家在战后发表了《德国罪感问题》《哲学回忆录》等一系列著作，从理性主义、人道主义、普世主义的角度深刻检讨纳粹政治的心理因素及德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罪感问题。

雅斯贝尔斯看到了反思极权政治的迫切性，同时又看到，对卷入纳粹政治的一代人来说，这种反思是很艰难的。雅斯贝尔斯特别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把重建大学(包括教职人员的“去纳粹化”)、培养新一代的国民与清算极权的影响、促成德意志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新生密切联系起来。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新任海德堡大学校长的雅斯贝尔斯，在发表《德国罪感问题》的同一年，又写了《大学的理念》一书，阐述他对大学目的与责任的看法。尽管德国人对纳粹时代的反思起步艰难，但由于有体制的保护，像雅斯贝尔斯这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这种正义的声音不仅使人们不能轻易忘记过去，而且促使德国政府和社会在战后的新一代趋于成熟的20世纪70年代，终于能够直面历史，对纳粹极权的罪恶作出真诚的悔悟和谴责。1979年关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纪实系列片《大屠杀》问世，并引起强烈反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文革后中国社会对灾难的反思与战后德国相比，情况如何呢？

清除“四人帮”，结束十年灾难，这无疑是历史的进步。在以后的几年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批判“两个凡是”，并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宽容了“伤痕文学”和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讨论。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条件来看，这应该说是中国人反思文革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对文革的批评和反思又是有限的。文革必须否定，否则改革开放将失去合法性；但彻底清算文革的问题又有损于党的领导。政府鼓励人们“向前/钱看”，也就是说，最好把文革淡忘。

这种政策很快就造成了历史遗忘的局面，如今中国的年青一代对文革那段历史的了解几乎等于零。这种情况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如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所说，在文史哲传统最为深厚的北京大学，学生们听他谈起文革，就已经觉得那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就像天方夜谭。随着忘却而来的是扭曲的记忆：如今很多人把文革想象成一个打击贪官污吏、群众扬眉吐气的时代，一个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平等、人人生活有保障的时代。与此同时，多半由于受到西方左派文化理论中的文革情结的影响，知识界、学术界也有人宁肯无视本土的现实，扭曲事实真相，为文革辩护，说什么80年代出现的像“伤痕文学”那样对文革的揭露和批判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之类的“精英”阶层对文革的控诉，广大工农群众并不认同，因为像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教育改革之类的文革新生事物给大多数人带来了很多好处……

且不说这一说法对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革记忆尚存的中国来说是多么荒谬，就算这个说法成立，难道许许多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不足以证明文革的罪恶吗？而且，坚持这种说法的人遮蔽了一个广为人知、却很少有人提起的事实：受迫害最深、人数最多、时间最长、命运最惨的社会群体并非干部或知识阶层，而是农村中那些“成分”不好的人及其子女，这些自暴力土改以来最无助、最可怜、处于社会最底层、在文革中由于血统论影响

连婚配都很困难的人，至今处于失语状态。

我愿意相信，民间出现的所谓文革怀旧，实际上是人们对当前官僚贪污腐败、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等现象强烈不满的一种表现形式，而不是真要回到文革时代。否则，我们将如何面对成百万冤屈的亡灵、成千万受到永久伤害的心灵呢（据官方统计，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及其亲属竟达全国人口的八分之一）？

为了挽救文革记忆，为了反省那个狂暴、残酷的时代，以使其永远成为历史，也有不少知识人一直凭着良知、顶着各种压力、执著地工作着，比如王友琴教授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走访上千人，记下664位死难者的故事，编成一部珍贵的文革口述史。应当说，这个巨大的工程是从1966年8月5日开始的：那天，身为北京师大女附中学生的王友琴目睹了这所全国最著名的女子中学的红卫兵侮辱、毒打副校长卞仲耘老师的悲惨场景，卞仲耘在当天被活活打死。一时间，“红色暴力”席卷全国，无数教育工作者被学生揪斗，惨遭虐待，许多人或被折磨致死，或不堪凌辱残害之苦而自尽。这在以教育至上、尊师如父母而著称于世的数千年中华文明中是史无前例的！

《血的神话》是又一部挽救文革记忆、揭示历史真相的力作，它所记录的就是上文曾提到的、1967年夏秋之交发生在湖南道县及周边地区的大屠杀，无辜被杀者九千余人。作者谭合成先生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冒着政治风险搜集了数百万字的历史档案资料，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当事人和受难者家属，写下50万字的巨著，可以说是字字血泪。谭合成写道：当年的凶手“与被杀者之间没有什么个人仇恨，然而是谁点燃了他们的心中仇恨之火？是谁打开了人的兽性之门？是谁发给他们刀枪，并赋予生杀大权？是谁灌输给他们那么多‘你死我活’的理论？”

同时，和《德国罪感问题》的作者雅斯贝尔斯一样，他们也在思考中国人作为民族和个人的道德缺失问题，并召唤国人在对文革灾难的自审和自省中克服扭曲的人性，从而得到道德的新生。然而，与德国战后的反思不同，谭合成写道：

当时光进入到21世纪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越来越少地被人提及，电影、电视上偶尔出现的所谓“文革”镜头，也是如此粗浅和模式化，甚至成为某种搞笑的噱头。须知那背后全部都是人命和鲜血！真的一点都不可笑。年轻一代连“贫下中农”、“四类分子”、“阶级斗争”，这些三十年前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都搞不清楚了。把我在这篇历史纪实中记录的杀人理由讲给他们听，甚至可能被斥为“造谣”，笔者就亲身碰到过这种事情。须知这些理由在当年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和生命已经绰绰有余了。今天的中国在建摩天大楼，造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送卫星上天遨游太空，在快速地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快速地遗忘着昨天，快速地向精神文化双重堕落的深渊滑行。我们这个民族，曾在绝对权威的蛊惑下经过一场昏天黑地的自相残杀，刚刚遍体鳞伤地爬起来，还没有认真地治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伤痛，认真地检视一下残杀的真正原因，又一窝蜂地挤上了不知终点的欲望之车，将残存的一点道义、良知，乃至羞耻都践踏得一干二净。三十年前的那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整个国民性提供了长达十年的舞台空间，表演得足够充分了，那既是一部血泪史，也是一笔重大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昨天和今天的一切荒唐和邪恶都可以从中找到源头和脚注。然而，我们错过了疗治民族心灵创伤的最好时机，也就错过了中华文化正本清源、民族精神健康复兴的最好机会。

与此同时，中国的新“左”派异军突起，为文革唱赞歌，为薄熙来的文革式“重庆模式”叫好。他们中的某些学者，也将德国与中国相比较，却刻意回避纳粹德国与中国文革的相似。比如一位学者讲“德国故事”，论述德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普遍性话语”的历史批判和对德国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捍卫与发扬，从康德一直讲到纳粹的桂冠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并对后者的民主宪政批判尤为推崇。他担心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会全盘接受以英美政治和文化为代表的现代性话语，将英美的特殊性误认为普遍性，以至于失去中国自身的文化主体性。他从正面讲“德国故事”，希望国人能以此为示范，回答当下“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这个问题。

针对这位作者对中国民族文化自主性的忧虑及其德国文化情结，高全喜教授批评他以文化化约政治和经济，以至于完全忽视甚至遮蔽中国

现代性的最根本的问题，即建立民主宪政制度的问题，并指出，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的条件，近200年来，中国和德国都是不得已被裹挟进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性浪潮，并不断在这一普遍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努力寻求并保持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自己民族的精神与风范。

然而，要害在于，赞美德国民族文化的自主性和连续性，不能只谈二战之前的德国，对纳粹政治却语焉不详，并回避了纳粹时期的大灾难，也回避了德国民族对灾难的记忆和反思，更没有看到中国文革后在记忆和反思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与德国的巨大差距。

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将面临重复过去的危险。大多数德国人看到了这一点，在行政上的"去纳粹化"之后，在宪政民主制度之下，还开始了一个艰难的记忆和反思的过程，其中知识分子起了重要的作用。那中国呢？在文革问题上中国正在发生的忘却历史和扭曲记忆绝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是一个紧迫的现实问题：记忆过去，正是为了当下和未来。如果在经历了如此深重的人性灾难之后，我们仍然看不到每一个个人仅仅作为人就应有的不可侵犯的尊严和权利，仍然看不到任何人在某种意识形态的感召、影响下都可以崇高的名义行暴、犯罪，那么，仅仅放弃具体的文革意识形态、政策和行为，远远不能清除文革这种形式所代表的本质的恶。

在阶级斗争理论偃旗息鼓后，民族主义、大国论和强国主义再次吸引了一些中国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当中就有特别反感文革反思和文革批判的。他们所采取的话语策略之一就是用讲述二战前的德国故事来兜售"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义政治和引导"如何做中国人"。殊不知民族主义挑起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和仇恨的潜力绝不亚于文革时代的阶级斗争学说。若无全民的认真反思，谁能保证如今的民族主义不会煽起当年文革式的疯狂呢？只不过打击对象的指称不再是"阶级敌人""黑五类""牛鬼蛇神"，而是"汉奸""卖国贼""假洋鬼子"之类，而义正词严的讨伐者也不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而是所谓的"中国人"或"爱国者"。所以，正如高全喜所说，问题不在于如何做中国人，真正的问题是，在什么制度下做中国人，有没有对个人尊严和权利的基本保障。在回避文革反思的同时，真正的如何做中国人的问题被刻意替换掉了。

在中国讲述德国，无论是国家、民族社会主义的极权德国，还是极权以后悔罪中的德国，都是一种叙述，一个故事。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中都有德国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这两个故事前后相连，少了任何一半，德国知识分子介入德国政治的故事便不再完整。战前战后的两个"德国故事"都可以成为中国的一面镜子，是否完整地讲述德国故事却能照出两种完全不同的中国影像。如果我们只讲述前半个德国故事，那么看到的将是如何走一条具有德国或中国特色的强国之道。如果我们前后相连地讲述整个德国故事，那么就能看到，这条强国之道是必须付出高昂的人道和道德代价的。即使许多曾经为这条强国之道所吸引过的人，在经历了极权灾难之后，也都不再把它视为一条幸福之道。■

（作者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终身教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社科人文　文学小说　党建管理　经济管理　书画摄影

正规出书　约稿通知

书稿内容：(一)社科人文类书稿：回忆录、自传或人物传记、年鉴、社科著作等；(二)管理和学术类书稿：党建管理、行政管理、经济、金融或企业管理等研究专著；(三)文学类书稿：散文、诗歌、杂文、时评、游记、通讯等；(四)小说类书稿：历史、当代、言情、武侠、反腐等长篇、中短篇小说；(五)美术类：画册、书法作品集、摄影作品等。

书稿要求：书稿(作品)内容健康，艺术性强，底蕴丰厚，文笔流畅。字数为6-8万字以上，个人专著、多人合集均可，公开发表或未公开发表均可。

出版发行办法：以丛书形式或独立书号形式出版，以畅销书或合作出版方式运作；达到畅销书要求的，签订标准出版合同，按版税或买断方式支付稿酬；根据作品和作者意愿，面向国内或海外公开发行。其中国内公开发行的，由专业权威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

全国免费投稿热线：400-680-8368
投稿地址：北京朝阳区八里庄东里3号654信箱
综合编辑部 收；邮编：100025
电话：010-57192229、57733087、57192223、57733086
传真：010－89506878；在线投稿：bookbj@126.com
联系人：顾娜、高晶、牛萍萍、文馨(编辑)
新书欣赏、订购，请登录：http://www.bookhk.net
北京东方朝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

○ 穆广仁

1955年10月，毛泽东主席对新华社领导人吴冷西说："要把地球管起来。"吴冷西在新华社传达了这个指示，说毛主席批评新华社的国外工作思想保守，行动迟缓，驻外记者派的太少，新华社要大发展，走向世界。吴冷西和其他新华社领导人意识到，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之后，中国在世界上影响有很大的提高，新华社走向世界是应有之义。

尽快向国外派驻记者，新华社没有现成的队伍。现有的记者除极少数外，多是不谙外文的国内记者。新华社采取两方面的措施来征集驻外记者人选：一方面，手持中央的"尚方宝剑"，到各地物色既懂外文、又有一定工作经验的党员，调来总社；另一方面，为国内记者办"外文培训班"。这两种人都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才能派出。我就是1956年从地方上调集来的备用人员之一。可以说，毛泽东"把地球管起来"这一句话，决定了我一生中重要的一页。

可是，回头看来，直到退下岗来，作为国际事务特别是亚非事务的追踪者，我仍是个并不合格的记者，一个尚不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记者。特别是在毛泽东个人迷信时代，极"左"思潮盛极的时代，我曾经充当一个唯上是从的驯服工具，写了一些奉命文章，干了些蠢事。那是我生命中陷入迷雾的一段。只是到了晚年，不能不就此做出一些反思和探讨。这既是为了卸掉个人身上的负担，更是为了勉励更多人认同独立思考、独立人格的价值。从我国的对外政策而言，应当记取毛泽东企图领导世界革命的深刻教训。

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代。亚非拉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相继取得民族独立，成为新兴国家。其中，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在东方以至全世界，都具有强烈影响的事件。新中国成立后，支持亚非拉各国民族解放运动，成为我国外交政策中非常显赫、非常重要的部分。新华社作为党和国家喉舌，以浓墨重彩报道了二战后东方世界的这个进程。我一踏进新华社，就被分配在国际部，从事东方地区事态的报道。此后到了国外，继续报道亚非拉人民反帝反殖、取得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

据我记忆，吴冷西曾对新华社干部说，塔斯社和新华社有个分工，新华社"重点在东方"。当时，我没有琢磨这个分工的来头。后来才悟到，吴冷西是没有资格规定两者的分工的，甚至毛泽东主席也没有资格，只有斯大林才有这个权力。1949年7月刘少奇率团秘密访问苏联时，斯大林对刘说，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应该有某种分工，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见沈志华文《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载《同舟共进》2012年第1期）。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曾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是当年毛泽东指导中国革命及其"一边倒"的外交政策的某种解读。

在二战后的一段时期，周恩来总理和印度、缅甸等领导人创立了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为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这是当时总揽外交工作的周总理的重大创造。他在访问众多的亚非国家的旅程中（我曾参与了总理非洲之行的报道），充分地展现了我国支持亚非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方针，也展示了周恩来的外交风采。可是，事实进程表明，周恩来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和后来毛泽东心中的世界革命战略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毛泽东是决定一切的，周恩来做不了主。

1955年苏共20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后世界形势变化，改变了此前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对外政策，而演变成"取而代之"，即取代苏联

而成世界革命的领导者。50年代毛泽东要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也就在改变了中国在世界革命中东方为重的“分工”角色之后，演化为毛泽东“取而代之”的世界革命战略所伸出的一只触角。

1959年，塔斯社声明揭示了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支持印度的立场，我根据社长朱穆之指示，在新华社的新闻中第一次公开报道了中苏分歧。此后，双方展开一场意识形态的大争论，其代表作是“九评”。“反对修正主义”成为我们宣传中的主旋律。毛泽东的斗争哲学，反映在国际关系上，集中到一点，就是反对“和”：反对和平道路，反对和平共处、反对和平竞赛。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最尖锐的论争是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问题。苏联认为武装斗争并非夺取政权的唯一道路，就被斥为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1963年，我被派驻开罗任记者。这时中苏论战正值高潮。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中产生了大分裂：凡是主张和平道路、议会斗争的共产党，被称之为“修正主义”党；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党，从国际共运中分出来，称之为“×共（马列）”。在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中，也发生了分裂，而且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分裂。中苏双方都力图把亚非拉国家拉向自己一边。苏联领导人不再信任中国作为东方国家革命的领导者。本来就对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心存不满的毛泽东，对赫鲁晓夫更是针锋相对。中苏关系的这种演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中苏双方在世界革命中的“分工论”，而演变为毛泽东和苏联领导人对世界革命领导权的激烈争夺。

在我的经历中，涉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几件事，反映了中苏分歧，也折射出了毛泽东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的大背景。这里举若干实例如下。

万隆会议后，诞生了一个亚非地区的非政府组织：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简称“亚团”）。苏联奋力挤进这个组织，而中国则极力加以反对。最终苏联还是挤进来了。亚团在开罗设立书记处。中国派作家杨朔出任中国常驻书记处的中国代表。亚团书记处成为中苏经常吵架的地方。每次开会，杨朔与苏联代表例行争论一番。杨朔觉得这种争论无甚报道价值。新华社也就不再去采访报道了。

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举行了多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1965年5月，在加纳的温尼巴召开了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亚非人民团结大会，我参与了这次会议的报道。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亚非代表，高唱反帝反殖、要求民族独立的呼声，特别是支持越南反对美国干涉的战争。这是大会的主流。而新华社记者在作为会议总结性的述评中，却突出了反对“苏修分裂投降路线”，称“大会自始至终贯穿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团结反帝的路线，一条是分裂投降的路线。”述评说，“有人（指苏联）企图在会上不反帝而反华，不支持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而是帮助美国迫使越南人民放下武器投降”。这里所依据的，不过是一位印度代表的发言，提出战争双方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的建议。在《人民日报》刊出这篇评述的大标题更加鲜明地说：温尼巴大会“坚决唾弃苏联代表团兜售的分裂投降路线”。述评还指苏联代表团在会场散发反华小册子，指责中国领导人企图“使民族解放运动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指苏联）为首的大家庭分开，破坏世界革命运动的团结”。现在再复读这篇文章，真是一篇文不对题的“杰作”，是对大会真实情况的重大扭曲。

接着，1966年末至1967年1月初，在古巴哈瓦那举行了亚非拉三洲人民团结大会。我与陈

迹被派往哈瓦那报道大会。会议结束后我奉命写了一篇很长的评述，稿件送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审改，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几乎占了一个版面。其基调仍是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破坏”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

这里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形式为是否坚持武装斗争是唯一方式的斗争；实质是毛泽东“取而代之”的世界战略，与苏联领导人争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世界革命的领导权（即以谁“为首”）的斗争。

在任开罗记者期间，我有机会与许多尚未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组织驻开罗的代表经常联系。不久，我就发现一个很不愉快的现象，这些国家多是有两个相互对立的独立运动组织。津巴布韦有ZANU和ZAPO，西南非（现纳米比亚）有SWANU和SWAPO，南非有“泛非”和“国民大会”，安哥拉、刚果（金）、贝专纳（现博茨瓦纳）等都有不同的民族解放组织驻开罗的代表。一个非洲国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组织，他们多有不同部族的背景，这种情况在非洲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中苏双方各支持一派，加剧了分裂对立，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在他们取得独立后，（相当多非洲国家的独立并非依靠、或主要靠武装斗争）也没有停止相互争斗，甚至政变频仍。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上的极“左”思潮达到了极致。我们的宣传也达到极致，在全世界极力宣传毛泽东思想，输出革命，要将红旗插遍宇内。这种几近疯狂的外交，反映了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北京新华社总社曾向国外分社发指示，要求报道外国人学习《毛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情况，要非洲人为毛泽东思想唱赞歌。国外分社勉为其难，奉命行事，我们不顾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竟玩弄一点小手段，拿出《毛选》四卷的英文本中有关武装斗争的论述，请非洲人阅读，然后谈谈“学习心得”，我们就据以作为新闻发表。

1967年亚非记协在北京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领导上要求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左派’的会议”。我被邀参与其事。会前，我奉命去亚非若干国家，选择“左派”记者与会。结果，阿尔及利亚、埃及、马里、巴基斯坦等国新闻界都拒绝与会。我回到北京后，又奉命说服亚非记协总书记查禾多（原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要他接受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亚非记协的总纲领，拥戴中国文化大革命。我拿着一份拟在会议上通过的报告稿，到交道口南二条查禾多的住所，就文件与他磋商。查禾多感到很为难。他认为亚非记协是个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亚非国家的新闻工作者的组织，不可能接受毛泽东思想、反对苏联修正主义，作为记协的总纲领。当然，会议还是“通过”了这份文件。这又是我奉命参与的一件强加于人的蠢事。

当时极“左”外交路线的总体表现是：“打倒帝修反”。这是个“世界革命”的口号。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固在打倒之列；已经取得独立的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其领导者不是无产阶级及其代表共产党人，都归于“反动派”，都在打倒之列。毛泽东在1965年《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的词作中，就盛气凌人地唱道：“要扫除（五洲四海）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在这种“世界革命”风靡之下，支持亚非拉国家左翼政党开展推翻当权派的武装斗争，公然干涉别国的内政，输出革命，成为一时之尚。在新华社的报道中，极力宣扬马来亚、缅甸、柬埔寨、泰国、印度等国的左翼政党开展武装斗争。其中有些东南亚国家的左翼政党，是中国支持的以华人为背景的共产党。这类支持武装斗争的报道也扩及某些非洲、拉丁美洲国家。可是，这样输出革命的结果，红旗没能按照巨人毛泽东的意志插遍全世界，而中国却一时陷于孤立于世界的困境，直到尼克松总统访华后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主席的晚年，中苏对抗发展为武装冲突，苏联被认作是最危险的敌人。毛泽东把打倒苏联修正主义作为争雄世界的主要战略。为此，要建立将苏联孤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打造一个“反苏一条线”，即联合美国、日本、东南亚、南亚、中东、直到欧洲各国的反苏一条线。可是，直到他去世之际，这“一条线”也不曾有效地建立起来，而苏联却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14年之后崩溃了。但这并非毛泽东思想把苏联打倒了，而是苏联的极权专政制度埋葬了它自己。■

（作者为新华社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安康文革第一劫

○ 曾志信 何吉祥 邹服生 姚维荣

一 黑云压城城欲摧

陕西省安康县虽然地处偏僻,但文革妖风刮起,知识界也在劫难逃,知识分子集中的教育界则首当其冲,1966年夏的“暑教会”就是灾难的开始。

1966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传达到各地。安康县的掌权者们看到《通知》中关于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主要精神后,为了保护自己,立即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由他们来领导这一运动。

领导小组经过密商,决定拿教师开刀以转移斗争目标。于是,在7月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召开“暑教会”。成立了以县委副书记乔××为组长、纪委书记魏××为副组长,有检查、组织、公安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领导小组,负责对“暑教会”的全面领导。还从各部门抽调了一批干部担任大小组长,集中全县中小学教师1840人,以“清理阶级队伍,纯洁教育组织”为由,历时83天的“暑教会”在一片肃杀的气氛中开始了。

那年7月,学校早早就放假了,说要开教师学习会。通知每个人都要带上被子、换洗衣服和日常用品。大家走进西城中学的会场,就感到一股不寻常的肃杀气氛,迎面而来的是大幅标语:“向党交心,老实做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集训会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知道全国要开展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伟大运动,进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前几天,反反复复地学习文件,向党表红心,坚决捍卫党中央,坚决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打倒走资派只是总口号,实际上是人人都要接受改造,都要脱胎换骨。

集训会从教师人人都要向党交心开头,给你三天时间,把自己内心深处与党不同调,不合拍,尤其是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都要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写出来。然后,领导小组要求大家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互相揭发,揪出“叛徒”“特务”“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漏网右派分子”“漏网地主分子”“漏网富农分子”等。接着便是上纲上线的批判斗争,让被斗的人站板凳,戴高帽,敲着锣在院内游走,边走边喊“我是黑帮”,“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罪该万死!”

写大字报是一项政治任务,你对伟大领袖忠不忠,对社会主义爱不爱,写出的大字报的数量和揭露问题、批判问题的深度,就是衡量的标准。大字报写得没日没夜,贴得铺天盖地。有的大字报贴在宿舍门上,下边留的空间不到一米高,人进出不敢去碰一下,这些易损坏的“瓷器”,俨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人们只好猫着腰钻进钻出,如果谁不小心弄坏了,追查出是谁作的“茧”,假如是个“黑五类”,那就惨了,大会批,小会斗,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大家自己揭露自己,当然也要互相揭露。把平时人们说的、做的事情,不管是开玩笑还是正经话,只要勉强能同政治挂上钩的,全部揭露出来。大到政治原则,小到生活细节,没有问题的人几乎难找。大部分上纲上线以后,都能说成与党、与社会主义离心离德,自然就成了人人害怕,人人自危的局面,所以,领导也在集训会里增加了力度:工作组进驻了,贫宣队进驻了,教师们睡在地上打的通铺上,夜晚不准关灯,有问题的人起夜,立即有人跟了去;深夜,有人被工作组喊了去,让其老实交代。有一个工作组组长,是派出所的所长,出来进去都挎着盒子枪,看到怪吓人的。

大字报揭露出来的问题成千上万,加上自我反省交代的问题,这一下可忙坏了领导和积极分子们,他们要分门别类地整理到人,然后排出这些人“问题”的轻重。问题轻的要写检查,上会交

代反省;问题重的,结合此人的家庭出身、背景材料和现实表现等方面,找出有严重问题的人,他就是重点批判的对象了。

二 在劫难逃脱层皮

最先被列为“暑教会”重点批斗对象的,是一个外号叫“流堂鬼”的教师。那是一个天气燥热的晚上,穿着汗衫和短裤的教师们按照带队人的指令,整齐划一地进入会场,所有的人都坐在地上,还要竖成列,横成行。

这时,主席台上已经坐着县委副书记乔××。主持人宣布批斗大会开始,就听见有人喊:“来了,来了!”只见两个彪形大汉押着“流堂鬼”,一人朝后拽着一只胳膊,站到主席台下。

第一个上来发言的,是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大概是“流堂鬼”的同乡吧。他操着浓重的关中腔说:“大家当×××是个啥东西?他老子是个历史反革命,一个地地道道的反动军官,手上沾满了人民的鲜血;他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们祖祖辈辈剥削压榨劳动人民,使贫下中农吃不饱穿不暖,受尽苦难;他老婆也是一个地主婆,和他是一丘之貉。”这时,有人问:“叫他交代,他老婆是个什么人?”“流堂鬼”小声说:“是地主女儿。”“放屁!地主女儿也是地主婆!”有人喊。批判的人继续说:“他的身上长满了反骨,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对天下劳苦大众,他所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都是出于他反动的出身、反动的家庭、反动的经历,是有深刻的历史渊源的。”这时,“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打倒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大会安排的第一个发言人,对“流堂鬼”挖了根,定了性,这个“黑帮”已经铁定了。

这时,“流堂鬼”的头被电灯泡烤得受不了了,成百上千扑灯蛾子爬得满头满脸都是,他不停地用手去拨弄。看到这种情况,马上上来两个壮汉,把他的手向下重重地一按,把肩膀往上一提,让他的脑袋离灯泡更近了。在一个火辣辣让人烦躁的三伏天的夜晚,大灯泡烤着,扑灯蛾在头上薮着,幸亏被批判的人身体还结实,不然早就昏倒了。

下面,又连续揭露批判了几个所谓问题。

一个是,“流堂鬼”在一次教师学习会上,看到饭桶里装的面片太稀,尽是汤水,一勺子舀上来,稀溜溜的没见几块面片,他讥讽地开玩笑说:“哎呀!你们都让开,我要脱裤子下去捞了!”当时就惹得大家一笑。但是,事至今天,此话是从这个地主崽子口中说出来的,就彻底的变味了,成了恶毒攻击党的粮食政策,恶毒攻击形势一片大好的社会主义了。会场上“誓死捍卫党中央!”“打倒地主阶级小狗崽子”的口号声震耳欲聋。批判发言的人更加激动了,声嘶力竭地吼道:“对于这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我们广大革命群众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要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时,会场有人起了个头,全场几千人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革命歌曲,声势更加雄壮浩大。那两个壮汉又上来了,一个拿了一条长板凳,一个拿了一个大牌子,先命令“流堂鬼”低下头来,给颈脖挂上大牌子,上面用墨写着“黑帮×××”五个大字,名字上还打了一个大红叉;又命令他站到板凳上去,头比电灯泡要高出许多,他只有向下猫着腰低着头站着,头上的汗珠子簌簌地往下掉,两条腿吓得觳觫发抖,快要站不住了。

第三个揭露的问题,是说学校附近生产队里有个男青年,身体不好,细麻腰杆的,那个人说他是基干民兵,“流堂鬼”打趣地说,“你也是基干民兵?是鸡蛋民兵喽!”这话也给他上纲上线了,说他是攻击党的国防政策,污蔑民兵组织建设,企图动摇军心,毁我长城!你看,在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呀!

批判大会,一共给被批判者罗列了十大罪状。我们坐在人堆里,没有一丝风,憋的人出不来气,热的汗流不止,直到“流堂鬼”被押送下去,我们列队出了会场,人才缓过来。

大揭露、大批判越来越厉害。红卫兵小将押着几个人过来了,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现行反革命”。其中一个据说是哪个中学的教师。他的罪行是,看到报纸上毛主席畅游长江的报道,他炫耀说:“我儿子长大以后,还要叫他畅游太平洋呢!”这话还了得!你是一个啥东西?你不过是吊死鬼上天堂,敢跟玉皇大帝

比高低？还有一个女老教师，披着的头发都有些花白，她在墙上换毛主席像时，有人问她原来的旧像怎么办，她说："把它烧了吧，丢在哪里也不好。"这一下出事了，人家说她污蔑伟大领袖，就是反革命。她的女儿还在上学，被一位回族同学的妈妈救了，叫住在她们家里，这才免遭牵连。红卫兵小将押着这一杆子人，一边走，一边唱着："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唱罢，又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谁敢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安康县五里中学有一位老师，年近五旬，是该校语文组骨干教师，他的古文功底十分深厚，对中国古代名著中诗词也背诵如流，给学生讲课深受欢迎。一次批斗大会突然将这位老教师推出来批斗，理由是有人揭发他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这位老师曾说过：毛主席的"东风压倒西风"是从《红楼梦》中王熙凤说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就是西风压了东风"中学来的。《红楼梦》是大毒草，王熙凤是封建王朝孝子贤孙，这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加之这位老师来自旧社会，上中师时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这位老教师自然被批斗得成了臭狗屎。"暑教会"结束时，他被开除公职，送回老家农村劳动改造。这位耿直的知识分子想不通自己兢兢业业干了多年，竟落到这样的下场，一股怨气郁结于心，得了癫痫病，后半生苦不堪言。

"暑教会"进行了一个阶段后，根据"十六"条精神，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走资派"，领导小组觉得光整教师似乎说不过去，加之安康县教育界"反动学术权威"云集，总要有人担担子。经过多次密商，决定将县文教局袁局长作为"走资派"的代表，推出去让群众批斗。原因是袁的家庭出身不好，自己家、岳父家都是地主，系旧社会名门望族。但袁口齿伶俐，反应敏捷。在交代所谓"三反罪行"时，总是先从出身地主阶级家庭，自动上纲分析其阶级根源。这样就得谈自己的生平经历。每谈及自己在旧社会上高中时期即加入地下共青团，并将自己家庭作隐蔽所，与安康地下党秘密联络传送情报时，台下教师像在听革命故事，会场上十分安静。有的人边听边思索："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袁投身革命，这可是要冒抛头颅洒热血危险的呀！这样的人也会反党反毛主席！？"批斗大会的火药味一下少了许多。

更让县委县政府头头们不安的是，在批斗袁的大会上，让他交代重用坏人，提拔×××当校长、×××当教导主任的"罪行"时，袁不慌不忙地从口袋中取笔记本边翻阅边说："此事我有罪，局人事股报来××当校长，我是同意的。随后上报县委县政府，1962年×月×日早9点，×县长答复同意提拔××当校长。"在交代重用坏人. 乱拨款项、乱批基建项目时，袁都能从笔记中找出某件事经县委×书记或县政府×县长批准的地点和日期。而批斗袁的大会上，这些书记县长就坐在台上，弄的他们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不知所措，批斗大会到了进行不下去的程度。

三　国际悲歌歌一曲

在这"暑教会"的中期，当权者突发善心决定放假一天，让包括被揪出的"黑帮"在内的全体教师可回家看看。放假的前夜，担任大组长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集合二百多名被揪出的"黑帮"训话："给你们也放假一天，但出去后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如谁人想自杀，那也随便，汉江未曾加盖，各自家中的菜刀、绳子想也有的。死，吓不了我们共产党人，但你只能是自绝于人民，罪上加罪，你死了，你的子女还是黑帮狗崽子。"

有一个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教师，经过大会小会的轮番批斗，精神、身体完全垮了下来，终于不堪重负，趁着晚上大家休息的时候，跳到汉江自杀了。遗体是捞上来了，但是他的罪行还要清算，棺材上还贴着大字报，批判会照样举行，因为他死有余辜。

安康县五里区有一位姓赵的优秀教师，年方26岁，1米8的个头，一表人才。赵老师毕业于一所师范学校，能歌善舞，深受学生欢迎。刚工作几年，就在省市报刊发表了不少诗歌散文。加之平时爱写日记，于是在批斗赵老师的大小会上，将赵老师作品大肆歪曲，剖析得入木三分，容不得赵老师对自己作品作任何解释，将一顶顶"反党反人民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帽子给赵老师扣到头上，接着挂牌子、跪地、游街、打骂凌辱无所不用其极。这位优秀教师，承受不了这沉重的压力，终于在"暑教会"被逼疯，自杀了。

孙中山最后的日子

○　鄢增华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为了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北上。长期的艰苦斗争使孙中山积劳成疾，1925年3月12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不幸在北京病逝。

孙中山逝世前后的情况是怎样的？他与病魔进行了怎样的斗争，又留下了怎样的遗嘱？作者将通过本文向读者一一讲述。

与病魔做斗争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在天津停留了29天后，扶病入京。

入京前，孙中山发表了《入京宣言》，再次强调此次进京不是为了争夺地位和权力，而是为了救国。到北京后，由于病体不支，孙中山只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就径直入住北京饭店。

1月3日，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加剧。经美国、德国、俄国医生会诊，认为孙中山患有肝部慢性发炎及肝部肿胀急性病，所以才会感到异常痛苦。美国医生建议“用爱克斯光探照一次，如果是肝脏浓疡，则须开割。”医生与孙中山的随行人员商量，但无人敢做主，后又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庆龄认为孙中山年事已高，进行手术恐怕不容易恢复。随后，宋庆龄又征求孙中山本人的意见，孙中山自觉病情并不严重，所以认为无须开刀治疗。

本来，孙中山就是抱病北上的，到北京后又夜以继日地工作，接见各界来访人士，与段祺瑞进行不懈的斗争，劳累导致他的病情日益加剧。

医生不断地对孙中山的病情进行着观察，自1月21日起病势骤然加重，体温升降失常。23日，德国克礼医生发现孙中山的眼球中有黄晕，意识到肝脏中的脓将侵及身体的其他部位，非施

赵老师自杀后不久，又有恒口中学秦老师因受不了批斗的折磨，用钉子钉头部自杀身亡。还有一所农村中学的团委书记，文革初期作为积极分子也曾积极发动学生批斗教师，在“暑教会”上却被人揭发有“三反罪行”，几番批斗后不堪忍受，也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时至9月，依惯例学校该开学了，可还是得服从革命需要暂缓开学，“暑教会”继续，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暑教会”一直延长到秋末的10月才结束，83天时间里共批斗了中学教师的44.6%，小学教师的21.8%。

那么，被批斗的教师怎么处理呢？于是由县纪委书记牵头，连续用一周时间，昼夜不停——写结论、读结论、确定处分意见。因为人数太多，暑热难耐。工作人员读结论时，这位书记却在酣睡。当商定给何处分时，这位书记只问：“多大年龄？”“有无历史问题？”“家庭成分？”只要过40岁，沾上历史问题，家庭成分不好，这位书记即摆摆手定为“双开”（开除公职和党团籍），并说，这能给国家节省很大一笔工资。

“暑教会”结束后，县上又将238名被揪斗的“黑帮”集中到三干会等候处理，最终将192名教师戴上各种“帽子”开除公职，46名教师被送往水库“劳动改造”。与此同时，文化大革命已在各单位全面展开，批斗各级当权派成了“斗争大方向”，于是，从地、县委头头到各单位领导几乎都成了“走资派”，相继被剥夺了权力，纷纷“靠边站”，不断接受造反派的批斗。与此同时，安康各单位造反组织逐渐形成“红三司”“六总司”两大派，由文斗发展到大规模武斗，山城遭到灭顶之灾，留下一片断垣残壁，一千多人命丧黄泉，仅安康中学就有8名刚进入青春年华的学生相继死于非命。■

（作者均为安康市退休教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行手术不可。于是立即会同中国、德国、美国的医生,共同商讨手术方案。

1月26日,在宋庆龄的陪同下,孙中山由北京饭店转入协和医院。6时30分,由外科主任郃乐尔为孙中山主刀,施行手术割治。代院长刘瑞恒、王逸慧等作为手术助手。德国、俄国的医生及汪精卫、孔祥熙、孙科等人则在一旁观察。宋庆龄在邻室坐候。当郃大夫将孙中山的腹壁切开后,眼前的情况让所有在场的人吃了一惊,只见孙中山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面上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整个腹腔内脏器粘连在一起,已经根本无法进行手术。郃大夫从肝上取出小块组织做活检标本后,就将伤口缝合了。整个手术进行了25分钟。

手术结束后,国民党特聘俄国医生就根据他所看到的手术结果向几位国民党要员报告:先生今天手术的结果,据肉眼看到的判断,应该为肝癌。

医生随即对孙中山的肝组织活检标本进行了化验,最终得出的结论与俄国医生的判断一致:孙中山患的是肝癌,而且已经处于晚期。

据医生分析,孙中山的病症起于大约10年前,当时孙中山经常胃痛,许多人就认为这是孙中山肝癌的肇始。

孙中山患病住院的消息,在日本被传为孙中山病逝,这引起了孙中山很多日本好友的震动。孙中山的老朋友梅屋庄吉于1月27日从报纸上获悉后,心情异常悲痛,他在《备忘录》中写下"是日,挚友孙文逝世。"此时的梅屋庄吉大病未愈,无法远行,他找到萱野长知、头山满、古岛一雄等人商议,决定派萱野长知为代表,前往北京参加葬礼。萱野于当天晚上离开东京,取道朝鲜,赶赴北京。接着,梅屋庄吉拍电报给居住在中国大连的养女梅子,要她代表他们赴北京参加悼念活动。萱野长知于2月4日到达北京,让他又惊又喜的是日本关于孙中山逝世的报道是错误的,好友孙中山虽然病重,但依然还在。他抵达北京后赶到协和医院探视了孙中山,并把在离开东京前梅屋庄吉夫妇特意托带给宋庆龄的一束鲜花献给了她。

萱野长知探视孙中山后,就立即致电梅屋庄吉:"孙文尚可"。梅屋闻讯,喜出望外,立即致函宋庆龄等人,要求竭尽全力,设法使孙中山脱险。当时,日本有一位治疗癌症的权威——中井博士,梅屋拟请他前往北京参加会诊,并将这一计划与在北京的萱野电商,询问是否可行。但北京的医师团认为此举已经无济于事。梅屋的计划未能实现。

孙中山患癌症的消息传到广州,大本营及省署要人都大惊失色,何香凝更是掩面而泣。廖仲恺得知孙中山病重的消息,也非常焦急,并想亲自进京探视。但因为广东方面党务、政务和军需都集于他一身,一时难以脱身,而孙中山也示电:"广东不可一日无仲恺"。于是,廖仲恺就对夫人何香凝说:"孙先生的病恐怕难治了,孙夫人很忙,我现在因党务、政事、军需又都不得脱身,第一次东征军事行动,都要我亲自料理,不如你到北京去帮忙一下吧。"又说:"你去北京,'孙夫人有事时也可以有个商量'。"何香凝对孙中山的病本来也着急得很,经廖仲恺这么一说,她便匆忙整装,赶赴北京照顾病中的孙中山,兼顾照料宋庆龄。

何香凝于1月26日离开广州,先到上海,打算乘船北上。在等待船票期间,到孙科家中探询情况。当时孙科已去北京,其妻陈淑英因怀孕不能远行,便托何香凝带上孙中山的长孙孙治平同行。何香凝于2月10日下午抵达北京,下车后就到协和医院探望了孙中山。

从2月16日起,协和医院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放射性镭锭照射的方法,对孙中山进行最后的治疗,但病状未见任何好转。当晚,刘瑞恒院长致书孔祥熙、孙中山家属及国民党,宣告绝望。

这时,大家都主张改用中医治疗,期盼着奇迹的出现。

2月18日中午,孙中山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馆,由张静江、胡适等推荐中医陆仲安前来诊治,先进黄芪、党参一两剂后,脚肿尽消。20日陆仲安复诊,再开中药煎饮。西医克礼也报告说血液循环渐有进步,午餐进食几乎恢复正常。

三份遗嘱

孙中山在改用中医调养后,似乎各方面都有了好的起色。但到了2月24日,孙中山病情又发生大变,早上,他突然不能吃任何东西了,而且气

息变得微弱，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经中医唐尧卿、周树芬等前来诊断，谓“头身发热，脉象洪大，舌乏津液，其色鲜红，决为肝血大亏之证”。

看来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而请求孙中山立遗嘱的事情也不得不提上了日程。

看到孙中山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四人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一起来到孙中山病床前。

感觉到有人进来了，孙中山微微睁开眼睛，问：“你们有什么事吗？直说无妨。”说罢，又把眼睛闭了。汪精卫说：“我们四个人，今天是以同志的资格来看总理的病况的。总理的病，大概不久就可以好了。不过好了以后，可能要经过长时间的调养。总理在调养的时期内，本党的事情很多，而且很忙，不能停滞的；一定要有同志代总理执行党务才好。要有同志能够代总理执行党务，合乎总理的意思，没有错误，一定要总理先说几句话，让各同志有所遵守才好。”

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话，好一会儿没说话。许久才说：“我没有什么话要说。我的病如果是好了，有许多话说不完，我就搬到汤山去休养，费几日功夫，详细的分别的对你们说。我的病如果是不能好，还有什么话好说？”汪精卫听了孙中山的话，再次委婉地请求道：“看总理的病是一定可以好的，不过在没有痊愈之前，恐怕调养的时间太长，不能处理事务，而本党的事务，现在又是很忙，不能够停滞，所以还是希望总理早说几句话，让我们能够遵守，照那些话去进行党务才好。”孙中山听了汪精卫的话，又沉默许久，忽然睁开眼睛，叹了口气说：“我看你们很危险的啊！我如果死了，敌人一定要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你们的！你们如果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是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说罢，孙中山又闭目不语。汪精卫又缓缓地恳求道：“我们跟着总理奋斗了几十年，向来都没有怕过危险，以后还怕什么危险？向来没有被敌人软化过，以后还有什么敌人能够软化我们呢？不过总是要总理先告诉我们几句话，令我们有所遵守，方才知道怎样去奋斗。”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么话呢？”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是赞成的，就请总理签个字。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孙中山一听，便让汪精卫将准备好的内容念给他听。汪精卫取出一张写好的遗嘱读道：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

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听完，点头道：“好呀，我甚赞成！”

接着，宋子文又继续请求道：“先生对于党务既是赞成说几句话，对于家属也请说几句吧。”孙中山表示同意。汪精卫随即将准备好的第二张纸取出来读道：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共有三份遗嘱，除了国事遗嘱和家事遗嘱，还有一份《致苏俄遗书》。关于这一份遗嘱，汪精卫说是陈友仁起草的，而据何香凝回忆，这份遗嘱是2月24日孙中山用英文讲述，陈友仁、宋子文、孙科等记录的。不论怎样，这份遗嘱一定是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同。

遗嘱准备好后，汪精卫等本来想请孙中山当即签字。但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听到宋庆龄在室外哭得很伤心，很不忍心，就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汪精卫一听，不敢再请孙中山签字，立即将遗嘱稿折好放入衣袋中，离开了孙中山病房。

3月11日凌晨，孙中山忽然神志清醒，就召唤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到病榻前，并对他们说：“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底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

本人死亦瞑目。”

上午8时左右，何香凝进病房探视，突然发现孙中山的瞳孔开始放大。她赶快跑出来对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但顶困难的是，有什么方法使孙夫人能忍耐些时呢。因为先生平时是最仁爱的，他若见了夫人在旁边哭，他一定是不肯签字，致令夫人伤心的。”汪精卫同意何香凝的话。何香凝又找到宋子文，对他说：“遗言中尚有致孙夫人者，今日不签，迟恐不及。”于是，何香凝和宋子文一同找到宋庆龄，向她表达了请孙中山马上签署遗嘱的意思。宋庆龄深知孙中山遗嘱的重要，她忍痛含悲说：“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仅不愿意阻止你们，我还要帮助你们了。”于是，汪精卫就将孙中山的家属和在京的国民党员一起召唤到孙中山病榻前，这时已到了中午。

汪精卫将两份遗嘱呈给孙中山，孙科把钢笔递给孙中山。但此时，孙中山连签字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到孙中山握笔有些颤抖不能自持的样子，宋庆龄含着泪托着孙中山的手腕让他签字。孙中山所写的字虽然腕力很弱，但“孙文，3月11日补签”几个字却非常清楚。孙中山签过字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在场的其他人员宋子文、邵元冲、戴恩赛、孙科、吴敬恒、何香凝、孔祥熙、戴季陶、邹鲁等九人，也都在证明者下面签了名。签完国事、家事遗嘱后，陈友仁将《致苏俄遗书》呈给孙中山，由宋子文念了一遍，孙中山听后，用英文签上了名字：SunYat-sen。

“和平、奋斗、救中国”

签完遗嘱后，孙中山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也清楚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于是，在遗嘱上签过字后，他对身边的人说道：“我这回放弃革命根据地的广东，来到北京，是为谋和平统一的。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自由平等的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以致主张未能达到！生死本不足惜，但是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义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我希望各位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不平等条约即得废止，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死了也是很瞑目的！”说罢，整个房间里静然无声。众同志和家属都掩面暗泣，悲不可抑。

到了中午，孙中山就神志不清。下午4时3刻，孙中山开始说起了胡话，他让李荣抱着他的头，马湘抬着他的脚，将他抬到地上。李与马没敢从命。宋庆龄此刻听到了孙中山的呼唤，赶紧上前用英语问：“亲爱的，你要做什么？”孙中山说：“我要到地上睡一会儿。”宋庆龄说：“地上太凉，不能睡。”孙中山又说：“我不怕冷，放在冰上才好呢。”宋庆龄听了孙中山的胡话，知道高烧已经把爱人摧残的不能正常感知了，她转过头去，掩面而泣。孙中山安慰她说：“亲爱的，别难过。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宋庆龄深情地答道：“我什么都不爱，只爱你。”

此时的孙中山时好时坏，精神好些时他就与宋庆龄说说话，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世，就对宋庆龄说，他死之后希望能像列宁那样用防腐药品保存身体，并希望“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讲完这番话，孙中山握着宋庆龄的手跟她做最后的诀别，宋庆龄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孙中山又连连呼叫“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声赶紧赶到孙中山病榻前。何香凝边哭边对孙中山说：“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然尽我的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听到何香凝的这一番话，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晚上，孙中山又召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到病床前，嘱咐他们要“顺事”夫人宋庆龄。当晚，孙中山还讲了许多话，或中文，或英文，频频反复地说：“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凌晨1时30分，孙中山突然频繁辗转，气息越来越微弱，医生见此情景，就让家人和国民党同志围绕在孙中山病榻前。此时的孙中山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不能连续讲话，只是断断续续地不断重复着“和平”“奋斗”“救中国”“国民会议”“同志奋斗”。

9时30分，一代伟人孙中山停止了呼吸。■

（作者为南京中山陵孙中山纪念馆馆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我的“罪行”

○ 王蔼民

做梦也不会梦到，教书，教中专化学，竟然会教出“罪”来。而且，我真“幸运”，我的这个“罪行”抚今追昔还是绝无仅有，可以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的。

文革初期的一天，在工作组的操纵指挥下，貌似斯文，不学无术的校长带领不明真相的学生批斗我。校长气势汹汹声嘶力竭地质问：“你，必须交代，你的一大罪行：污蔑革命导师恩格斯。”稍作停顿之后，接着说：“你给学生讲课，说恩格斯对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门捷列夫是反动学术权威，革命导师恩格斯怎么会对反动学术权威以很高的评价？你这是污蔑革命导师恩格斯！”话音刚落，“革命小将”们也纷纷高喊“赶快交代！为什么污蔑革命导师恩格斯？”听了这令人可气、可笑、可悲、可叹的狂喊乱叫，我随即回答：“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它反映了元素的内在联系，为以后的科学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特别是对无机化学的系统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直接影响到其他科学。元素周期律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从自然科学上强有力地论证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对元素周期律的发现给予很高的评价，说这是‘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是恩格斯的原话，你们如果不信，现在就可以拿来我们的中专化学课本，翻到第××页，上面一清二楚，怎么成了我污蔑革命导师恩格斯？”

我这样“不识时务”，把校长激怒了。他气急败坏地说我态度恶劣，是“疯狂的反扑”。在他的鼓动下，“革命小将”们有的高喊口号：“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有的向我脸上吐唾沫。我下意识地擦拭，“小将”们又质问道：“怎么，革命小将的唾沫你还嫌脏？”之后，他们逼我签字画押，承认“罪行”。我坚决不签，要他们找来课本，翻开亲眼看一看。他们说：“不用看！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现在群众说你污蔑革命导师恩格斯，你不承认，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你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就是反对毛主席。你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不容分说，便把“现行反革命”的大纸牌子挂在我的胸前。

会后，我仍不屈服，要到市委告他们，被他们拳打脚踢，打得我皮开肉绽、遍体鳞伤，胳膊险些被拧断。我却始终如一，没有屈服。

后来，我所教的中专班学生对我说起，那天，他们被迫参加了批斗会。临开会前，工作组作了安排：“批斗时，要加大火力，加大压力，文的不行，来武的！”在会上，当他们看到技工班（初中程度）的同学们不明事理跟着校长胡折腾、侮辱人时，他们不忍目睹，有的低下头，有的扭过脸，眼含热泪，敢怒而不敢言。

我还听说在批斗会上，有位教师实在忍不住便悄悄地扯着校长的衣服轻声说，在《自然辩证法》里，恩格斯真是这么写的。

是的，真是这么写的。这是无可置疑的！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显示了理论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第51页高度评价了门捷列夫的工作：“门捷列夫不自觉地应用黑格尔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完成了科学上的一个勋业，这个勋业可与勒维烈计算尚未知道的行星海王星轨道的勋业居于同等地位。”

我不知道，杰出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在天之灵如果得知中国的反动学术权威不够抓，还到外国，到天国去抓他，有何感想？

我不知道，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在天之灵如果得知被他高度评价的门捷列夫在中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何感想？

痛定思痛。我想，如果这位校长能多读书，把文化素养和思想觉悟提高一些，即使处于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那样特定的历史年代，也不至于演出这么一幕愚昧无知、荒诞无稽的闹剧，也不至于对我如此“厚爱”，赐予我这么一个“史无前例”的“罪名”吧。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 石名岗

1974年到1975年间，山西太原发生了一件石破天惊的“反中央文革”的大案，上报中央后，江青批示：“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反革命集团。”这个集团是由张珉、赵风岐等人发起的，故称为“张赵集团”案。

一

“张赵集团”的主要成员有：

张珉，文革时是太原重型机械学院学生，曾任过“红联站”（是山西省一个群众组织，先造反，后保守）总负责人，毕业后，在太原化肥厂任汽车队机械员。“张赵集团”的“党支部”书记，即第一把手。

赵凤岐，太原化肥厂工人。文革中为“红联站”职工部部长，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太化成立革委会时，任革委会成员，武装部副部长。“张赵集团”的“党支部”副书记，即第二把手。

张耀明，文革时为“红联站”山大附中“八一八”负责人之一。1970年毕业分配至太原化肥厂，任车间团支部书记。

罗建中，文革时为太原六中初中学生。1970年调入太原化肥厂当工人。

常理正，文革时为太原十五中高三学生，“红联站”十五中红旗负责人。1969年毕业后分配至太原变压器厂汽车队工作。

李兆田，晋中行署水利局技术员。文革初成为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总司令，是陈永贵的对立面。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委员，山西省水利局副局长。

平崇义，老干部，山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革委会副主任。

魏润福，文革时为太原三中学生，“红联站”太原三中红旗负责人。1969年分配到山西省运输公司，任团委副书记。

“张赵集团”是从太原化肥厂发起的。在赵凤岐的联络下，张珉、张耀明、罗建中等学生先后进入太原化肥厂工作。由于这些人过去就认识，所以来往就比较多。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国内社会矛盾愈加尖锐，政治上比较活跃的青年人凑在一块，议论政治，谈天说地，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张珉为精神领袖的小圈子。”他们先是组织了“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探讨解决尖锐社会矛盾的办法。后来，张珉、赵凤歧等人在太原市纯阳宫某地召开一次成立支部的会议。张耀明回忆，这次会议确定了组织上的分工，由张珉、魏润福负责组织发展；赵凤岐负责武装；罗建中负责外联：张耀明负责理论宣传。

会议还确定了章程和纲领。他们承认中共党章就是它的纲领，但对于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与当时的中央文革主导的中央有着原则的区别。这个区别体现在张耀明1974年所写的《论现状》文章之中。这篇文章是张耀明按大家学习讨论的结果和张珉商量后所写的，可以说是“张赵集团”的纲领性文件。

《论现状》的主要论点是：

（一）自党的九大以来，我党所采取的政治路线是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基础上，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执行了一条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极左路线，可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目前现状的总根源。

（二）这条路线颠倒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关系，脱离开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片面突出强调阶级斗争，错误地提出一种实质上是以搞阶级斗争代替一切的理论。

（三）这条路线在对待党的历史上，缺乏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事件评述，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根据需要肆意歪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

（四）在社会主义阶段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

表现在分配上，体现为工农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消灭这种差别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实行物质奖励。

（五）中国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甚少的国家，若这一小部分人也不能自觉拼命搞科学技术，我们的工业水平、农业现代化靠什么来提高呢。难道仅靠学大寨就能把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吗。我们希望国家不要忘记，那些参加工作几十年的老知识分子的历史功勋，莫将他们全赶进牛棚去改造灵魂，更不要忘记那些经过文化大革命风雨考验真正走向工农相结合的历届毕业生，唯他们才是我国经济建设的可靠栋梁，我们希望国家委以重任。

（六）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可惜的是，这批宝贵财富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态度暧昧，热情不高。原因在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永跟不上的天书，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条条，他们根本看不清，摸不见。

（七）鉴于历史教训我们认为，以党内斗争的角度而言，每一个党的领袖、领导人，都可以光明正大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有权通过电台、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治国方案。而苏联恰是在这一点上出了问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党内民主权力高度屈从于个人权威之下。以我划线，把个人与党看成同体，反对派一发表意见，就扣上机会主义、反党分子帽子。在政治上，肉体上判处死刑，强行剥夺领袖人物的申辩权力，不让人讲话，实行党内独裁，导致斯大林时代的黑暗。

（八）文艺作品完全变成了某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传声筒。在名曰“革命的浪漫主义”指导下，形成了一点也无“浪漫”可言的创作公式，作品内容成了大同小异的填词，阶级斗争是唯一主线，英雄人物“高大全”到常人不可理解的高度，所谓“三突出”模式，更是公然宣传英雄创造历史，老百姓只配跑龙套而已。

二

“张赵集团”在确定纲领和组织原则的同时，加强了外联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张耀明回忆，负责外联的罗建中告诉他，省出版社社长刘江的儿子在部队工作，在青海时认识叶帅的秘书叫鲁克勤，后下放连队蹲点，受叶帅赏识，回来是搞社会调查的。有一天，罗建中找我，带来鲁克勤的一封信，大意是经罗介绍引为同道，并邀请张、赵加入他们的组织，这个组织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我看后很钦佩这个人的政治见解，觉得人家有深度，有思想，很想结交这样有政治头脑的朋友。我们把情况向张、赵汇报后，决定加入中央二委。之后，罗建中传来的中央二委的“手抄文件”隔三差五地送来，所书内容都是我们闻所未闻的党内动态简报和以中央首长名义的讲话文章等，我记得共有16份文件。这些文件不论其真假程度如何，相信其自有来历，但绝不是罗建中能编出来的，我们可以借这些文件为据，作发展人的工作，让别人相信我们背后有中央某些人的支持，是个强大的组织，最不济也可当陈胜吴广起义的那条“鱼”，借神起事。而鲁克勤也通过罗建中之口，传达了几条对我们的要求，我也写了一个与鲁克勤见面会谈的提纲，提出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问题，经罗建中来回传话，我们明确了以下几点：

（1）我们的后台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央委员会，我们可作为一个基层支部。

（2）二委的主席周恩来，最高统帅叶剑英，总参谋长邓小平。

（3）我们的政治立场是支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康生、陈永贵等人。

（4）我们认为毛主席在文革中打倒大批老干部是错误的，似乎中国革命只有他个人一贯正确，这违反马列主义常识，如果把周总理也打倒中国前途不堪设想。

（5）刘少奇、彭德怀、朱德等老革命家在历史上都是有大功劳的，不应全盘否定。

（6）把林彪定在党章上作接班人是荒唐的，党章不是领袖个人的遗书，共产党是选举制不是世袭传位制，林彪能不能接班是党代会决定不是毛主席死后能决定的。

（7）林彪搞政变是机密，对中国并没什么影响，真正祸害老百姓的是极“左”路线的危害，而《“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列举的某些社会现状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实，应当引起重视。

（8）张铁生等的反潮流，实质是顺潮流，我们的行动才是真的反潮流，真担坐牢、杀头、老婆闹离婚的风险。

(9)批林批孔、评儒尊法到儒法斗争，斗到共产党内也有法家、儒家，纯属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伪史学，歌颂秦皇、武则天、吕后更是别有用心，想为江青当“女皇”作准备，应百倍警惕。

罗建中是“张赵集团”中负责与“中央二委”联络的联络员，“中央二委”的文件材料都是通过他“下达”太原支部的。开始的时候，“张赵集团”的成员都是相信“中央二委”是他们的后台，有周恩来、叶剑英统帅、邓小平撑腰，绝对错不了。后来老见不着“中央二委”的直接上司鲁克勤，大家对“中央二委”的信心多少有点动摇。据张耀明回忆，张珉说，即便没有“中央二委”，我们也要继续干，因为我们坚持的是真理。但是，毕竟有后台支持和没有后台支持是大不一样的，所以说，“中央二委”的说法至今是“张赵集团”成员的一个心结。

“张赵集团”与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也有联系。当时被认为是“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首脑的赵一凡与赵凤岐在北京有过讨论和交流。

三

在1974年初，由于活动中的不谨慎，“张赵集团”就已经暴露。据负责侦破“张赵案”的山西省公安局二处侦调科科长闫逢碧回忆：“当时山西的公安机关把群众对‘四人帮’的一些不满言论和反映，当作反革命谣言来追查。太原市公安局汇报，西山矿务局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向市局反映他内弟张铁旦(在化肥厂当工人)说，化肥厂工人张耀明和他说他们有一个组织和上面(中央)有联系，联系人是101(指叶帅)的秘书，经常通过军区的汽车给他们送文件看，看后就拿走了。还说中央现在两派斗争很激烈，一派是老派(京派)以总理为首的老帅们，一派是新派(上海派)，又说中央开了‘华山会议’、‘武林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李先念主持会，要把姚文元当场抓起来等等。市局汇报后，公安部的丁昭家、何大贵说，中央政治局交给部里一件重大案件，公安部施义之，杨贵亲自交给他俩来山西交办，他们说案件是群众给陈永贵副总理写的检举揭发信，说山西一个化肥厂有个叫张耀明的造谣和散布分裂党中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活动，内容和市局汇报的相同。根据市局的汇报和公安部交办案介绍参加会议的人研究认为是一案，当时确定一方面写报告，请示省委立案侦察，一方面由市局进一步调查摸底了解情况，在此期间，又发现省直政办公室刘先志，向负责人李玉祥反映过张耀明与上述相似的情况，当时公安部来人与省公安局负责人一起到省委向谢振华等人汇报了案件情况，1974年2月9日，谢振华、王谦批准立案侦察之后，就通知太原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察。”

魏润福成为第二个突破口。魏润福工作的公司党委书记程文是一位老干部，魏润福与程文关系密切，常有思想交换。魏润福曾把“张赵集团”的“中央二委”的材料给程文看过。程文觉得搞非组织活动不合适，就向某位省级领导作了汇报，致使“张赵集团”的内幕暴露得更清楚。

1974年初，该案惊动了中央政治局。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江青的批示。据说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有过批示。周总理的批示是：“如属实，可查。”由此，“张赵案”就成为中央政治局交办的案件。但是由于这时山西发生了另一件大事，就是1974年3月8日，江青在北京二七剧场穿着军装亲自带头高喊“炮轰谢振华”，从而拉开了长达三个月的“批谢振华、曹中南”的序幕，“张赵案”就被搁置了一段时间。

一直到1974年的7、8月份，王谦(文革前任山西省省长)主持山西省的全面工作，开始清除谢曹残余势力，而“把柄在手”的“张赵集团”成了首当其冲的打击对象。王谦立刻提高了侦破级别，由市局提到省局，亲自指挥省公安局人员破案。1974年8月15日，联络员罗建中首先被密捕。1975年4月，大规模抓捕的条件成熟，省局开始了突袭行动。

罗建中的失踪，也让张、赵方面也察觉到了事情的暴露，张耀明回忆：“在此期间，我和张珉讨论过前途，我们认为中央这场新老斗争不可避免，没有罗这个渠道我们还可以另辟它途，立足自己干，反正已上了贼船，能不能下来由不得咱们，也许形势发展得好，上面解决问题，我们躲过一劫不了了之，也许江青上台咱们成了替罪羊，当不了志士当烈士杀头了事。就在彷徨中，公安局下了逮捕令，1975年4月22日，我、张珉、赵凤岐、郭海、朱长生、魏荣福同时被捕，关进柴村看守所，张赵的活动也就此终止。”

四

“张赵集团”是反“四人帮”的，张、赵等人被捕之后，“张赵案”的未被捕人员还在1976年清明节之际发动了太原的“四五”运动。

太原市所送的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就是“张赵集团”主要成员常理正策动的。常理正是太原变压器厂的年轻人中的领袖，在厂里影响很大，他把制造花圈的原料和笔墨纸张支援给了李静，3月底，李静率领一些人，在太原市人民公园（现太原市儿童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之前，送上了太原市追悼总理的第一个花圈，并举行了追悼仪式，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拉开了太原市“四五”运动的帷幕。太原变压器厂共送了大大小小几十个花圈到五一广场，使太原变压器厂成为太原市送花圈最多的单位。“张赵集团”成员何立言，当时是太原重型机器厂党委办公室秘书，组织了一批人，做了太原市最大的一个花圈，矗立在了太原市五一广场。何立言于5月20日因张、赵和“四五”双重问题被捕。

不可思议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集团”，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王谦为首的山西省委仍然在“不辞劳苦”地追查他们的“罪行”。在北京，与“张赵集团”有关系的“第四国际案”的赵一凡和徐晓，粉碎“四人帮”后一个月被释放。虽然当时没有正式平反，但这说明北京有改正错误的准备。可是1977年清查“四人帮”运动开始之后，山西省委还把“张赵集团”及与其相牵连的“四五”运动人员列为重点清查对象，在山西省和太原市的各级机关单位和大中型企业办了许多学习班。由此受到迫害和牵连的竟达两千多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有三百多人。

原来没有入狱的重点人物“迎来”了新的厄运。原在省水利局学习班的李兆田于1976年11月25日被逮捕；平崇义于1977年7月19日被逮捕；太原锅炉厂技术员胡海清先驻学习班，后被逮捕，死于狱中；“揭发”“张赵集团”的程文被当做“张赵集团”成员于1977年11月8日被捕。常理正被省公安局在本厂隔离。由于牵扯到了李静在“四五”运动中送太原市“第一个花圈”的事情，常理正一下子成了张、赵和“四五”的“双料货”。

张珉、赵凤岐在看守所都是按死刑犯对待的，单独关押，戴着手铐、脚镣。1977年11月19日上午，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赵集团”进行了宣判。以反革命罪判决张珉、赵凤岐、罗建中死刑，张耀明无期徒刑，魏润福有期徒刑十五年，李兆田、何立言有期徒刑十年，平崇义、胡公在有期徒刑八年，程文有期徒刑七年，刘纪儒、张尚官管制三年。

五

据山西省高院的有关人员讲，当时王谦指示该案件由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一审，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按我国的两审制度，二审为终审，正好那段时间，中央把“杀人权”下放到了省里。省高院的负责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们提出的理由是，按中央精神，像“张赵案”这样重大的案件，应该由省高院一审，最高人民法院终审。这样，张、赵才有了“喘息”的机会。

山西省高院按王谦及山西省委的意思，对张、赵判了死刑，但案件送到最高人民法院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是一件明显的反“四人帮”的案件，罪名有许多不实之处。最高人民法院立即组成合议庭对90多件原卷和材料进行了全面的审核，合议庭并于1978年12月赴山西提审了张珉等12名被告人，对该案的事实进行了认真的核对，查明了事实真相，写出了报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仔细审核并批准了合议庭对该案的案情报告。于1979年1月23日致电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电报在简述合议庭认定的案情事实以后，明确指出：“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把他们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判罪是错误的，应该撤销原判，宣告张珉等十二人无罪。在改判纠正以前，对在押的张珉等十名被告人应予先行释放，听候处理；以上意见，请你考虑。如同意，请即指令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1月27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给江华复电：“张、赵案的处理，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1月31日又给江华来电称：“省委常委于今日认真讨论了张、赵反革命集团案……本着有错必纠的精神，大家同意迅速为这一案件平反。”1979年2月4日，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谷震向张珉等12人宣布撤销原判，宣

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高层争论

○ 陈祖甲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科学的春天到来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一件怪事:以“耳朵认字”为起点，逐渐演化为“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科学”的一股风潮。我当时是《人民日报》分管科学的记者，亲历此事。

“耳朵认字”是从《四川日报》1979年3月的一篇报道发端的，受到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的支持，很快传遍全国。一时间，什么“耳朵认字”“腋下认字”等类的“超自然现象”在多种媒体上纷纷亮相，至于表演式的传播四处可见。面对现实，有不少科学家站出来揭穿其中的奥妙，反对宣扬这类所谓“超自然现象”。1979年4月，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对北京一个孩子的“腋下认字”作了科学测试，结果表明系作弊所致。他们写出测试报告，附上当场露馅的照片，在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的“信访简报”第92期上发表。当时任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曾在中科院工作过，他看到这期简报，在4月23日给一些宣传部门的领导作了批示：

“穆之、井丹、绩伟、曾涛、香山同志一阅。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当时的《人民日报》科教部讨论了“耳朵认字”等现象，根据基本的人体生理常识，大家一致认为“耳朵认字”违反科学。于是决定要我写一篇评论。5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祖甲”的《从“以鼻嗅文”到“耳朵认字”》文章，批评一些领导反科学理念。事后，报社与我受到很多的攻击。

之后，在同年11月8日，耀邦同志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给两位宣传部门的领导写下批示：

“穆之、井丹同志：这类事情，科学工作者要怎么办可以由他们去办。但不能公开宣传。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这一点务必请你们把关。”

从这两段批示看，胡耀邦反对“耳朵认字”等伪科学，态度坚定，旗帜鲜明，与此同时，由胡耀邦主持的中宣部向各地媒体发出通知，规定对那些没有经过科学鉴定的奇事，不宜公开宣传。于光远、叶圣陶等一批知名人士也站出来批评，媒体上对“耳朵认字”之类的伪科学发表了不少批评的文章。《四川日报》发表四川医学院对那个小孩子的测试报告，证明所谓的“耳朵认字”完全是作弊、要小把戏所致。

但是，那些“特异功能”的支持者指责反对者“摆出一副中世纪宗教审判官的架势来教训人”。上海有一本名为《自然杂志》的科技期刊，在其1978年的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什么是气功外气属性的文章。1979年9月发表了“耳朵认字”的“考察报告”。这件事得到时任国防科委科技委副主任的钱学森的关注和支持（当然还有主任张震寰）。他专程访问了《自然杂志》，给他们鼓励，在1981年的《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论述系统科学、思维科学和人体科

告无罪，并立即将在押的10人释放。

1979年初，最高人民法院把“张赵案”平反材料报上胡耀邦的案头，胡耀邦批示要求在春节前释放张、赵等人，让同志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但山西一直拖到2月4日（正月初八）才释放。

1979年2月27日下午，中共山西省委、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在太原湖滨会堂召开群众大会，为“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案平反昭雪。■

（作者为太原锅炉厂高级工程师）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学。“耳朵认字”等在遭到批评后，改名为“人体特异功能”，钱学森又将其演化为“人体科学”。按钱的论文所述，“人体科学”包括三项组成：人体特异功能、气功和中医，而气功又是中医的核心。这个概念在他1980年7月同《自然杂志》编辑谈话时就已经提出了，后来正式公开。然而，这个概念至今没有得到中国科技界的承认，权威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也没有同意这个概念。

钱学森及其拥护者于1980年2月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研讨会。1981年5月在重庆召开第二次研讨会上，钱学森提交论文《开展人体科学的基础研究》。会议提出筹备人体科学研究会。钱学森还几次出版专著，最全的是由上海交大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字数达108万。这个理念虽受到实践的检验和理性的批评，但他一直坚持，直到他去世。

面对“特异功能”支持者的反批评，曾担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于光远一方面组织人员继续进行调查（当时调查测试非常困难，不只是经费不足，而且常常被人以“受到干扰发不出功”为借口，或拒绝测试，或为失败辩护），另一方面自己经过研究，写文章提出批评。他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发表连载文章《评两年来“耳朵认字”的宣传》。该文指出，所谓“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古已有之，国外称“心灵学”也不过如此。鲁迅先生在杂文中也早有揭露。他提醒人们，应当按恩格斯《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的指点，作理性的思考。

1982年2月24日，中国科学院举行报告会。于光远在会上作了题为“对所谓人体特异功能的历史的科学的分析”的报告。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表示不相信“人体特异功能”，但不反对对人体作严肃的科学研究。第二天，《人民日报》对此次报告会作了报道，并配以由总编辑胡绩伟亲自撰写的编者按，明确表示“我们不相信‘耳朵认字’”。

3月13日至15日。由国家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联合主办，召开了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调查研究会。来自北京、上海、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十个省市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新闻出版单位60多位有关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研究、讨论了两年多来国内“人体特异功能”的宣传情况，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进一步做严格科学测试的方案。会上还放映了四川医学院对成都19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进行测试的录像，记录证明没有一个儿童具备“非视觉器官图像识别”的“特异功能”。中国杂技团的魔术大师成功地表演了“透视”功能。

“人体特异功能”的支持者们并没有退让，他们多次找又一些中央高层领导表演“特异功能”，并借此大肆宣扬。当时的国防科委科技委主任张震寰亲自出马给反对“特异功能”的我国心理学家潘菽、李昌、于光远分别写信，指责有加。

接着，他又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写信，要他们相信“特异功能”的存在。他在1982年3月5日给胡绩伟的信中说：“李昌同志不相信，说他看到的‘耳朵认字’都是假的，那么再找真的看看不好么，这不是辩证法么？于光远同志根本不屑一顾，这是唯物论么？什么叫实践第一的观点？你们有哲学家王若水同志，请他说一说吧。连起码的哲学常识都违背了，《人民日报》作了殉葬品。”

“你们登起文章很大胆，做起事来又胆小，有点不相信自己。谁是科学领导机构，国家科委应当是，但不知他们怎么领导的？就拿耳朵认字来说，你们错了。谁是有权威的科学机构？科学院算一个，李昌同志和报上登的几位著名科学家也不是正确的，最权威的是客观事实，白纸写上黑字是砍不掉的。”他还特意请胡绩伟到国防科工委去看“特异功能”表演。胡绩伟派记者（即本人）去看了，结果是新出山的“大师”张宝胜做的表演在记者们面前出了洋相。

张震寰的信被转到胡耀邦那里。从1981年6月起，胡耀邦已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他在1982年4月10日就此信作了批示：

“转乔木、任重、方毅、力群同志。这个问题79年一开始我就怀疑，作过三次批语，提出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有些话我可能说得绝对了一点，但我的主张是站住脚的。但后来我管不着了，报刊上登载不少。现在我仍主张守住这两条线，请宣传部门把关。”

当时，邓力群已接替王任重担任中宣部部长。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王任重也是相信“特异功能”的。就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各宣传系统发出通知，说：“一个时期以来，有些报刊不断进

行了‘耳朵认字’之类的宣传。同时，有些报刊公开发表文章，对这类宣传进行批评。最近，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认为：‘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在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也不要发表批评的文章和消息。”这就是对所谓对“特异功能”“不宣传、不介绍、不批判”的“三不”政策，把胡耀邦坚守两道关的意见作了改变。

因为有了“不批判”三个字，一些“特异功能”的宣传受到限制，同样批评“特异功能”的文章也受到遏制，即便是《知识就是力量》正在连载的于光远文章也夭折了。

钱学森参加的人体科学讨论会

这时，《自然杂志》派人到钱学森、张震寰处告状。张震寰听到后大发雷霆，说：“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咱们坚决干下去，干到底。共产党人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生死置之度外，除了追求真理外，别无他求！”胡耀邦下台后，他私下对《自然杂志》编辑朱润龙说：“钱老真是智慧过人，我当时说的天王老子就是指胡耀邦同志，钱老也一下子就明白了。”（见朱润龙、朱怡怡编辑的钱学森《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后记》）

就在那次见面后，钱学森征得张震寰赞同，于1982年5月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

信中说：“中国科协四月廿八日通知说，‘耳朵认字’之类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不准在报刊上介绍和宣传。您是知道的，一到下面去执行，就会一棍子打死。上海出版的《自然杂志》就被命令，将即发排的五月号中撤出几篇有关人体特异功能的科学研究论文。难道党对有争议的科学研究能这样处理吗？难道前车之鉴还少吗？不是发动批判过摩尔根遗传学吗？还有批判控制论，批量子化学共振论，批人工智能；还有批数量经济学，批形象思维。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建议您通知上海市宣传部门的同志，正确处理《自然杂志》的问题，不要禁止它刊登科学论文。

“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钱学森的信被转送到邓力群那里，又立即被送到胡耀邦手中。

对钱学森的信，胡耀邦在5月13日作了如下批示：

“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和在科学上还没有充分证实之前，报刊上不宣传，不介绍，也不批评，这两者我看是稳妥的，公正的，要坚决这么办。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

胡耀邦是尊重钱学森的。胡耀邦的批示做了一点让步，提出了“也不批评”。

批示传到中国科协。当时，正逢中国科协召开二届五次常委会。在5月25日的会议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科协主席周培源同副主席钱学森就此发生争执。周培源不仅反对研究“特异功能”，而且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什么“情况汇编”。当时，笔者作为记者旁听了这次会议。根据笔记记录，钱学森当时说，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继续研究是合法的，办个情况汇编是合法的，刚才就在我们范围内说一下，不是对党的主席的态度。”他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这样才公正，否则不是应有的态度。”

中国科协主席周培源坚持认为，没有中央文件，胡耀邦的话不宜由科协往外传。科协书记裴丽生也认为需要请示，不同意就不要发。他们更

也谈北上与西进

——与军科军史研究部及《红西路军史》作者商榷

○ 冯亚光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第1版）及2011年出版的《红西路军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1版），虽然间隔20余年，但对西路军的叙述或论述，都意图与张国焘挂钩，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颠倒时间先后改变历史事实

1936年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胜利会合。7月27日，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上旬，红四方面军抢占天险腊子口，攻占大草滩、哈达铺，克漳县，攻岷州，占洮州和渭源。徐向前率前敌指挥部驻漳县，陈昌浩在岷州前线，红军总司令部驻岷州三十里铺。红二方面军由哈达铺地区东出，9月1日占领礼县，继向陕甘边发展，连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等城。

“军战史”写道：“蒋介石为了阻止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合，各个击破主力红军，并进一步控制东北军，调胡宗南第一军由湖南兼程北上，企图抢占西兰大道之静宁、会宁、定西段，以阻断我三个方面军会合的通路，也阻断东北军主力同其驻兰州部队的联络；令位于定西、陇西、武山地区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向陇西集结，令位于秦安、天水、西固（今舟曲）、武都地区的王均第三军以主力向武山地区集结，令川军孙震第四十一军由绵阳、碧口等地向北推进到武都、西固一带，以上各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一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二十五、第四十九、第五十一、第

不同意办刊物。当然也有个别科协书记支持钱学森。但中国科协始终没有转发胡耀邦的批示。只是中宣部继续发文，“三不”政策更加肯定，坚决照办。实行的却是继续宣传，不准批评。

钱学森更加大力宣扬他的“人体科学”。在1982年10月召开的人体科学筹委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钱学森作了题为《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的报告，在报告结尾时声称：“我想真正吸引着我们沿这条曲折而又艰险道路去探索的是：这可能导致一场21世纪的新的科学革命，也许是比20世纪初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更大的科学革命。我们当中谁来作这场未来科学革命的启蒙者?”他们在1983年正式编印了刊物《人体特异功能研究》“创刊号”。把钱学森的讲话放在第一条。《自然杂志》继续大量刊登“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文章。从此，“人体科学”更加一发而不可收，风靡全国。

到上世纪90年代有人把“人体科学”纳入“钱学森科学技术思想体系”，在《人民日报》发表。曾任钱的秘书的涂元季在《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一书中称赞：“钱学森是中国人体科学的倡导者”，“他认为气功、特异功能是一种功能态，这样就把气功、特异功能、中医系统理论的研究置于先进的科学框架之内，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起了重大作用。”（见该书133-134页）直至2009年伍绍祖还在一个纪念会上支持钱学森的“人体科学”。

直到1994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科学普及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反对伪科学，这才让批评“人体科学”的文字在媒体上微弱地重现。中国科协在1995年有当时的主席朱光亚支持，召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两科联盟”会议，公开批判“人体科学”等等。不过主流媒体依然坚持“三不”政策。■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一四〇师以及第三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一部，向陕甘边境南部的成县、凤县、略阳、康县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固原及其以北地区的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这段话介绍了红军面对的敌人，面对的军事形势。《红西路军史》也有这一段，除个别字句有所变化，内容一样。

“军战史”写道：“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待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甘肃西部。同时，对三个方面军的具体行动作了部署：……以上部署的重点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部切断一、四方面军的联系，并不使其妨碍尔后两个方面军夺取宁夏的行动。”“可是，张国焘却于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随后，即督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加紧进行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的准备。”

我们注意，“中共中央和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9月14日决定”，而张国焘是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军战史”先说后发出的电报，后说先发出的电报。这种时间顺序的颠倒，也就颠倒了历史事实。因为张国焘9月13日发出的电报只能针对之前的一些电报。

9月4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西北局领导人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作了通报：“陕甘宁苏区版图颇大，东西长约一千二百余里，南北亦六百里，现有盐池、定边、靖边、安定、安塞、延川、保安、环县、豫旺九城在我手中。”“各县论地情则山多，沟深林稀，水缺土质松，人户少，交通运输不便，不宜大部队运动。人口总数只四十余万，苏区内当红军的已超过三万，物产一般贫乏，农产除小米外，小麦及杂粮均缺，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彭德怀还给徐向前发了个电报，内容和中央的电报差不多。徐说：“我印象很深。”党中央致西北局领导人的电报，还介绍了全国现存红军游击区的情况，强调指出：“通南巴以北之巴山山脉，有王邵春部活动，似散川陕鄂豫边境，可造成大规模游击战争之重要的战略地区。”

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1905-1967年)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西北局领导人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两个战略行动方案：一是红军出西北，据黄河以西的甘、宁、青三省地区；二是出川、陕、豫、鄂。

9月8日，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而“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我们已有几个电报给国际，并派邓发经新疆去莫申请，他们正等邓发到后查明情形，即有回答。你们来电已经转去。九月至十一月三个方面军的部署，即照商定办法执行。”

从上面电报我们看出：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出川、陕、豫、鄂不行，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既不能向北，也不能向东南，更不能向南回到草地，那么只能“出西

北”。张国焘于9月13日电示红四方面军:“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在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就没有违背中央的指示,并不是“军战史”所说“可是……”。

“军战史”和《红西路军史》,都只字不提党中央将陕甘宁根据地的困难向西北局领导人作了通报的电报。《红西路军史》只引用:“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红西路军史》写道:“根据党中央的回电,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豫鄂’和‘向西行动’两个方案的选项上,决定采取‘向西行动’。”试问,根据中央来电,不选择“向西行动”而选择“川陕豫鄂”行吗?

开始北上在前　甘孜会议在后

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红西路军史》写道:“由于党中央的争取和教育,由于朱德、刘伯承同志和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和要求,张国焘的北上态度渐为明朗。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研究了行动方针,做出了北上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这段话告诉人们,甘孜会议时红四方面军才决定北上。这与历史事实不符。

2月24日,林育英来电,提出红四方面军的三个行动方案,第一方案为北上陕甘;第二方案为就地发展;第三方案为南下转战。中央认为第一方案是上策。红四方面军战史写道:“红军总司令部和方面军领导人讨论结果,一致赞同北上陕甘的第一方案。张国焘在南下碰壁、广大指战员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见共产国际同意红军主力北上方针,也不得不赞成北上方案。遂于3月上旬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补充计划》。提出:‘主力进出于道炉甘(孜)一带’,……‘以开通将来主力北上的道路。’”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对此也作了明确的叙述,说明红四方面军的北上方针,是这时就确定了的。3月15日,张国焘在道孚的讲话中说:“二、六军大概要经过运动战来同我们会合,共同创造西北根据地。我们也要克服眼前的困难来创造西北广大的抗日根据地。”6月27日,即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前夕,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的《在西北地区行动的标语口号》,就有:“大举北上打日本去!”“大举北上迎接革命新高潮!”“一、二、四方面军团结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等。6月28日,红四方面军发布了第二次北上命令;6月30日,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发布了北上政治保障计划。7月1日,任弼时、贺龙等才抵达甘孜,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会合。

红四方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之前,不仅制定了北上行动计划,且先头部队已经开始行动。6月26日,李先念奉命率八十九师和骑兵师组成北上先遣军,从甘孜出发,经西倾寺出阿坝,沿途为红二、红四方面军筹集粮食及牛羊。7月2日,徐向前在炉霍未与红二方面军领导人会面,即按原定行军部署率中央纵队出发北上。在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前,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多次来往的电报,亦可证明,北上计划是早已确定了的,并非如《红西路军史》所写,“7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甘孜召开会议,研究了行动方针,做出了北上后与红一方面军会合的决定”。

红一方面军变动原定部署　红四方面军可否再作考虑

“军战史”写道:

“9月15至17日,中央军委接连致电朱德、张国焘指出:四方面军应迅速占领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静宁、会宁、定西段,否则一、四方面军将被胡宗南部隔断。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附近举行会议,讨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根据朱德、陈昌浩等多数同志的意见,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肯定了北上同中央会合的方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即致电徐向前、周纯全,下达了静宁、会宁战役纲领,部署红四方面军各部向西兰大道静、会段前进。

“9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朱德、张国焘,就夺取宁夏和一、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明确指出:‘向宁夏及甘西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还

指出:'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如使胡宗南确占静、会地区会合毛炳文,彼既可加强马鸿逵,使我们攻宁夏计划失败,又可加强马步青,使你们攻甘西计划失败,如此有(被)各个击破之虞,只有集中先占领宁夏方免此失。'并强调:'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两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一环。时机迫促,稍纵即逝,千祈留意。'

"但是,张国焘于21日到达漳县后,又违背中央的指示和中共西北局的决议,命令红四方面军撤离通渭等地,转头西进,迅速从兰州以西之永靖、循化一带渡黄河,进到凉州、永登一带地区。22日,朱德将此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军委,并明确表示要坚决维护静会战役原计划;一面致电张国焘,对他擅自改变西北局的决定表示反对;一面下令红四方面军各部队暂时停止一切行动,并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

"军战史"没有具体引用9月15日的电报,即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三十里铺举行会议之前的电报。《红西路军史》的作者引用说:"9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连续两次致电西北局和红二、四方面军领导,对三个方面军行动进行部署。……党中央在这里还解释了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的原因,指出'至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盐、豫三城必被马敌夺去,于尔后向宁夏进攻不利。故在未给马敌以相当严重的打击以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对东敌作战,宜以二、四方面军为主力,一方面军在必要时可以一个军协助'。"

党中央9月15日电报表明:红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作战。这样,红一、红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红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

红一方面军变动原定部署,红四方面军能否再作考虑?

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

"中央认为,第一步应由一、四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第二步进据甘西。鉴于一方面军兵力有限,需固守现有根据地,抽不出更多兵力与四方面军共同夹击胡敌,故决定派红一师向静宁、会宁一带出动,策应四方面军主力北进,控制以界石铺为中心的有利基点,在通渭、庄浪、静宁、会宁地区迎敌。9月18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发布了通庄静会战役纲领。我们开始行动,拟向静宁、会宁地区转进。这样,一、四方面军主力南北夹击敌人的计划,就变成了四方面军北进,在西兰通道地区,独立迎击胡敌。我明白这一仗很难打,但准备硬着头皮干。

"我们正忙着调动队伍北进,张国焘匆忙赶来漳县。进门就把周纯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来,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我们大吃一惊,莫名其妙。问了问情况,才知刚开完岷州会议。会上陈昌浩和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陈昌浩得到与会多数人的支持,张国焘的意见被否决。分歧的焦点是:陈昌浩主张立即北上静、会地区,会合一方面军,与敌决战。张国焘则认为,既然一方面军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军独力在西兰通道地区作战,十分不利,主张西渡黄河,进据古浪、红城子一带,伺机策应一方面军渡河,夺取宁夏,实现冬季打通苏联的计划。这是张国焘与陈昌浩共事以来,第一次发生尖锐争论,加上他有个另立'中央'的包袱压在身上,所以情绪很激动,还掉了泪。他说:'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我觉得,陈昌浩在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劝了张国焘一通。关于军事行动方针问题,我们说,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大意是说,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通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就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带,情形会好得多。从军事观点看来,我们觉得张国焘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于是,当场制定了具体行动部署:四方面军以两个军从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抢占永登、红城子地区作立脚点;以一个军暂在黄河渡口附近活动,吸引和牵制青海的马步芳敌;以两个军继续布于漳县、岷州地带,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这三个军再渡河北进。主力出靖远、中卫方向,配合一方面军西渡黄河,

共取宁夏。这个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区同敌人作战;二是吸引胡敌南向,减轻了对一方面军的压力;三是并不违背中央关于两军先取宁夏、后取甘西的战略企图;四是便于解决四方面军的就粮问题。部署既定,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同时,令部队调动,准备从循化地区渡河。

"次日一大早,陈昌浩赶来,见这边都同意张国焘的方案,他也就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朱总司令到来后,亦同意照此决定行动,并提出应报告中央。张国焘一面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一面令部队开始行动。"

"军战史"写道:朱德"通知西北局成员速到漳县开会,再次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而历史的亲历者徐向前说:"张国焘即电告朱德、陈昌浩,要他们来漳县会商。"以上,我们还可以看出,朱德、陈昌浩同意了张国焘的方案,方案也报告了中央。9月26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国焘动摇,老总曾有电来,表示很不满意,谈到漳县与张等开会,但结果仍是西进。"

《红西路军史》写道:"9月22日22时,在朱德拒绝签署的情况下,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了《四方面军拟从循化、永靖一带渡过黄河》的电报,通报了漳县会议决定。"

说"朱德拒绝签署",依据是什么?我们看9月26日这一天,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连续发出的电报。9月26日12时,朱、张、陈、徐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关于先机占领甘北等问题》电;20时,朱、张、陈、徐再次致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关于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电报》;同日夜,朱、张、陈、徐又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红四方面军执行西渡计划》电;22时,朱、张、陈、徐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

"军战史"第一卷347页下的注1中称:"张国焘的这些电报,都以朱德名义联署。事实上,朱德一直反对张国焘违背中央方针、指示的行为。……据此,凡由朱、张联署的违背中央战略方针、指示的电报,在叙述时只提张国焘,以反映历史现象的本质。"我们在"军战史"中看到的是"张国焘等又连电党中央……",漏掉了朱德、陈昌浩、徐向前。

讨论中央指示　一致决定北上

9月26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联名连续向党中央和红二方面军领导人发出电报。9月26日12时的电文中有:"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20时的电文中有:"如兄等仍以北进万分重要,请求中央明令停止,并告今后行动方针,弟等当即服从。"同日夜的电文中有:"请参看二十时电,如兄等认为西渡计划万分不妥时,希即明令停止西渡,并告今后方针。"22时,致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文中有:"如无党中央明令禁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

9月27日14时,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贺龙、刘伯承、任弼时:"迭接二十六日两电,敬悉一切,并有'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西渡计划行动'等语。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详细慎重地讨论了这个行动问题,特将结果奉告如下……"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我带先头部队,向洮州进发,张国焘他们继后。过了洮州,向老乡调查。据老乡说,现在黄河对岸已进入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根据这样的地形、气候条件,我觉得渡河的计划难以实现。遂返回洮州,向朱、张汇报。这时,中央来电,明令禁止四方面军西渡。电文说:'我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达不到任务的危险。''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不过半月左右即可到达靖远、海原地域,从靖远渡河;一方面军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宁夏,或分途并取宁夏、甘西,二方面军仍在外翼制敌,则万无一失。'朱、张在洮州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一致决定放弃西渡计划。二十九日,方面军总部下达了北进静(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离经不叛道”的经济学家何伟

——追思何伟先生

○ 张素芳

何伟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生于1926年,1944年参加八路军,1946年入党,195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任教该校,1991年离休,2012年10月9日逝世。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为的是打败侵略者和推翻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建国后历经各次政治运动,促使他独立思考,“离经不叛道”,在教学和科研中独树一帜;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中,他是主张和坚持市场化改革主流团队中的一员,不惧排挤打压,艰难辛勤地探索,为的是推动中国走上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大道。可是,他因现实与为之追求终身的理想之间的巨大差距而深深地失望……即使这样,他还是没有绝望,在得知已是癌症晚期的生命最后时光,奋笔疾书,写下了名为《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解码若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10万字书稿。何伟先生是我的恩师,他的离去令我无比悲痛,时时怀念;对他的追思,不仅仅出于个人感情的表达,更有着时代和现实的意义。

脱离斯大林之经　未叛马克思之道

何伟先生就学、任教的中国人民大学,是建国后的1950年按照莫斯科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第一所新型大学。当时主要由从苏联各高校选派的红色教师和专家任教,学生除读马恩原著外,学的都是苏联教科书。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中,何伟反思,当年所学的苏联教科书不是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版本的马克思主义。他指出,“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变为三个组成部分,又把三个组成部分换成他的著作:哲学是《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以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政治经济学是他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主要内容是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科学社会主义是《联共(布)党史》,主要是苏共党内的路线斗争,强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的作用,树立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个人崇拜。这样,就把斯大林的这些理论奉为马克思主义。凡是与这一理论不一致的,一律被指责为非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或者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斯大林的理论就成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标准”。他提出,斯大林“如何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一党专政,把一党专政变为一人专政。他如何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把社会主义由科学倒退到空想。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名义下,实行国家垄断。他违背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实行专制统治,把本国人民害苦了,最后导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解体或成为改革对象。各国共产党人应从中吸取深刻教训”。他说:“正因为这样,我的治学原则概括为:‘离经不叛道’。这是指离斯大林之经,因为他把马克思的‘经’念歪了。不叛马克思主义之道,即立场、观点、方法之道。”

何伟以其学习马恩原著特别是《资本论》的坚实理论功底,改革开放伊始,积极勇于独立思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
特 约 刊 登
回忆久久为您撰写回忆录
咨询热线:400-653-6199

想”；提出改革由国家上层建筑直接经营管理的国营企业，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从国家所有制变为企业所有制，成为自主经营的商品生产经营者。

4. 以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的价值规律的客观调节作用，指出斯大林在不具备商品经济消亡的条件下，用指令性计划调节完全代替价值规律的调节，结果加深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矛盾。提出要对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进行根本的改造，把整个国家计划的总基础由原来的产品经济转到商品经济上来。

何伟（1926年-2012年）

考，研究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的现实，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真知灼见。

1. 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和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摆脱了斯大林消灭商品经济的理论，论证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是建立在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历史阶段；指出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没有社会化经济，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目前全世界还处于商品经济阶段。提出商品经济（20世纪90年代以后称市场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主张摒弃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应以商品经济作为中心环节，凡是不适应商品生产和流通的各种管理制度，都在改革之列。

2. 坚持马克思的公有制是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观点，批判了斯大林把国家所有制等同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只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理论和实践，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和农村集体所有制，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形式。

3. 以马克思的所有制理论和商品经济理论为基础，指出斯大林将生产关系和所有制简单、抽象地归结为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又脱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

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学界讨论最多、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我国的经济形式应是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企业是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经营者还是隶属于国家政权机构的国营单位，以及调节经济运行的是客观的市场机制还是国家的计划指令。这两种观点的交锋，实质是朝市场化改革还是坚持旧的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不同改革取向的论战；其理论基础，前者依据的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后者坚持的是斯大林的经济理论。何伟是最早冲破斯大林经济理论束缚，提出并一直坚持摒弃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提出的这些理论观点，对于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市场化改革目标确立之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何伟继续探索，为坚持和推进市场化改革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

1. 以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所有制的理论，进一步批判斯大林关于两种公有制的理论，提出要重新认识民营经济和国有企业。指出只有国退民进，才有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才能建立起自主经营、平等竞争、公平交换的市场秩序。针对国企的垄断特权、与民争利、效益低下和贪污腐败，指出今日国企已发生变异，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以事实和数据说明“国进民退”现状，尖锐地指出这是改革不到位、甚至倒退所致。

2. 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股份制的论述为依据，指出和论证了股份制是社会生产对单个私人资本的扬弃，是社会所有制，应当成为公有制的主体。群众自己创办的股份经济、合作经济是实现社会所有制的一种好形式。坚持主张以股份制改造国有经济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3. 以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论证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公平合理性，说明了分配不公的要害是政府行为，是非市场因素所造成，不是发展非公有经济所导致，回击了对市场化改革的非议。

4. 以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原理，提出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关系的客观要求相应地进行政府职能转换和政治体制改革。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改革的关键，因为它是旧体制的核心，政府转变职能的关键问题是产权与政府脱钩，以市场经济的原则来规范政府和企业之间的经济关系。指出解决各种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必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的重点是党政分开，应把党的改革提到日程上来。明确指出党的改革是改革自身，有切肤之痛，要有坚定的决心和毅力，才能克服党内保守思潮的阻挠和既得利益者的反抗，因此这一改革任务比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艰巨。

5. 以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提出和坚持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指出人权、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宪政是由市场经济关系所形成的普世价值，不以个人主观的价值判断为转移。不尊重这些由客观的市场经济关系决定的价值观念，就不可能进入现代社会和融入世界体系。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必然形成普世价值。

6. 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分析认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出重新评价斯大林，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自然历史产物，马恩并没有为未来社会设计一个完整的、固定的蓝图，他们认为只能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确切结论。提出要区分晚期马克思主义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晚期，恩格斯指出了一条通过普选权掌握政权的路线图，又通过股份制指出了一条由私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路线图。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把马克思讲的只限于“过渡时期”、随着阶级消灭、国家消亡而不复存在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一党专政，又变为一人独裁专政。斯大林确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三大特征，是他从头脑中发明的一套社会制度，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没有体现自由、平等、共同富裕这一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主义本质。斯大林将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实行自由人联合体，变为建立全民（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违背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思想。斯大林使大家都成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他的两种公有制理论是城市剥削农村，导致体制、制度、政策上的不平等。所谓计划经济实质上是官僚统制经济，一切进行垄断和配给，形成短缺经济。所谓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平均分配，使贫穷普遍化。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人们没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迁徙自由，缺乏民主，人权得不到保证。所谓选举都是党内预先决定，民意机关都是橡皮图章，不能真正代表民意，人们无有监督政府和罢免官员的权力，掌权者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特权集团，是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目前世界上已无有一个完整的斯大林模式，表明其失败已经尘埃落定。指出斯大林的理论对我国的误导还远远没有清除，甚至还根深蒂固。必须彻底摆脱斯大林的束缚，进行一次如同改朝换代的“伟大革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全方位协调进行，才能取得成效。

何伟提出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改革的见解、主张很多，这里只是大致简单的梳理概括。从中，可见他都是以马恩的理论为立论依据，他是认真熟读马恩著作、真正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同时，他又是不拘泥于马恩的个别词句和结论，将其科学的理论原理联系社会发展实际勇于批判和创新的先知先觉的改革者。

马克思主义是马恩认识自然、思维和社会的学说。当然，任何一种学说都不能够成为构造一种社会的圭臬，但科学的学说能够成为后人认识的起点和理论原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以其科学的经济学原理和研究方法，探寻中国现

实社会的真实内在联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是何伟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的信仰和追求，符合人类思想认识传承创新的规律。

也许，当下一些年轻人会对何伟这样的老一辈经济学家的治学不以为然。可是，必须明确，这就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沿革！正是由于何伟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遵从马克思的理论而又不拘泥于个别结论，才从理论上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教条，推动了改革向市场化方向发展。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然而，何伟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招牌的大学里，没有受到尊重和欢迎。社会的现实就是：一些人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其实根本就没读过或读懂过马恩著作，不过是将其只言片语作为标签或套语谋取私利。他们坚持斯大林以权力意志从上而下主宰和掌控的社会构架和思想体系，不能容忍何伟这样的学者。

病中争朝夕写书　愿景自由人曙光

2012年6月，何伟被诊断胃癌晚期，已扩散。此时，他想的不是治病保命，而是只争朝夕写书。

在改革开放之初，何伟就提出一个早被人们遗忘了的100多年前马克思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理想，得到许多人的赞许，但认为是遥远未来的理想。在后来特别是在病中，何伟把它重新提出来。因为他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看到自由人联合体的曙光：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社会因素，像雨后春笋一样自然生长，连马克思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将消灭三大差别都出现了；二是信息化促进全球一体化，原先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关系为产权社会化所改变；三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社会进入一个新纪元，所呈现的社会现象，很像是马克思所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他下决心一定要在有生之时将自己的思考和想法写成一本书。他要把自己对马克思关于自由人联合体的信念、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批判、把中国改革开放中两大思潮的博弈、把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愿景写出来，留给世人，作为他人生最后的总结和期盼。

这本书是他在病榻构思，利用治疗空余时间完成的。从7月下旬到8月31日，完成10万字的初稿，对于一个身体健康之人都难以承受，可见他具有多么坚强的信念、意志和顽强的毅力！要不是高强度的写作极大地消耗了体力和精力，他的病情不会这么快地恶化，他的生命就能延长……

在书稿中，何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以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的观点，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学说，指出斯大林用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苏联存在70多年还是覆灭了；中国以“阶级斗争为纲”建设社会主义，最后走到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的地步；瑞典社会民主党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和平稳固发展。他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将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阶级斗争学说回归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斯大林的观念长期主宰我国的意识形态，两股思潮博弈伴随着改革始终，“死人抓住活人”的局面还没有结束，中国人民还要付出昂贵的学费。他放眼世界，指出信息化推动产权社会化革命已成为世界潮流，资本主义正在和平演变，北欧“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是社会主义因素的成长；正在兴起的以互联网和可再生能源为基础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世界面临从生产方式到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将揭开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的面纱，一个以个人的解放和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条件的社会共同体的曙光已在闪现。

这本书，集中表现了何伟信奉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治学理念和实事求是批判、创新的学术观点。可是，该书的出版因审查未通过而搁浅。

据说，搁浅的主要原因，一是对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二是对“国进民退”、国企垄断的看法，三是“四项基本原则”新内涵的提出。

爱心化春雨育人　品德至高尚永存

我不是何伟先生名义上的学生，但我从1980年以来有幸实际上成为何老师的学生。那时我是昆明师范学院政教系1977级学生，从“文革”、

下乡、进厂的生活经历中选定了学习、研究经济学,从社会的经济关系出发去探寻社会关系真实的内在联系的人生之路。当时专业课都是读马恩原著,庆幸没学教科书,因而没受传统经济理论的影响。我关注并参与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探讨。我把对我国商品经济的原因和价值规律的客观调节作用的认识写成文章,除请教本校和本地的相关老师外,还请教何伟老师和董辅礽老师,由此实际上成为受他们教益最多的学生。董老师推荐我报考四川财经学院刘诗白教授的研究生,何老师得知我考上川财的研究生,写信给在该校任教的同学要她照顾我。仅仅是为了我的硕士论文选题,董老师给我写了不下10封信提出意见。在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后,董老师和何老师一直关心、帮助、指导我的研究,我常将新写的文章寄给他们请教。董老师很忙联系少,但他只要一见着和我有关的人都要关切地问起我的情况。我和何老师经常打电话交流思想和观点,每年他都通知我参加由他主办的首都经济学界新春联谊会,一年中除这次见面外只是相逢在为数不多的学术讨论会上。尽管见面不多,可探索社会变革真理的追求一致,学术思想相通。董老师和何老师对我的教育、关爱,如春风化雨,滴滴润心,成为支撑我坚守学术人生的精神力量、情感慰藉和效法榜样,对我的人生具有决定性影响。能够成为董老师和何老师的学生,是我人生最大的幸运。他们不仅仅对我鼓励关爱,他们对所有的学生都是如此,大家有口皆碑,彰显出他们为人、治学的高风亮节和提携后学的无私情操。董老师和何老师同样是力主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和竭力推进市场化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又都同样遭致保守势力的打压。如今,两位恩师先后离世,我的悲痛和怀念更是难以言表!

2012年6月初,我得知何老师病情提出要去看望,他说我活蹦乱跳的不用看,要只争朝夕写书。随后他发电邮传来书稿提纲,我提了一点修改意见。19日为整理书稿中的一章我去他家,他精神很好。他说:“我要赶在有生之时写完这本书。对于生死,我毫无畏惧,也没有任何遗憾后悔,该做的我都做了,问心无愧。我对现实很失望,得病可能是老天对我的恩赐,让我解脱,少受痛苦。”听此言我很悲伤难受,暗暗想着一定要为书稿尽力做好编辑事宜。

10月3日我到北医三院看望何老师。他对我说:“我已是弥留之际。那本书,已联系了出版社。拜托!”六天后何老师辞世。如今,何老师的音容笑貌、殷殷牵挂和凝重嘱托历历在目,可遗著还未出版。我辜负了他的临终嘱托,一直愧疚在心。

看到他很消瘦虚弱的样子,我悲痛难忍,眼泪夺眶而出。他不是躺在病房的床上,而是躺在好多个空框的地下室中的每间有好几十个病人的急诊观察室的加床上。家人提出转入病房,护士说不可能。看到这种景况,出来后我忍不住和何老师的女儿奇奇抱头痛哭。

何老师留下遗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不保留骨灰,不通知学校,身上不盖东西”,灵堂的横幅上写的是“一位叫何伟的人走了”。何老师是怀着没有看到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成功和自由人联合体曙光的遗憾和牵挂走的。到了天堂,他一定会告诉马克思:现代资本主义已不是19世纪的模样,没有暴力革命和阶级对立,时代潮流正以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强大生命力和平渐进地向着世界大同方向前行。■

(作者为《求是》杂志原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本刊稿件选用标准

一,本刊重点关注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特别关注亲历者的叙述。

二,内容真实可靠,不可有任何虚构。文中重要引语,请注明出处。

三,篇幅不要过长,一般四五千字,长篇最好在八千字之内。

四,原则上一稿一投。如一稿多投请予说明。

五,投稿三个月以上,未接到采用通知,请作者另行处理。作者请自留底稿,本刊无力退稿。

本刊社址: 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本刊电话: 010-68534879

传 真: 010-68532569

编辑部邮箱:yanhcq@sina.com

yanhcq@gmail.com

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

○ 王菁珩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历史浩劫。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221基地，后来的二二一厂）发生的一场灾难是历史浩劫的缩影。

（一）腥风血雨

从1963年－1965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5年10月，成立了国营二二一厂“四清”分团及分团党委，核工业部刘西尧副部长任团长兼书记，李毅、戈克平为副团长。在学习文件基础上，各级领导干部“下楼洗澡”，在职工代表中对照检查，听取职工意见，职工称之为“搓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越是接近群众，工作做得越多的干部，在一次又一次的对照检查中越难以通过，职工形容基层领导“洗烫水澡”，上级领导“洗温水澡”，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为后来的灾难，埋下了种子。

“文革”开始后，6月11日，在二二一厂新华书店的玻璃橱窗和周围的墙壁上，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有批判实验部技术人员宋××“反动言论”的，有批判厂主要领导的，也有批判《三家村》的，等等。各分厂、处级单位纷纷召开《三家村》批判会。同时对基地《红原报》上的一篇题为《谈革命激情》的文章，展开大围攻，报社也被迫停刊。8月，厂两派群众组织相继成立。9月11日，第九研究设计院北京理论部李××等人要求进厂串联，在6号哨所静坐。“四清”工作分团副团长李毅和吴际霖赶到哨所做工作，不同意进厂，叫他们返回北京闹革命。一派群众不满，给李毅戴高帽，引发两派群众公开对峙。厂组织了10多人的调查组，直接向刘杰部长汇报。“两报一刊”发表《革命干部要支持革命群众》的社论后，221基地九院的政治、干部、宣传部门个别领导站出来表态，表态干部即成为另一派打倒的对象。

1967年1月，全国夺权风暴刮到厂，一派群众组织接管了总厂、分厂“文革”领导权，财政、干部、科研生产、保卫保密的监督权，印鉴掌握权。2月23日，西宁市发生流血事件，设在西宁市的二二一厂技工学校少数学生卷入了这一事件，加剧了基地两派群众的对立。在九院二二一厂召开的氢弹空爆试验科研生产会议，进行到第二天，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派专机到西宁，把参加会议的人员接到北京京西宾馆，改由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主持会议。聂帅在会上宣布说：二二一厂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工厂，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科研设计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我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二二一厂实行军事管制。8122部队司令员贾乾瑞同志任二二一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二二一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科研秩序。5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委给二二一厂军管组发来电报，指出：“《七三》任务已进入紧要阶段，为了切实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按时按质完成这项任务，厂的四大暂停，待《七三》任务完成后再继续进行。”6月5日，九院二二一厂承担的氢弹设计、实验、生产、环境试验以及核测、总装、联试工作全面完成，产品运往新疆罗布泊二十一试验基地。1967年6月17日，赶在法国之前，一颗330万吨梯恩梯当量的氢弹试验成功，使我国成为第四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中央军委又特给二二一厂军管组发来贺函，指出：“221厂的任务十分艰巨，新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十分繁重，整理和向三线调

中国核武器基地

整搬迁工作很紧迫，全厂同志都应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积极完成上述任务。”7月17日下午，在三分厂发生了以石头、砖块、棍棒为武器的大规模武斗。7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我厂发出特急指示，指出：“221厂是国家极为重要企业，最近发生的武斗，科研、生产陷入停顿，广大职工生活受到影响，工厂安全受到威胁。……中央将派调查团，专门去处理221厂的问题。”27日，周总理、聂副总理指示：“立即停止武斗，现在双方集结的队伍，应即撤回各自驻地，恢复生产，恢复交通运输。……厂两大组织各推选代表20人来京进行具体商谈。”同时给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发出电报指示，要刘劝说，“要求进入221厂在海晏县生活区的×××红卫兵迅速返回西宁”。8月4日晚，在总厂办公楼前发生了第二次大规模武斗，致死一人。8月1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二二一厂指示：“一，为迅速解决停止221厂武斗，恢复生产的问题，中央决定派出调查组，由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同志为组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同志、二机部副部长刘伟同志、总理联络员办公室张晋德同志为副组长的调查组，于日内乘飞机前往221厂。二，党中央坚决要求你们严格保证工厂的绝对安全，希望你们停止武斗，迅速回到自己的生产岗位，认真地执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动员一切力量完成今年的科研、生产任务。”这样，两派大多数群众，回到或坚守在科研工作岗位上。热电厂、交通运输处、房建处等辅助生产部门和医院、学校、商场等社会服务部门工作继续运转。

1968年1月1日，国防科委接管九院，冠以“总字八一九部队”番号，二二一厂冠以“兰字八三九部队”番号。（1963年初，二机部九局、北京九所〔除理论部外〕陆续向221基地转移。1964年2月二机部撤销九局，局、所、厂合并成立了第九研究设计院，李觉任院长，下设221研究设计分院。1965年9月分院改为二二一厂，九院第一副院长吴际霖任书记兼厂长。）内部机构改为司、政、后编制。同时，在二二一厂成立了九院临时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全面负责四川九〇二地区的三线建设、二二一厂、北京单位的工作。9月17日成立了院和设计、实验、各生产部的革委会，王荣任院革委会主任。11月14日两派群众组织，成立了“11·14”联合总部（纪念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厂两派群众组织的日子）。“文革”中应运而生的大大小小“学习班”是整人的场所，有总厂在多巴、西宁杨家庄举办的学习班、车间学习班等，学习班成员要“天天读”、跳“忠字舞”，晾晒自己的思想，一遍又一遍翻晒自己的灵魂，写出学习心得上交。即便是住在医院不能参加运动的病人，也要每天“早请示”“晚汇报”。在“文革”那狂热的年代，“文化大革命”的漩涡，把人们卷到其中。在“文革”狂热的政治气氛中，夫妻反目，朋友出拳。即便是一起工作了好多年，平时相处得不错的朋友，在“风暴”一来时便扯起了“革命”的旗帜，顿时变得红毛绿眼，似乎不翻脸不认人，

不大声呵斥就不足以表示划清界限。

(二)黑云压城

1969年3月,在黑龙江省珍宝岛爆发了中苏两国的武装冲突,苏方密谋对我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全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国防科委指示:“二二一厂过去是根据苏联专家意见建于青海草原,集中暴露,从战略观点考虑,在三线地区应有第二手准备。”院、厂也发出通知,抢在敌人发动战争之前,以最快速度向三线(四川九〇二地区)和河南驻马店“五七”农场转移。从11月上旬开始,第一批1100多名职工,130多台运输车辆,向九〇二地区转移,并要求分三批完成迁移工作。11月4~19日,在搬迁过程中,连续发生了热电厂1号电缆线短路爆炸,第二生产部229工号炸药件加工爆炸,牺牲了5名同志,实验部七厂区核心资料“丢失”。这时正面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遵照周总理指示:“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查清问题,”“年内完成清队和破案工作。”国防科委要求:“以青海221厂为重点,实行分割解决。”这时军管组长是赵启民,他原来是海军副司令、国防科委副主任。军管组副组长是赵登程,他原来是空八军副军长。军管组的正副组长被人称为“二赵”。黄、吴、李、邱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不听汇报,不作调查,就给予“三大案件”定性为:“深藏的阶级敌人有组织有计划搞的”,肯定九院有“长期潜伏的反革命集团”。黄永胜还说:“要狠一点,特别是清队,要严不能宽”,“要杀一批,清一批,还要控制使用一批。”并给“二赵”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的权力。“二赵”秉承黄、吴、李、邱的旨意,在发给军委办事组的报告中说:“在电厂发现反革命‘五一六’阴谋集团,”“229工号的炸药件加工爆炸是郑××、程××、高××等组成的反革命集团干的,”“二分厂以董××、周××、吴××、何××、谷××等是苏修特务集团。”“二赵”还诬蔑说:“多年来,这里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和走资派四位一体,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篡夺了九院的党、政、科研大权,组成了一个地下王国”,“成为合法的反革命基地”,是“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资本家的大乐园”,“帝、修、反的安乐窝”,“这里的阶级敌人新生的多,现行的多,集团的多”,“是一窝一窝的”,“按百分之几去搞不行,而是百分之十几”。他们诬蔑“矿区的公、检、法是美蒋特务机关,安在国防科研单位的据点,收集、盗窃核心机密情报的公开合法机构”。还说:“这里一挖带动全国”,要“打到四川去!打到北京去!打到全国去!”“二赵”自1969年11月28日进厂,在二年的时间内,打着“清队破案”“整顿九院”“清查‘五一六’”的旗号,制造了“赵××反革命集团案”“国民党反共救国军西北派遣军案”“徐××反革命特务案”等数十起冤假错案,残酷镇压广大职工和干部。“二赵”在科研生产上,对抗周总理“边试验、边定型、定型合格后再小批生产”指示,一味追求扩大生产,盲目进行扩建,把安全防护、文明生产视为活命哲学。将科学家王××提出的在挖掘地下核试验地道竖井时,不要在里面进食的建议,视为活命哲学进行批判。在放射性材料加工的工号,把重视文明生产的第一生产部领导何××,拉到现场进行批斗。“二赵”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垂直领导,解散了党支部,停止了党员组织生活,调进了221名军队干部和2700多名复员战士,对他们灌输编造的“严重敌情”,多次发动“反右倾”运动,大搬“绊脚石”,打击那些抵制他们错误的同志。对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科、室、车间干部,以审查为名,进行政治迫害。院机关及四个科研生产部副主任以上技术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打成了各种牌号的“特务”“反革命”,切断广大职工和干部与厂外的一切联系,一段时间内,不准通信、不准职工探亲,也不准家属来基地探亲,并宣布军事戒严,授权夜间巡逻“喊三声不站住就开枪”,在全厂挨户进行大搜查,把搜查出来的日常生活用品作为“特务罪证”,烟灰缸是“特务联络工具”,“号码相连的人民币”是“特务经费”。他们极力制造“红色恐怖”,“二赵”提出:审查对象的问题“未弄清楚前,当敌我矛盾”对待。“现在敌人放风要重证据”,“互相揭发,既是人证也是物证”,“一人供听,二人供信,三人供定”。在严刑拷打的逼供、诱供下,在批斗、坦白会上被迫揭发了什么“×××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副司令”、“在蒋介石头像下宣过誓,就是国民党的团长、营长”、“准备盗窃原子弹,装到口袋里带走”等等……真是离奇荒谬,幼稚可笑的供述,让人哭笑不得。草原笼罩着恐怖。昨日的依靠对象,今日成了批判对象。今天你参加批判别人,明天你就被揪了出来,搞的人人自危,刑讯、逼供、疯狂镇压群众。留学人员成了“特务”,一般质量、安全事故成了“反革命破坏”,

工作生活在一起的朋友，成了“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坦白控诉”大会，公开点供、串供，甚至逼迫受害同志，看着进入饭堂的队列同志指认“反革命”。采用非法严刑逼供手段，乱捕乱斗，草菅人命。被审查的人中，有关押在警卫团的“要犯”，有禁闭在分厂地下室的“骨干分子”，有锁定在车间交代问题的“重点人员”，还有不少坐在车间走廊的“被审查人员”，成天学习《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写“交代材料”和体力劳动。他们极力制造“红色恐怖”，每次枪杀人，在俱乐部前广场和南操场，召开万人大会，会场的制高点架设机枪，四周武装巡逻。在南操场宣判时，叫大家向后转，观看冤杀的血淋淋现场。赵登程当众叫嚷“你们听见枪声没有？再不交代问题，你们那个头是很好剃的”，今后“要用机枪扫，大炮轰！”赵启民也叫嚷：“今天是一个小台风，今后还要刮十二级台风，还要枪毙，还有大头。”基地先后召开了三次所谓的“宽严大会”枪杀了五名职工。职工医院外科陈主任，是1959年从北京率第一批22名医务人员进基地的领队之一。同年4月，在无电灯、氧气、血库、X光机的极其简陋的条件下，用手电筒在“百户大院”的临时职工医院，为陈光月同志做了基地第一例手术—肝脓肿手术。在抢救一位训练中颈部穿入弹片，处于昏迷中的战士时，经与部队医院大夫会诊，在左颈手术中没能找到弹片，战士血压急剧下降，而停止了手术，未能挽救那名战士的生命。结果，只因出身成分高，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冤杀。宣判时高呼“冤枉”，被当场用毛巾堵住了嘴。两名名牌大学毕业的技术人员，一名由于报到时间晚，根据规定少发了部分工资，说了怪话。在“四清”时，有人揭发他说了什么：“你让我损失200元，我让你损失20万。”后来“四清”结束时，做了结论——是场玩笑。可“二赵”一进厂，听到此事大发其火，没证据，就叫人东拼西凑，在炸药浇铸配方实验中，出了质量问题产品中，凑够了20万。定为反革命破坏遭到厄运。另一名技术人员在“四清”运动时，有人从他抽屉里发现不少笔记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旧址

本，从中揭发他写的生活感情低沉、悲观的诗和散文，而受到批判，并判了重刑。赵登程说要“用杀人打开局面”，赵启民也说：“杀他两个××的”。把这两名技术人员从监狱提出来，省主管政法领导带着图章，在矿区法院的判决书上盖章，在第一次厂的宣判会上与陈主任一同遭冤杀。还有一名生产工人和一名不满16岁的中学生，被“二赵”采取诱供、逼供，完全以口供定以强奸幼女罪和流氓罪名处以极刑。火工专家钱晋教授、工程师张云亭、老工人马久昌等被活活折磨死。30多名职工难以忍受折磨，含恨自尽。骇人听闻的威逼、打骂、折磨、昼夜不断的连续审讯310多人致伤、致残。10多名沦为关押在警卫团的“要犯”已被列为处决名单，林彪“九一三”自我爆炸后才还他们清白。

就在那“人妖颠倒”的时期，大多数职工在思考，我国每次核试验的成功，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发了贺电祝贺。怎么可能说核武器研制的主战场——221基地，一下子变成了“反革命基地”、“资产阶级大染缸？”职工坚信在党中央直接关怀的核基地广大职工是好的，是可信赖的。在“红色恐怖”中，科研生产没有停顿，有的科学家、科技人员白天受到批判、审查，晚上仍坚持科研和工作。第一副院长兼二二一厂书记和厂长的吴际霖，为突破第一颗原子弹技术，他在干部会上响亮提出：“一切为‘596’（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让路”“响了就是最大的政治”的口号。“文革”中因这两句口号，受到不公正

批判，给他戴高帽，批斗完回到办公室，脑袋上的糨糊都来不及清洗，就去主持科研生产会议。后来又把他轰到一个单身宿舍，他说："你们要揪我，就揪我，批完我，照样在单身宿舍办公。"局、院、厂合并后，李觉院长抓原则，抓大事主要对外。吴际霖第一副院长兼职二二一厂书记和厂长，主持院的科研计划和日常工作。"文革"期间，全靠他和朱光亚、陈能宽等领导支撑基地局面。王淦昌、周光召等科学家，受到不公正对待，仍坚守在科研岗位上，勤奋工作。受到迫害的科学家周光召在氢弹爆炸成功后，通过下边技术人员将核武器小型化想法提交给组织。正是二二一厂人对国家和事业的执著和忠诚以及强烈的使命感，在"二赵""红色恐怖"的困境中，顽强地工作着。1971年6月23日，第二生产部204车间研制生产了10公斤×××炸药，并建成生产线，提供了低感度、高爆速、高效能新型炸药，为后续新型号产品提供了安全、优质高能炸药。二二一厂完成型号研制任务，于1970年10月14日和1971年11月18日，成功进行了第十一次、第十二次国家核试验。

（三）拨乱反正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的赵启民，被隔离审查解除了一切职务，做了降级处理。赵登程被送上军事法庭。经周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中央于1972年9月12日–1973年3月10日，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了九院"批林整风会议"，联系"二赵"清算林彪集团罪行。"京西会议"后，以李觉为组长、周秩、赵敬璞、胡若嘏等组成的学习组分赴四川、青海，传达"京西会议"精神，帮助恢复秩序，筹建领导班子，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

1974年1月，221基地的九院一分为二，院迁往四川，二二一厂留在基地。1973年11月14日–1974年2月14日，又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九院党委扩大会"（第二次北京会议），继续揭发"二赵"破坏221基地罪行，统一思想、统一步调，医治"二赵"所造成的创伤。会议确立了"讲原则，讲大局，讲团结"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北京会议纪要》。中央派出以梁步庭为组长，赵正清、刘书林为副组长的中央联络组，于1974年2月20日进厂。

面对"二赵"造成如此多、如此大的冤假错案，联络组冒着可能被打成右派的风险，向上打的报告迟迟得不到批复，他们敢于负责，提出了十条处理意见。一一复查，落实政策，平反昭雪，不留尾巴。两个多月就给2600多名干部、技术人员、工人摘掉了特务、反革命、"五一六"分子等帽子，政治上彻底平反；对靠边站的800多名干部和技术人员分配了工作。对被迫害自杀身亡的35名同志彻底平反和善后处理；对被错误开除和强行退职的74名同志彻底平反并接回厂工作，恢复了职务；对死、伤、残者家庭生活有特殊困难给了特殊照顾，其中65名家属、子女安排了工作。其后，又对历次运动中遗留下的证据不实、定性不准、处理不当、久拖未决的案件和问题进行复查，对452名干部和工人重新做了结论和处理，基本上做到了领导、群众、本人满意。对冤杀的五名同志经矿区法院复查，报国防科委党委、青海省委、二机部党组同意，撤销原判，平反昭雪。1975年11月8日，在俱乐部举行的省委、国防科委、公安部驻厂联络组、二机部及省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二赵"所谓三大案件的复查结果：电厂电缆头爆炸，是年久失修造成的；229工号炸药爆炸，是一起责任事故；实验部七厂核心机密文件丢失查无实据。所谓三大案件，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栽赃陷害，罪名纯属捏造，是毫无根据的。至此，落实政策工作告一段落。业务骨干回到了重要工作岗位，1975年核武器生产任务圆满完成，中共中央特发来贺电。■

（作者为原二二一厂厂长）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启　事

《炎黄春秋》杂志尚有少量往期刊物零售，有需要的读者可电话咨询购买。

联系人：崔秀岭

手机：13611159388

电话（传真）：010-60342528

汇款地址：

北京市房山区102488信箱3分箱

邮政编码：102488　收款人：崔秀岭

诸暨: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

○ 何心乐

文革期间,浙江诸暨发生过两起无中生有的大案。一起是1968年,发生在诸暨县新壁公社的“反共特卫大队浙南革命人民造反队A号57支队”反革命集团案,牵涉到8个公社,3个单位,63人;一起是1969年安平公社、和济公社的一起名为“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反革命集团案,先后涉及11个公社51个大队和单位,391人,其中公开隔离审查138人,未公开审查的253人,审查中程度不同被吊、打的105人,拘留审查4人,自杀2人。两起案子,不但都是空穴来风、捕风捉影、无中生有的假案,而且都是威胁诱套、逼供刑讯、屈打成招的冤案。

大案一1968:“反共特卫大队浙南革命人民造反队A号57支队”反革命集团案

1968年12月2日,诸暨县新壁公社红桥大队新塘沿村茅有才,早年因偷窃被劳动教养过,在村里名声不大好,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抄出了他写“大队干部茅土木是漏划地主”尚未贴出的大字报,大队干部说他“整干部黑材料,情节严重”。当时,茅有才十分恐惧,怕被报复,但又不服,想向上控告,并想同刚结识的董村公社下董大队的理发师章仁田(堂弟茅有德的娘舅)一起商量。

当天晚上,茅有才和茅有德到了下董大队,由于章仁田也犯过一些错,当时是个重点批斗对象,正在外大队游斗,没碰上。茅有才怕私自外出被本大队的人发觉,故在那日后半夜(即3日凌晨四时左右)想离开下董大队回家,这样可以赶上次日上午出工时间。不料刚出下董大队村口,被下董大队值夜的民兵章大春、章祥山发觉。茅有才怕被捉住,就对茅有德说:“他们来问你,只说你一个人好了。”自己立即逃跑。章祥山等两人抓住了茅有德,进行了审问,问他:“逃跑的是谁?你是来做什么的?”茅有德神情慌张,说了“逃跑的是不认识的”,又说“是钱家坞人”,说自己是“到舅舅这里来剃头的”等假话。章大春两人听他说话自相矛盾,将他带到民兵室。天亮后,章大春把情况报告了大队革委会副主任章丙健(抗美援朝时参军,二等残废,1953年转业到供销社,后回村任合作社干部)。章丙健认为,章仁田犯过错误,曾外流上海、南京以及新塘沿等地。现在,茅有德为什么要黑夜来?其中一人为什么要逃跑?茅有德为什么要说假话?心中感到怀疑。于是,他马上赶到民兵室,抓住了茅有德的头发说:“你来剃头,为什么不剃头?逃跑的人是谁?”当茅有德说出了逃跑的是他堂兄茅有才时,章丙健更是怀疑,说:“你们是来搞反革命串联的,你们到章仁田这里来搞什么勾结?你们参加反动组织?”等,进行一连串的逼问。责令茅有德写出书面交代。早饭后,章丙健将上述情况立即电告新壁公社。公社接听电话的那位干部说:“茅有才是个批斗对象。至于茅有德这个人,你们可以派人将他带回新塘沿。”

大约上午9时,章丙健回到民兵室,看到茅有德写了“茅有才劳动教养过3年,不久前勾结了娘舅,我也被他勾结了,我对不起毛主席,茅有才要我参加组织,是什么组织我不知道”等交代,就没有将他送回去。章丙健就回想起两三个月前,新胜公社兰田头大队曾来董村公社花厅大队调查过“反共特工大队”反革命集团(这个事件发生于1964年,当时经公安局调查属假案)的有关情况。于是,就对茅有德进行“指供探讯”,说:“你参加什么反动组织?你是不是参加反共特工大队?你要老实交代”等,进行逼问,并责令茅有德继续作书面交代。整个上午,到民兵室来往的人很多,对茅有德进行了各种威胁。有的说“不老实交代坐老虎凳”,也有的拿出绳子一甩,说

“不交代马上吊起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16岁的茅有德恐惧万分，感到没有这件事，不好承认，特别是“反共”两字性质严重，但又感到不承认又要吃眼前亏，于是就去掉“反共”两字，被迫承认是“特卫大队”（当时是他把“工”字误写成为“卫”字）。

新壁公社接到电话后，当即告诉了在公社开教育革命会议的红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黄水土。黄立即回队，同大队革委会主任董立志二人，骑自行车于3日中午到了下董大队，与章丙健一起，看了茅有德的交代书。在交代书中有“他（茅有才）拉我参加这个组织，这个组织名称叫‘特卫’大队”一段。董立志看到这个组织名称后，联想起在几个月前，他参加贫宣队进驻联合大队时，新胜公社兰田大队曾给联合大队一封有关“联合大队某某某曾去江西，有参加‘反共特工大队’可疑”的信。当即把章丙健叫到门外说：“这个组织是个反动组织，要好好审查。”后就对茅有德施加压力，进行逼供信，说“你这‘特卫大队’上面，还有两个字剩掉，你要老实交代，交代了我们自行车带你回去，不交代你也不用想回去了”等，并一再催促。过了不少时候，茅有德经过咬笔抓头等一段时间激烈的思想斗争，在“特卫大队”的上面，被迫写上“反共”两字，变成了“反共特卫大队”。由于茅有德的交代材料已经改得糊里糊涂，又叫他重新抄了一份之后，就把茅有德当天带回红桥大队新塘沿，与茅有才在同一天进行了隔离审查。

这样，茅有德、茅有才兄弟俩就在自己大队隔离审查，群专（即“群众专政”，下同）人员特别是董立志，先后多次对茅有德威胁说“不交代要吃生活，交代了就没问题”。同时，出了一连串的题目进行追问：“你这样小的年纪参加反动组织，头头是谁？组织何时成立？何时开过什么会？哪里开的？怎样分组？活动经费哪里来？你拿到过多少报酬？”等等。在这样一系列的逼供、诱供、套供下，茅有德被逼交代了所谓“参加反共特卫大队”组织，是娘舅章仁田介绍到茅有才这里来的。10月10日晚上开会成立这个组织，会后，茅有才叫送信给章仁田，要章仁田他们10月13日晚上到新塘沿开会。10月13日章仁田、章得田、章得水（以上是三兄弟）、邹义伟四个人来的，茅有才主持会议，分配任务，活动分5个组，每人发粮票2斤，每组发3元钱……等等，同时交代出所谓“集团成员”的名单17人，分成5个组。

大队造反派对茅有才的隔离审查更是从严，多次毒打，直至不许吃饭，并以所谓“茅有德已经全部交代了，证据确凿。你再不交代，后果自负”。反复的刑讯逼供，茅有才就在12月5日、6日这两日，编造事实，写出了所谓参加的反动组织名称叫“浙南革命人民造反队57支队，本人担任新立组副组长爱斯号”的供词；还假供了“董村公社最大负责人是涂成信，其次是邹义伟、章仁田、涂臣山、涂利忠”。说“5月间有叶再复动员我加入，到邹义伟这里去报名……”等等，并交代参加的还有璜山王家龙、王鑫仁，石壁东蔡余林生，直埠武三木，会议桥余金学等，以及本生产队另外4人。

茅有才在6日被迫编造了上述案情后，自感对不起贫下中农，于是立即又写了“其交代全部是在刑讯逼供下伪造的”为内容的《告全大队贫下中农公开信》，放在桌上，后半夜越窗潜逃。后被县群专抓住，于同月8日，由新壁公社从诸暨县群专提回严加隔离……

这起案件，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先后牵涉到8个公社、3个单位、63人，被隔离的33人，其中由诸暨县群专隔离的有8人，隔离时间最长的达200多天，一般的在10天左右。这起案件，虽然没有死人，但已经弄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家无宁日了。而且，仅仅时隔8个月，同是在诸暨，再次发生了更为惊世的大冤案。

大案二1969：“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反革命集团案

1969年8月18日早上，诸暨县安平公社毛家畈大队洪林山（22岁，下中农成分，共青团员，大队俱乐部负责人）在厕所解大便时，误用一张印有伟人像的资料去揩屁股，当即受到在场的本大队党员洪白禾的批评，但洪认为他又不是故意，何必大惊小怪，两人争吵起来。8月27日大队开会，洪白禾向大队党支部洪玉胜汇报了洪林山的问题。会后，洪玉胜找洪林山进行了严肃的批评。9月4日下午，洪玉胜向安平公社革委会曹佩荣讲起洪林山的问题，曹当即向正在召开的公

社革委会成员会汇报了洪林山的问题,公社革委会当时认为洪林山不仅这次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平时也有谩骂干部、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又是去台湾人员的家属,决定当天把洪搞来审查。当晚9时左右,由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殷大路、委员曹佩荣、曹则能三人去把洪林山捆绑到公社办公室,由公社革委会主任周中生、武装部部长周一心、革委会副主任殷大路、委员曹佩荣等对其进行审讯,洪即承认了污损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的问题,并交代了一些其他错误。就在这个时候,公社曹佩荣同志恐吓他说:“毛家畈大队‘四清’后期出现的两条反动标语(与假案无关)有你的份。洪林水(洪林山的堂哥)在台湾来过信,你有没有见过?你要老老实实交代。”当洪矢口否认这两个问题时,他们凶神恶煞大吼大叫,殷大路还大打出手,逼着他写交代。洪在百般无奈,做了假交代:“他曾和洪兴森、洪大奎、洪学工、洪白木、洪申府、洪道成、施铁志等8人一起策划,写过反动标语。堂哥洪林水在1948年从台湾来过一封信。”当时,公社革委会少数人不加分析研究,就对这个假交代信以为真,如获至宝,连夜派出几十个群专人员以“刮红色台风”为名,将洪所供的7个人统统绑到公社。研究后,认为3人以上一起作案就是“集团”,本人交代就可“定案”。并在9月5日召开的“安平公社造反派组织完成历史使命大会”上,把洪林山等7人都挂上“反革命集团犯”牌子上台示众,会后分别进行隔离审查。在审查中,大搞逼、供、信,洪林山承认有“反革命集团”(指“写反动标语”的集团),总负责人是洪兴森、洪学工。公社革委会因此认为:洪兴森是集团核心人物,要作为重点审查。

9月12日,曹佩荣、齐玉林(公社革委会委员)、齐成方、陈飞天等人去审讯隔离在天车罗大队的贫农洪兴森,审不出就逼,逼不出就指供、诱供、套供,这样,洪兴森就假交代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的反革命组织的名称、集团人员代号(101－107)反革命联络暗号和纪律等问题,进而又按口供继续抓人,在审讯中继续搞了逼、指、诱、套供,使之发展到有什么枪支弹药、电台、经费,妄图炸毁石壁水库(当地的一个中型水库)、抢劫供销社、杀害干部等等。期间,还在洪兴森家中查到了一张照片,背面写有“朱砂任挺”4个字的落款,当时他们用主观判断,把“朱砂”解释为“定心”,“任”是任宏科(余杭县人,在1961年外流江西组织反革命集团判刑劳改,曾与安平公社陈村外流妇女王玉珍搞过两性关系,从王、任挂到洪兴森),“挺”是“反共救国军四明山挺进纵队”。由此确定洪兴森是任宏科封在诸暨的反革命集团首犯。直到后来查明,“朱砂”是诸暨县视北公社的“朱砂”大队,“任挺”是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该照片是任在1962年外流江西与洪兴森相识时送他的。公社革委会从逼、供、信中所获得的情况,不加调查分析,先后连续向县五次书面和口头报告了所谓战果,并提出拘留集团首犯的名单和要求,而县里也信以为真,不加调查研究,不加分析,即于10月18日批准拘留所谓集团首犯洪兴森、洪大奎、洪学工、洪道成等4人,并在一次全社性的对敌斗争大会上由县里派人去公开宣布拘留和讲话、表态,会后还在由40余人参加的一次干部会上肯定他们的所谓“成绩”。这样安平公社抓来关押的已经达52人(贫下中农27人、共产党员4人、大队革委会委员5人、地主子女及有历史问题的6人、“四类分子”10人)。对不肯“交代”的人员又大搞吊、打、跪,甚至老虎凳等刑罚,迫使他们承认参加反革命集团。被抓关的人员中,曾担任过生产大队长的沈军良,受不了折磨,于同年10月11日晚上上吊自杀;金力水于同年11月22日晚上服毒自杀;社员洪祥瑞于同年10月23日用菜刀在自己头部砍了数刀,自杀未遂;有数人至今身体仍有影响。毛家畈大队180户人家抓到公社去隔离审查的就有25人,涉及而未公开审查的多达62人,搞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就在这一年9月中旬,安平公社以“反革命集团”罪抓人的消息传到邻近的和济公社后,和济公社革委会有的领导成员认为安平等友邻公社都发现了“反革命集团”,他们和济不可能是真空。正在他们这样想的时候,安平公社告知“反革命集团”已涉及和济公社的红马墩大队,于是,他们立即派出公社党委委员边国方、公社革委会委员袁济生两人去安平公社了解案情和查阅交代材料,在洪兴森的交代中看到:红马墩大队沈小峰是反革命集团“联络员”,并提到“洪兴森与该大队袁思杰、袁春瑜、袁地火三人关系密切,有

事常通过沈小峰与他联络，洪兴森再会同101商量”等。回来即与公社党委副书记董初建作了汇报和研究，当时他们忙于筹建公社党委，决定先观察几天，但由于已经怀疑这些人在参加反革命活动，对他们的行动，处处存有怀疑，所以越观察就越像是反革命。数天后，有人传说安平公社这个反革命集团10月1日要暴动，要炸毁石壁水库，要杀害干部，若是阴谋得逞，损失不堪设想。在9月19日下午由公社党委副书记袁沙木、委员边国方、张志坚，公社革委会委员袁济生、孙大丰等人参加的会议上，一致认为事关重大，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当即决定先把沈小峰、袁思杰两人秘密抓起来隔离审查，当晚就将孙、袁两人抓进公社，马上对他们又逼又诱，被迫承认参加“反革命集团”和发展反革命成员。那天，公社党委副书记董初建刚从绍兴开会回来，听了汇报，看了“交代”，不加认真分析，就信以为真，积极支持并亲自主持审查这个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件，还成立了边国方、孙大丰、袁济生三人参加的专案组，确定公社党委委员袁福生去红马墩大队发动群众，揭发问题。其间，他们错误地用逼供信的方法搞口供材料，搞到口供材料后，又不深入调查研究，盲目凭口供抓人。同时，还叫所谓交代态度好的杨九君到许多大队去参加“大会游说交代”，欺骗了不少群众。在短短的一个多月时间内，先后抓进公社隔离审查的就达53人（其中贫下中农和基本群众50人、“四类分子”3人），红马墩一个大队就抓了18人。贫农袁浩天一家父子3人，2个儿子都是刚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也被误认为反革命而关押审查。和济公社党委、革委会部分领导成员和群专人员，专门派人从山上砍来毛竹做成宽厚的竹片作为打人工具，为了追查所谓“反革命武器”和“活动经费”，对少数人做了“猢狲捧桃”“老鹰扑天飞”“盘练踏杠”等残酷刑罚，有的当时打得昏死过去，社员袁文井当时就被打得尿屎流出，社员袁代荣打得浑身鲜血直流，至今还跷脚。

当县委发现案子有严重违反党的政策情况后，立即作了研究，果断地派出调查组，制止了错误做法，绝大多数被隔离审查人员释放回家。根据调查所获情况证明是假案后，县委领导又带领调查组到案发地举办学习班，认真学习文件，总结经验教训。对那些犯下严重错误的办案人员，作了严肃的处理，并分别在全委扩大会上及受害者学习班上作了深刻检查，当众烧毁了大部分假材料，分别到一些受害者家中赔礼道歉，听取批评。一方面召开“平反大会”，一方面做好经济上赔偿损失的工作。在经济赔偿中原则上做到：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在被隔离审查期间的工分全部赔偿，“四类分子”中为假案被隔离审查的误工分也作了适当的解决；为这起假案虽未被抓关，但被弄去参加学习班受审查写交代的人员的误工全部赔偿；被查抄所损失的物资，有物退物，无物的照价赔偿；被殴打成伤的治疗医药费按原发票报销，其误工适当解决。其赔偿损失的经费一般都有所在大队自己解决，对于受害人数最多的大队群众负担比较重，国家拨款帮助解决，及时挽回了影响。■

（作者为浙江省诸暨市《中共诸暨历史》编写组成员）

（责任编辑　杨继绳）

紧扣近10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变化　对苏共亡党进行更加系统精深的研究

畅销书《苏共亡党十年祭》作者再出新著

2001年，著名经济学家、党建专家、反腐研究专家黄苇町撰著的《苏共亡党十年祭》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后，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十多年来畅销不衰，成为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培训的热门图书。

十年磨一剑！12年后，黄苇町与江西高校出版社再度携手，重磅推出《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欢迎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来电来函洽谈团购业务。

团购热线：0791-88508502　传真：0791-88517295
开户名：江西高校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账号：361604200018000291798
开户行：交通银行洪都北大道支行

书名：《苏共亡党二十年祭》
出版时间：2013.4.
定价：42.00元
书名：《苏共亡党十年祭》最新版
出版时间：2013.4.
定价：35.00元
（接受电话订购，不另收邮寄费）

关于《雅科夫列夫访谈录》

○ 陈启民

为中国社科院翻译《雅科夫列夫访谈录》（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 ИЗБРАННЫЕ ИНТЕРВЬЮ: 1992–2005，以下简称《访谈录》）犹如苦熬“精神炼狱”。

全世界都知道戈尔巴乔夫，知道他的“公开性”、“新思维”、“改革”，却很少有人知道“公开性”的开创者、“新思维”的“灰衣主教”、“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1923年–2005年）。两者虽然都是布尔什维克制度的叛逆者，但前者更像是替罪羊，后者才是掘墓人。

一部《红楼梦》早就告诉我们，荣国府的衰败既怨不得“总经理”王熙凤，也怨不得“董事长”贾政。那个造就薛蟠，也造就贾宝玉的腐朽制度，灭亡是历史的必然。雅科夫列夫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所谓“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实质是带有奴隶制遗传基因的专制制度，这个制度的灭亡也是历史的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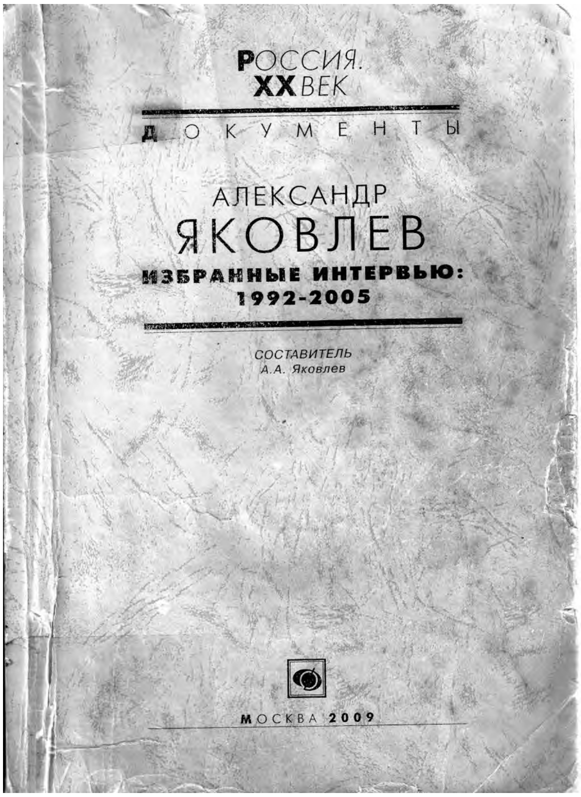
发人深省的是，像雅科夫列夫那样一个为保卫苏维埃祖国出生入死的人，一个在布尔什维克党培养下从权力金字塔底层爬到顶峰的人，一个曾经真诚信仰马列主义并为苏维埃政权尽心效力的人，一个既享受过一切“党内特权”又经历过“高处不胜寒”的人，怎么就从苏共宠儿变成了苏共的掘墓人呢？

《访谈录》似乎为我们提供了某种答案。《访谈录》选录的100篇谈话，是作者从1992年到2005年对俄罗斯各新闻媒体谈话中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它所提供的有关苏共和苏联的历史档案信息，在数量、广度和深度上都令人震惊。尤其因为雅科夫列夫既是苏俄的著名历史学家，又是戈尔巴乔夫时代主导“民主改革”的政治局委员，还是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位总统的“国师”，且一直担任“为政治迫害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主席，接触大量已经解密和尚未解密的苏联历史档案，所以，他所披露的档案史料具有毋庸置疑的可信度。你可以对他的观点说“不”，但你无法对档案袋里现身的历史真相说“否”。

令人震撼的首先还是斯大林及其专制制度的暴行。笔者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还在那里先后当了10年多的常驻记者，算得上是对苏共历史并不陌生的人，但《访谈录》披露的许多内幕仍然让我不寒而栗。斯大林及其体制迫害的对象不仅仅是一个又一个“反党集团”和一批又一批“人民的敌人”，而且是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人、军人、知识分子、妇女、儿童、旧官吏、旧军人及其家属、被俘的红军官兵、少数民族普通百姓……受害者总数达3000万之众，占战后人口的三分之一。这是无法用任何“扩大化”可以解释的。

据《访谈录》引述的苏共秘密档案记录，斯大林本人曾亲手签发366份枪毙名单，直接剥夺4.4万人的生存权利，这还不包括被其政策迫害致死的数百万牺牲者。他“既不认识他们，又不看他们的立案材料，就签发枪毙名单”——显然，这与“政策失误”风马牛不相及。

“领袖们争先恐后地批准杀人”，例如，仅1937年11月22日一天，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丹诺夫就批准了12份死刑名单，合计1352人；同年12月7日批准了13份名单，合计2397人，其中2124人被枪决；1938年1月3日，上述三人加上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批准了22份名单，合计2770人，其中2547人被枪决；2月份——28份名单，合计3699人，其中3622人被枪决；3月份——36份名单，合计3286人，其中2983人被枪决；4月份（伏罗希洛夫没参加）批准了29份名单，合计2799人；1938年6月1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了29份名单，合计2750人，其中2371人被枪毙；9月12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和日



《雅科夫列夫访谈录》(俄文版)

丹诺夫批准了38份名单,合计6013人,其中4825人被枪毙(《访谈录》,№100)。

雅科夫列夫说,在涉及41391人的361份名单上有斯大林的签名,在涉及43569人的373份名单上有莫洛托夫的签名,在涉及20985人的175份名单上有日丹诺夫的签名,在包括18474人的186份名单上有伏罗希洛夫的签名,在涉及19110人的189份名单上有卡冈诺维奇的签名。"卡冈诺维奇喜欢一边骂娘一边挥笔批示:这个娼妇,这个骚货,这个败类——统统枪毙。"(《访谈录》,№84)

受迫害的"祖国叛徒"和"人民的敌人"的家属计达40056人。1938年8月20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批准了叶若夫提供的一份名单,对15名"人民的敌人"的妻子提起"一级"诉讼,她们全部被枪毙,其中10人是家庭主妇,2人是大学生。她们的丈夫在稍后的1939年初统统被枪决。

令人发指的是,契卡和克格勃人员竟然把签署"枪毙"名单当作"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比谁签得快、签得多,不走任何司法程序,闭着眼睛签发枪毙名单。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弗里诺夫斯基受斯大林委派乘火车去远东,带了3名助手和所谓"相册"——装订成册的3000幅"照片"。他们边喝酒,边听留声机,边搞竞赛:看谁签署——就是在判决书上写上字母"р"(俄文расстрел即枪毙一词的第一个字母——笔者注)的案卷最多。他所带的全部案卷所涉及的人悉数被枪决。在内务部三局和四局之间也搞了社会主义竞赛。竞赛结果写道:"四局抓得多,三局杀得多",四局胜出(《访谈录》,№82)。

杀人是有指标的。一份地方长官给中央的电报说:"我们请求补充指标。"为完成上面下达的"枪毙指标",日托米尔州一个叫维亚特金的人,不经侦讯和审判就擅自决定对3000人执行枪决。

杀人无需理由。雅科夫列夫说:"不久前我读到一份个人案卷——吉娜伊达·阿德米拉尔斯卡娅。她是伊万诺沃的纺织女工。上面指示要从工人中提拔一名做共青团工作的干部。她被选为伊万诺沃州共青团第一书记。克格勃把她叫去,向她出示一份名单,说:你听好了,这些人依你看正在策划一项针对党和政府领导人、针对斯大林的恐怖行动。你来充当他们的头头,向我们揭发他们都是你的阴谋同伙,然后我们把你从这个案子中摘出来。她拒绝这样做。结果她被抓起来枪毙了。临刑前她要了一面小镜子,对着镜子整理头发,以便死得有尊严。这件事太让我震撼。这些替身后面,这样被枪杀的人,不计其数。"(《访谈录》,№83)

鲜为人知的是,还有数以百万计的孩子沦为牺牲品。他们有罪仅仅因为他们是贵族、"富农"、神职人员和所有被列入"人民的敌人"大名单的人的子女,是德国人、车臣人、卡尔梅克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所生的孩子。

数百名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参加者的亲人,包括孩子,被抓为人质。其中就有科兹洛夫将军的孩子:17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1918年彼得格勒契卡下令枪杀500名人质。1918年–1922年间布尔什维克使用把孩子扣为人质的手段,对付反对当局农业政策的农民。从1918年秋季起,开始建立集中营,被关押的囚犯大多数都是被抓为人质的"暴乱分子"家属,其中包括怀抱婴儿的妇女。那些"被剥夺了土地和财产的富农分子",统统被从肉体上消灭。三四十年代全国被消灭的农户计约700万。当时每个

农民家庭平均六七口人（以六口之家计算，就是4200万人），其中半数是孩子。

从1941年8月末开始驱逐德国人。1943年到1944年这一悲惨命运又落到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克里米亚鞑靼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身上。1944年被逐出格鲁吉亚的有梅斯赫金土耳其人、库尔德人、赫姆申人和阿塞拜疆人。

到1949年7月"特殊村民"即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居民总数达2092527人，其中16岁以下儿童为755278人。总体死亡率达27%，其中儿童死亡率比成年人要高（《访谈录》，№53）。

雅科夫列夫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布尔什维克政权以"革命"的名义扼杀了6000万人的生命（包括卫国战争中牺牲的3000万），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崇尚权力的统治者和崇尚暴力的专制制度假"无产阶级专政"之名行法西斯暴政之实，这与真正的共产党人和科学社会主义能有什么关系呢？

《访谈录》披露的另一重大历史事实是"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及其隐瞒了数十年的两个秘密备忘录。这些文件虽然在西方早有爆料，但在苏联却半个世纪讳莫如深。在1989年12月第二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雅科夫列夫做了关于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和约"）及其附属秘密备忘录签署后果的报告。代表大会首次做出承认秘密备忘录存在的决议（原件直到1992年秋天才找到），并对这些文件的签署进行了严厉谴责。

"条约"及其附件是二战前苏德勾结，合谋瓜分波兰和欧洲的铁证。正是根据这一"条约"，德国从北、南、西三面入侵波兰，苏联从东部占领波兰（包括制造屠杀22000名波兰军人的卡廷惨案），同时并吞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三国和芬兰、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后来，又迫使外蒙古脱离中国变成苏联的缓冲国。斯大林还以盟友的身份向希特勒提供石油和粮食援助，甚至命令欧洲共产党不得支持本国政府抵抗德寇。

由于斯大林过分相信希特勒的"友谊"，使苏联对德国"背信弃义"发动闪电战猝不及防，从战争一开始就溃不成军，致使500万苏联红军在短短100天内全军覆没，一半被歼灭，一半被俘虏（据苏军总参谋部的资料记载，在4年卫国战争中被俘的苏联官兵总数为405.9万，而在头两年被俘的就有333.9万人，占被俘总数的82%），进而导致3000万人死于卫国战争的巨大悲剧（《访谈录》，№100）。

雅科夫列夫说，许多关于"为了斯大林，冲啊！"的神话都是马屁文人的异想天开。作为卫国战争老战士，他本人没有也从未听到过别人在战场上高喊什么口号，"生死关头唯一的本能反应就是一定要抢在被敌人消灭之前消灭敌人"。所以，用3000万祖国优秀儿女（其中多数是健壮的青年）的生命换来的最终胜利为斯大林编织桂冠是苏共的耻辱。

《访谈录》对1917年"十月革命"真相的爆料是颠覆性的。我们从孩提时代就铭记在心的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列主义"，原来"十月革命"竟是一场未放一枪的宫廷政变：既不曾有"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炮声，也不曾有工农武装"攻打冬宫"，有的只是列宁的卫队长带领十几个人，朝天花板放了一枪，像抓小鸡一样地抓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列宁挥动手臂说"一向所说的工农革命实现了！"的场面只不过是"列宁在十月"的电影家们的"艺术想象"。

布尔什维克政权是从宫廷政变出发走向一党专制的。政变的续篇是国内战争，1300万人死于战乱和饥荒。接着是强迫集体化，数百万农民被赶出家园，变成"人民的敌人"。后来是3000万人死于卫国战争。战后是"医生案件"、打击"世界主义"、"列宁格勒案件"、大规模"肃反"……1500万人死于政治迫害。从1923年到1953年苏联监狱关押过的"犯人"超过4000万（《访谈录》，№16）。

雅科夫列夫认为，布尔什维克一切罪恶的渊薮是"十月反革命"（Октябр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说"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

雅科夫列夫认为，对列宁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终必然引向"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他得出的结论是，在"一党专制"条件下，堡垒只能从内部攻破，尤其因为有克格勃这个"党中之党"、"国中之国"，只能利用苏共的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从内部瓦解它。他说："我坚信，只有在内部，在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党内特权阶层内部，才能发起改革。像索尔仁尼琴、

萨哈罗夫那样同制度斗，固然十分高尚，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对这个制度不能正面强攻，只能侧面迂回炸掉它。”（《访谈录》，№45）

他认为，“改革”足以确立戈尔巴乔夫的历史地位。“改革”的主要功绩是结束了“冷战”，确立了民主方向，制定了民主宪法，实行了总统制、议会制和多党制，承认普世价值观。但“改革”不彻底。戈尔巴乔夫是“国际关系大师”，但缺乏铁腕和警惕性。法西斯主义在俄罗斯复辟的危险随时存在。

他称赞叶利钦是“民主斗士”，但认为“别列韦日协定”违法。他始终反对“休克疗法”，但理解和支持“改革”少壮派。他说“改革的永恒敌人”是权贵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各级官吏。他对民主、自由、市场经济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毫不奇怪，对雅科夫列夫观点的看法在苏俄国内外都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从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的宠儿转变为掘墓人的心路历程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纵观雅科夫列夫的人生轨迹，说它“超乎寻常”绝不是夸张。根红苗正，从中学课堂直奔战场，为祖国浴血奋战，不到20岁重伤致残，但因沐领袖阳光、滋党的雨露，一路“春风得意马蹄疾”，如愿上大学，进党校，赴美留学，从州委宣传部干事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从普通党员到中央委员，48岁的他距离权力金字塔顶层只差一步，如果不是因为发表那篇捅马蜂窝的倒霉文章的话。

那是40多年前的事了。记得1972年11月15日早晨上班后，我按惯例快速“扫描”刚刚收到的厚厚一摞报纸杂志。诚如当时的流行语所说，“《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但《文学报》上一个醒目的标题——“反对反历史主义”（《Против антиисторизма》/《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5 ноября 1972 г.）赫然闯入眼帘。这篇占了足足半版的大块头文章，署名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文章激烈抨击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排犹主义，明显挑战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气势之磅礴，锋芒之犀利，均非一般文人学者可为。新闻敏感和政治直觉告诉我，作者一定不是等闲之辈。但，他是谁呢？我依稀记得，好像苏共中央宣传部有位负责人叫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可我无法确认，也不敢相信那样身份的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把十分敏感的民族矛盾拿出来晾晒，如果没有特殊政治背景的话。

我略微踌躇了一下，拨通了《纽约时报》驻苏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的电话。正巧，他刚托苏联新闻社的记者帮助核实过，说作者就是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不，是代部长，四年还没有去掉“代”字的雅科夫列夫。

像投入死水微澜中的一枚重磅炸弹，文章捅了马蜂窝，惊动上层，也在社会上掀起了波澜，抗议信雪片似的飞向苏共中央。《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青年近卫军》、《我们同时代人》等主流媒体蜂拥而上，口诛笔伐，连《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苏联文坛霸主肖洛霍夫都按捺不住怒火，给苏共中央写了强烈谴责雅科夫列夫的信。

当时，没有人怀疑这篇文章是苏共高层分歧和斗争的反映。但从多年后作者本人披露的背景看，他写这篇文章纯属个人行为，上面没有后台，倒是下面不乏支持者。“我在《文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政治局会议和中央书记处关门会议都讨论过，我处于绝对少数。我曾试图做些解释，但主持会议的基里连科打断我说：‘萨沙，你别把我们拖入理论之争。有人警告说文章是错误的。这一点我们指出来，但不会给你处分。’而第二天一早就送来一份通知——决定派我出任大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变成了‘反俄分子’、‘犹太分子’、‘中央情报局特务’等等。”（《访谈录》，№54）

就这样，雅科夫列夫被开除苏共中央，体面流放到国外，于1973年出任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一去就是十年。

是戈尔巴乔夫拯救了他。1983年时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访问加拿大，“他乡遇故知”，相见恨晚，同雅科夫列夫彻夜长谈，十分投机。在戈尔巴乔夫的保举下，雅科夫列夫很快回国，接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两年后重返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之职，旋即晋升为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并于1987年6月进入苏共政治局，迎来了辅佐戈尔巴乔夫推进“改革”的辉煌岁月，同时也在政治沉浮中完成了“精神裂变”，从马列主义怀疑者转化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成为苏共和苏维埃制度的掘墓人。

他是这样叙述自己的世界观转变的："转变立场——其实是对现存社会制度的抗议，这个被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是教条在随心所欲地主宰生活。有些人，他们从来就没相信过任何思想，他们相信的是权力，并且只相信权力。一旦出现可能得到权力的机会，所有的思想就都跑进阴沟里去了。这是典型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它的主要动力——政治动力，精神动力，随便什么动力——都是排除异己，谋取权力。不惜任何代价夺权、掌权——这是纯布尔什维主义特征。然后再进行意识形态伪装。在这里不值得谈论信仰，除了假仁假义、虚伪诡诈，没有别的。"

"苏联历届领导人并不真懂马克思主义。大家都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水平。马克思主义毕竟是19世纪的重要学说。虽然我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我认为《简明教程》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践踏，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丝毫关系，是一派真实的谎言，胡说八道的谬论。"

"……怀疑一直在我心里占主导地位。第一次打击犹如当头一棒，是在雅罗斯拉夫尔。那时我刚从前线回来，拄着双拐——浑身软弱无力：身上有4粒子弹，毕竟不少。幸存下来实属偶然，在战地医院躺了6个半月。是这么回事：一列载着我方战俘的闷罐车从车站疾驰而过。您设想一下，我的战友——被关在门窗密闭的闷罐车里！难道这不是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要知道，在战争最初几个月里，被俘的人员有300多万，全部将士的一半都当了俘虏！您很难理解，这对我是多么大的心理创伤。"

"布尔什维克制度把我们变成了两面派、告密者、社会假卫道士……我们有个很大的骗术、花招——就是偷换概念。共产主义思想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什么不好……所以同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斗争毫无意义。而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种政权形式，它在利用马克思学说中最最讨厌的政治说教部分，首先是我说过的——暴力，外加谎言和投机——用我们俄罗斯老百姓所经历的漫长不幸、持续的贫穷和苦难、无休止的战争、历史性的疲惫进行投机。"（《访谈录》，№46）

"全都是虚伪之徒，无一例外——包括我自己。当众像伪圣徒一样祈祷，仪式无尚神圣，而真实信仰——藏在心里。"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1923-2005）

"是马克思主义治好了我的马克思主义病。当我第一次参加党代会并听烦了党内报告时，我得到的印象是苦恼。我从外省，从雅罗斯拉夫尔来，怀揣神圣的信仰，突然——全是臭狗屎。我当即递交了声明，退出中央委员会——学习去了。大家惊讶得很——怎么可以退出中央？我进了科学院，开始阅读第一手资料。我的信仰完全破灭了。"（《访谈录》，№64）

"就是在社科院的那几年把我最终引向现在的立场。我在那里重新认真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其中大量矛盾的东西令我震惊。'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自己，'是探索真理还是为政治服务？'我明白了：列宁服务于政治。应该承认，他是天才，但也是狂热分子。他染上了真正的政权症。他无情地跟那些与他意见不合的人一刀两断。我想，1903年俄罗斯社会民主党的分裂是俄罗斯的悲剧。正是在那时，产生了与共产主义思想相距甚远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马克思主义本来可以在诸多正常的政治学学说中占有一席之地，假如它不和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否定普世人类价值等意识形态联姻的话。布尔什维克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提取了所有能为政权服务

的东西：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观念等等。单一政权、单一意识形态、单一所有制和暴力——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从1903起社会主义思想在俄罗斯变了样，所以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只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封建主义制度……”（《访谈录》，№21）

雅科夫列夫说，真正促使他世界观转变的是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当时我33岁，一名年轻巡视员，坐在露台上，突然听到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说了那番话。您可能不相信——我当时的感觉是，要么是在睡梦中，要么这是天大的陷阱，然后把我们都装进闷罐车送到东部，送到那儿（集中营）去。走出会场时，没有人敢相互对视一眼。后来，所有的事实都得到了证实。”“它让我震撼……赫鲁晓夫所讲的那一切,是对我良知的呼唤。不能再按老样子生活下去了，虽然我深信这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是的，某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我早有察觉。例如，在州党委工作时我见过克格勃的简报，了解高校教师的可怕处境：他们的信件被拆看，谈话被窃听，他们中间有线人……但只有在苏共二十大后我才开始明白那整个弥漫着恐怖气氛的生活，看清那笼罩在每个人头上的阴影——监狱、集中营、枪杀、告密……就像克留奇科夫指控我有特嫌一样，所以产生了要弄清一切，为自己寻找许多问题的答案的念头。于是我再次决定上学。我三次申请去社会科学院学习，第三次才得到同意。这是二十大刚开过后的事。”

雅科夫列夫说：“‘看破红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1946年不止一次见到痛哭流涕的妇女，心怀一线希望地夹在俘虏中间，经雅罗斯拉夫尔的伏斯波尔耶车站被遣送到苏联集中营，去见她们的丈夫、兄弟、父亲。从闷罐车里丢出的纸团上写着被揉搓得字迹模糊的名字和家庭地址。这个打击太无情，太残酷了。多半由于这种骇人听闻的斯大林罪行，加上后来从人民-胜利者身上碾过的迫害，直至40年代末，恐怖气氛笼罩全国，占绝对地位。”

“世界观的转变不会在瞬间突然发生。一切对我要更复杂得多。曾有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权力感到害怕：我可以决定释放或者关押一个人——只不过是打一个电话的事。我为什么要和这个制度斗来斗去？长期以来我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我们的苏维埃国家在走向灾难。事实上我从年轻时就开始意识到，这个制度有点不对头。我记得很清楚，1947年我听党的领导人和各种讲演者说，我国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可我看见的却是周围全是饥饿，孩子在死亡。恰恰在这个时候州委会在雅罗斯拉夫尔讨论，必须无情地惩治散布饥荒蔓延谣言的人。而当时我们那儿的幼儿园就死了数百名孩子！怎么是谣言呢？在区委会上众口一词地说：‘朝着共产主义的胜利，前进！’‘感谢斯大林同志！’不一而足。严厉管制少年集中营外面，竟然张挂着‘感谢斯大林给了我们幸福的童年！’之类的标语，厚颜无耻到这样的地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印象越积越多，直至有一天我向自己发问：‘我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观点和信仰？’我这样对您说吧：观点和信仰——如果可以这样表述的话——是强行灌输的老一套。真正的信仰我当时是没有的。”

雅科夫列夫说：“苏联官方历史上没有一句真话。当你着手研究某一事件，搜集史料时，你会发现事实上一切都大相径庭。就连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一样，更不用说像十月政变那样的历史篇章了。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是政府病倒在秋天的石板路上，国家无人管理，军队处于瓦解状态，商店空空如也，群众开大会，捣毁面包铺和酒铺，安东诺夫—奥夫谢延科带领一伙布尔什维克开进了斯莫尔尼宫，逮捕了临时政府的部长们。没有任何反抗，就像没有“阿芙乐尔”的炮声一样。枪声有过，但那只是朝斯莫尔尼宫的天花板开的枪。后来有关攻克斯莫尔尼宫的英雄形象都是按照这样的脚本塑造的……列宁进行的就是这样的政变，不过他成功了，在鹅卵石大街上捡了个政权。列宁给俄罗斯造成的危害之大无人能比。与其说十月革命是革命，毋宁说是反革命。”（《访谈录》，№56）。

“一切都始于‘怀疑’这个哲学状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我们过着三重生活：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嘴上说的是另一回事，行动上做的更是另一回事……困难也就在这里——怎样才能把怀疑和不断增长的抵触情绪变为实际行动。当时我很同情持不同政见者。同情来自《新世界》，来自同《十

月》、《青年近卫军》、《苏维埃俄罗斯》的斗争……我终于明白了，持不同政见者什么都干不成。更有甚者，克格勃开始把他们收揽在自己的羽翼下，招兵买马，派自己的特工打入持不同政见者队伍。最终我得出一个结论：这个野蛮的制度只能从内部炸开，利用其极权主义发条——党。提出了差额选举问题。许多人当时都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是在挖我的墙角，这是不想让我再被选上。有趣的是，整个官僚阶层都非常清楚，他们在自由选举中不会再当选。果然，在首批选举中就有32名州委和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未能当选。而这仅仅是刚刚——刚刚开始。”

从雅科夫列夫的自白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启示呢？窃以为，主要有两点：

一、“真实的谎言”迟早会让虔诚的信徒走向背叛。

雅科夫列夫说，一切都来自“怀疑”这个哲学状态。而“怀疑”来自现实生活。如果一个人让你失去信任，他失去的是人格；如果一个党让你失去信任，它失去的是忠诚；如果一个“主义”让你失去信任，它失去的是信仰。

上帝允许任何领袖人物、任何政党犯错误、走弯路，但不能容忍对人民的愚弄和欺骗——即使是出于“善意”。阴谋不行，阳谋也不行。人心一旦失去，就很难收回。我们曾经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奉为共产党的《圣经》，事实证明那是斯大林伪造的历史，与今天日本右翼篡改二战历史没有本质区别。类似的现象在中国现代史上也不是没有。

我们经常心怀不甘地明知故问：为什么在亡党亡国的危难关头，1800万苏共党员中竟没有一个“好汉”挺身而出？非也，“9·18”政变不就是“好汉们”上演的一出“螳臂当车”吗？问题是本来就是体制内既得利益者的克留奇科夫们逆潮流而动，众叛亲离，不得人心，岂能“挽狂澜于既倒”？人心思变的广大党员恨不得早一天改天换地，又岂能伸手“扶大厦于将倾”？这就叫“失人心者失天下”！

二、“苏联模式”必须否定，暴力专制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尽管雅科夫列夫说他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始终强调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毫不相干，“从1903起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俄罗斯变了样，所以在我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社会——有的只是在新的基础上重建的封建主义制度……”所以，“苏联模式”从一开始就是假“社会主义”，真法西斯主义。■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长期驻莫斯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者来信摘登

贵刊2013年第1期，“读者来信”摘登栏，许岳林先生写的《“说不清楚”的内忧话题》中讲到浙江龙泉河村劳教农场1960年6月11日大火事。就此事我也来补充一点内容。我父亲吴明允先生是平阳县右派，此时也在河村农场劳教。他对我讲过下述事实：

那天他被派去割沤肥的草，当时风气是吹大牛放“卫星”，人人都得放，须超过定额一倍，才算放“卫星”。父亲筋疲力尽好不容易割到符合“卫星”要求的草，回来时午饭时间已过。难友们都已吃过饭，进宿舍午睡了。父亲到食堂拿了饭钵，独自坐在山坎上吃饭。突然间，他看到茅坑沼气起火，火势猛烈。父亲惊呼，起火啦，快出来呀！然而农场管教却吹哨子，高声叫喊，大家不要惊慌，安静休息，没有事。难友们在房内不知外面火势，同时人人都疲劳已极，巴不得没事可以休息一会儿，听管教喊叫没事，都安心睡下了。实际上火情非常危急，起火点就在宿舍旁边。宿舍离水源很远，烧起来无法救。在这种情况下，管教人员如有起码的人性和责任心，应该叫难友们起床躲避。这场灾难本来是可以避免或至少可以少死很多人。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不叫躲避。山上风大，火乘风势，顷刻之间燎着了房子。难友们住的房舍顺山坡而建，共有十多排，间距不大，有一排烧着就延烧到另一排，房顶是稻草盖的，四周挂满了雨天穿的蓑衣，都是易燃之物，很快房舍四面燃烧，烈火熊熊。难友们惊起出逃，门少而小，门口又堆放着工具，慌乱拥挤之下，仅有部分人逃了出来。在该农场劳教的右派，有五六百人。这场大火烧死242人。我父所在第7组，共11人，烧死9人，除他外，还有一位难友住医务所得以幸存。大火熄灭后，被烧焦的尸体已面目全非，不可辨认，也无须辨认，拢总挖个大坑，往里一埋，就算完事。

在这次事故中，农场除清点人数，检查有没有人乘乱逃跑外，就没事了。没有任何人为此事负责。悄无声息，好像未发生过一样。父亲说，不知农场怎样通知他们的家属。只有极少数家属来，他们什么也看不到，唯掩面饮泣而已。

南京读者　吴式超

读《千古兴亡》

○ 杨美艳

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王太林的史学新作《千古兴亡——破译君主社会朝代更迭的密码》(以下简称《千古兴亡》)。因工作关系得以先睹，感觉论从史出，有理有据；自成一统，成一家之言，值得推荐。

《千古兴亡》不是时下流行的以现代口语翻译古籍，也不是经常见到的借古喻今，而是从历史实际出发，提出了一个关于朝代更迭的系统的、全新的观点：

两千年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并不是农民起义、打倒皇帝做皇帝那样一种暴力模式的不断循环，而是表现为两个阶段、三种模式、六种具体方式。

两个阶段以宋朝为拐点。宋以前的君主制度整体上具备自我更新的能力，历代皇朝体制内部程度不一地都可以生成更迭力量，或是单独、或是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推动了改朝换代；宋以后的君主制度整体上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历代皇朝体制内部再也不能生成更迭力量，全部是被来自体制外部的力量、通过大规模战争武装推翻。

三种模式分别是：共生型更迭模式，以朝廷体制内部生成的力量与其他社会力量共同推动改朝换代为基本特征，全部出现在宋以前，共3次，之后建立的3个新朝共存续699年；各皇朝存续时间都比较长，最长289年，最短195年，平均233年。内生型更迭模式，以朝廷体制内部生成的力量单独推动改朝换代为基本特征，也全部出现在宋以前，共20次，之后建立的20个新朝共存续786年；各皇朝存续时间大都比较短，最长103年，最短14年，平均39.3年。外生型更迭模式，以朝廷体制外部生成的力量推动改朝换代为基本特征，全部出现在宋以后，共3次，之后建立的3个新朝共存续631年；各皇朝存续时间都比较长，最长275年，最短89年，平均210.3年。三种更迭模式在君主社会历史上所占据的时长，大约各三分之一。

六种具体方式分别是：共生型更迭模式，通过从农民起义开始的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大起义一种方式实现。内生型更迭模式，通过温文尔雅的政变、原版的兵变、黄袍加身的兵变三种方式实现。外生型更迭模式，通过外族入侵和单一农民起义两种方式实现。2132年间、26次主要的朝代更迭中，从农民起义开始的全社会各阶层人民大起义3次，温文尔雅的政变5次，原版的兵变9次，黄袍加身的兵变6次，外族入侵2次，单一的农民起义1次。

君主政治相应表现为三种形态：世家政治、军人政治、官僚政治。

君主社会的朝代更迭总体上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理念之上的“有道伐无道”，是革命。

《千古兴亡》的作者认为他的方法“是政治技术层面的而不是政治主张层面的，是经验的而不是先验的”。认为这一方法，“首先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宽松的学术环境”而“得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其次得益于近些年国内与国际学术交流、互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从工程、技术层面与视角来研究人文社会科学成为学术界能够理解与认可的一种方法”。并且认为“对于摆脱动辄上纲上线的极‘左’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千古兴亡》在方法上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一、论从史出。不是带着观点找事例，让史实服从观点；而是从史实出发形成观点，让观点服从史实。二、注重定量分析。中国历史浩如烟海，如果带着观点找事例，几乎任何观点都能找到相应事例，历史或也就不免成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历史研究中注重定量分析，值得提倡。三、文笔流畅，陈述清楚，作为学术著作，可读性较强。四、内容扎实，编排简单，作者付出的是一份诚实的劳动。

由于这样的方法,《千古兴亡》在对朝代更迭提出新观点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许多长期被忽略的历史现象和问题,从“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并非原创”到“农民起义不可一概而论”,等等,令人耳目一新。

《千古兴亡》的初稿最先在人民网和天涯网同时贴出,同时加精置顶,受到持续关注。曾有不同倾向的网站选择性转载,也曾有不同倾向的网友选择性“拍砖”,但多数网友赞同该书观点。有网友曾将初稿全文制成pdf文档、上传到百度文库中,并加了如下按语:

> 被作者的横溢才华深深地折服。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他的热血忠肠。这样的人,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中国公民——他很爱中国。
>
> 我第一次知道,中国古代帝王们,一直在努力寻找“权力的制约”的最佳方法——这包括对文官权力的制约和对武将权力的制约,也取得了“政治技术”层面一定的进步,并非一无所获。这点在现在似乎很有意义。……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第一次阅读完《资治通鉴》的朋友,再阅读一遍该论文,感觉会非常好。你会觉得脑海中有点混乱的历史——从三家分晋到五代十国,一下子清晰起来。

这段话或有意或无意,又触及到我国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古人中,清朝历史学者章学诚曾经指出,“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大势”者,即贯穿历史的总趋势,亦即黑格尔所谓历史的“逻辑”。今人中,历史学家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的“题记”中曾经指出,“在内容上,要求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但也正如他所说,“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中国古代历史的“大势”“逻辑”“内在联系”“发展规律”有没有?是什么?显然还是一份有待继续、值得继续的工作。诚如作者所言,他绝不认为自己的观点一定正确,且该书中也确有待商榷之处,但作者的努力已经成为这份工作的一部分,其观点也将在历史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

人类在不断认识自身中前行,以史为鉴、不断深化对历史的认识是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正在推动中国社会艰难前行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认识建国以来历史开始的。

诗云:匪今斯今,振古如兹。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伸,民族复兴是中国历史的继承,我们是中华民族的子孙,需要且应该深入解读、认识、借鉴先人走过的道路。近年来出现的“历史热”,就表现出了这样的趋势。“历史热”将会自然地经过以现代口语翻译古籍的阶段、经过借古喻今的阶段而走向深入。■

(作者为人民出版社历史编辑室主任)

(责任编辑　杨继绳)

更　正

本刊2013年第6期杨继绳先生《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一文,第23页左栏倒数第7行,“陈伯尘”应为“陈伯村”。陈伯村时任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是“高岗分子”,名列“五虎上将”之后的第六名,事件后被贬到哈尔滨,任哈尔滨水泥厂副厂长、哈尔滨热电厂厂长,文革后平反任电力部副部长。

震撼世界的“布拉格之春”

○ 刘天白

改革运动向苏联模式挑战

原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组成，它于1918年在奥匈帝国解体的废墟上宣告成立。二战前它是世界上10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21年建立，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时期是合法政党之一。二战期间领导人民以各种形式进行反法西斯斗争，涌现出像伏契克这样举世闻名的英雄。1945年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后，捷共领导人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提出捷克斯洛伐克应走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说，“苏联用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手段”；“在我们共和国，我们正在经历独具特色的发展，不能套用任何公式。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捷共与流亡伦敦的贝奈斯总统通过谈判，组成包括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贝奈斯留任总统。在政治上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留和利用传统的民主制度；在经济领域，在实行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同时，在商业、服务业和农业中保留私有成分。1946年5月通过议会选举，捷共获得38%的选票，在300个议会席位中占有114席，哥特瓦尔德被任命为总理。以哥特瓦尔德为首的联合政府，希望保持与扩大同西方的经济贸易关系，1947年甚至同意参加援助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后因遭到斯大林的怒斥而取消）。1948年2月，当联合政府中的资产阶级企图复辟时，捷共运用群众斗争与议会斗争相结合的策略，粉碎了资产阶级的进攻，实现了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斯大林逼迫捷大搞清洗

上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国际上冷战席卷全球，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在共运内部，苏联对南斯拉夫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日益不满，苏南之间的矛盾激化。斯大林指责铁托“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帝国主义的“间谍”等。在苏联推动下建立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48年6月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为了防止南斯拉夫的民族独立路线在东欧国家蔓延，斯大林下令这些国家大抓所谓帝国主义和铁托的“代理人”“民族主义分子”“特务”等，并派大员到这些国家坐镇策划和督战。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在东欧各国展开。与此同时把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强加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当时任何不同于苏联的主张和做法，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而遭到批判和镇压，哥特瓦尔德不仅不敢再坚持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特道路，而且从1950年起，开始在国家的各个领域，全面照搬苏联的做法，并且在党内大抓“铁托分子”、“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叛徒”、“特务”等。当时任外交部长的斯洛伐克人克列门蒂斯及其几名副部长相继被捕，接着斯洛伐克共产党的一系列领导人遭到同样的命运，如斯共副主席古斯塔夫·胡萨克（1913-1991）等。不仅一大批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老战士以间谍的罪名被投入监狱，就连1945年5月领导布拉格人民发动反对德国法西斯起义的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二战中在苏联组建“捷克斯洛伐克兵团”的司令卢·斯沃博达等也身陷囹圄。1951年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阿·米高扬突然来到布拉格。他转交了斯大林给哥特瓦尔德的亲笔信。斯大林在信中坚决要求逮捕鲁·斯兰斯基，说他进行反对国家的阴谋活动，有逃跑西方的危险。鲁·斯兰斯基曾长期担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是哥特瓦尔德的亲密战友。哥特瓦尔德表现犹豫。米高扬同斯大林进行直接联系后，说斯大林坚持他的意见，并说斯大林提醒哥特瓦尔

德注意他所担负的重大责任。1951年于11月24日夜里逮捕了斯兰斯基。

据统计，遭受打击和迫害的人有近10万，近15万人被开除出党。从1948年10月到1952年年底共判处死刑233人，其中178人被处决。最大的一起是以鲁·斯兰斯基为首的所谓“反国家中心案”。斯兰斯基等11名副部长以上的捷共高级领导干部被判处死刑，另外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1953年哥特瓦尔德逝世后，诺沃提尼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又兼任总统职务，独揽党政大权。他以“肃反”有功起家，执政后，变本加厉地推行苏联的中央集权制度，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困难加剧，斯洛伐克民族要求享有平等地位的呼声受到压制。

苏共20大揭发斯大林错误捷共内兴起改革思潮

1956年2月苏共20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改革思潮在捷共内部兴起。改革政治经济体制的呼声日益高涨。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领导依然为其在所谓肃反方面的错误辩护，压制群众的呼声，拖延对50年代冤案的平反工作。1961年举行的苏共22大掀起了第二次批判斯大林错误的运动，这在捷克斯洛伐克引发了新的反抗诺沃提尼统治的热潮。在群众的压力下，在1962年12月举行的捷共第12次代表大会上，指定由德·科尔德领导的委员会来审查50年代的清洗案件。这个委员会揭露了真相，指出审判的案件是捏造的假案，“证据”是被篡改和编造的。科尔德委员会的报告于1963年8月22日公布，打开了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向诺沃提尼统治宣战的闸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作家和记者愤怒抗议和批判当局拖延清除斯大林的错误，阻碍革新过程。

捷克斯洛伐克于1960年7月，在东欧国家中第一个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在“积聚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国名也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但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却与诺沃提尼的愿望背道而驰。由于从1950年起搬用苏联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后，破坏了原来适合本国国情的工业结构，消费品供应不足，并引起通货膨胀。为了转嫁困难，捷克斯洛伐克于1953年实行币制改革，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和抗议。1956年，经济状况恶化，1962年，经济困难进一步加深。财政收入紧张，市场商品短缺，职工的生活水平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在这种形势下，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遭到破产。

改革派发动进攻　击败诺沃提尼

面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诺沃提尼为了控制爆炸性的局势，一方面不得不为大清洗中的一些受害者恢复名誉，另一方面被迫牺牲一些与发动大清洗密切相关的人物。同时不得不宣布要发扬民主，改革经济管理体制。1963年，捷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些委员会，专门从政治、经济等方面研究未来的改革方案。该委员会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经济改革方案，其核心是改变原来的计划管理体制，用方向性的计划取代指令性的计划；逐步向市场机制过渡；改变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扩大同西方的贸易，摆脱对苏联的依附。第二次经济改革方案于1964年为捷共中央和国民议会批准公布。在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诺沃提尼怕继续进行改革危及自身的地位，千方百计阻挠贯彻经济改革措施，并将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推迟到1966年付诸实施。这时改革派认识到，要为改革扫清道路必须进行政治斗争。在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举行捷共第13次代表大会期间，改革派向诺沃提尼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在1967年10月30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围绕如何改善党的领导体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问题，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改革派认为必须对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一套党的领导体制、国家政治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保守派认为现有的一套党的领导体制是行之有效的，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两派激烈争论的过程中，当时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对时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诺沃提尼的错误进行了尖锐批评，主张把诺沃提尼担任的两个最高职务分开。诺沃提尼进行反击，他说杜布切克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并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杜布切克的民族主义问题。由于会议分歧太大，无法统一。全会决定休会，12月继续举行。

诺沃提尼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向苏联求救，请勃列日涅夫尽快到布拉格来为他保驾。但勃列日涅夫当时对捷共领导集团内部这场斗争的真正意义尚不太明了。另外，诺沃提尼曾写信给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被赶下台表示不满，因此勃列日涅夫对诺沃提尼也没有太多好感。他12月8日到布拉格后，同捷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谈话，并且专门到布拉迪斯拉发向杜布切克了解情况。勃列日涅夫甚至在12月9日晚捷共中央主席团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他将离捷回国，“至于你们之间的斗争，这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情，苏联不干涉。”诺沃提尼并不甘心失败，他还与其在军队和保安部门的亲信密谋，企图动用武力来压制党内的改革派。在12月4日，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突然在中捷克、北捷克和西捷克地区举行大规模的冬季演习，目的是对布拉格进行军事包围。诺沃提尼制定计划，如果在12月16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撤销他的职务，军队就开进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等一大批改革派。这一阴谋被总政治部主任普尔赫利克中将以及其他倾向改革的将军制止。诺沃提尼的阴谋败露后，形势急转直下。原来支持诺沃提尼的保守派阵营发生分化，反对诺沃提尼、要求改革的力量迅速扩大，在中央委员会中占了上风。1968年1月3至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撤销诺沃提尼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只留任总统职务，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向全党迅速传达10月、12月、1月三次中央全会的精神，拟定捷共《行动纲领》，指导对党的领导体制和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从而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捷共中央在1月全会上通过的重大决议被称为“一月道路”。

杜布切克指挥“布拉格之春”序曲

杜布切克（1921-1992）为斯洛伐克人，年幼时随父母在苏联生活、学习，接受共产主义教育。1939年加入斯洛伐克共产党。他先后在斯洛伐克担任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委、主席团候补委员，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主管工业的书记，斯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等职务。他作为调查50年代冤案委员会的一员，查阅50年代冤案的档案材料时，看到20年来的暴行和冤案的血淋淋的可怕事实，失声痛哭，决心为他们平反，发誓不让此类历史悲剧重演。他一直与诺沃提尼所奉行的中央集权路线、无视斯洛伐克民族利益的做法进行坚决斗争。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人们把改革的希望、信赖和重任赋予了这位敢于斗争的斯洛伐克人。

1989年11月24日，曾经领导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捷共领导人杜布切克在布拉格瓦茨拉夫广场首次与公众见面，聚集在广场上的25万游行群众向他欢呼致意。

杜布切克出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迅速采取措施，推动改革向前发展。1968年3月底、4月初，捷共中央召开全会，选举了新的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通过了《行动纲领》。接着推举卢·斯沃博达担任共和国总统，约·斯姆尔科夫斯基为国民议会主席，二战前捷共派往西班牙的国际纵队“季米特洛夫旅”的指挥官弗·克里格尔为民族阵线主席，奥·切尔尼克取代列纳尔特出任总理。5月底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9月9日召开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通过新党章，以

完成党的领导体制的改革；制定新宪法，以推动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此同时，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在加速进行。

“布拉格之春”的理论和改革纲领

捷共中央4月通过的《行动纲领》是由经济学家希克、姆林纳日、奥尔斯佩等人起草，通过广泛讨论制定的，它是“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的宣言，捷共新领导的纲领主张，勾画了在捷克斯洛伐克构建民主、法治、和谐、富裕的社会主义蓝图。

《行动纲领》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产生危机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后指出，社会改革是当务之急。要进行前所未有的试验，构建一个新的、十分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的社会主义典型。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要通过抛弃过去的错误，依靠人民的志愿支持，最忠诚地为社会主义发展服务的行动，而不是通过统治社会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领导地位，恢复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党不能靠强迫命令来树立自己的威信，而应该通过党员的工作和理想的正确性来推行自己的路线。

《行动纲领》提出要彻底根除党取代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做法，充分发挥政府、立法机构、经济组织和团体的职能和作用。

《行动纲领》认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是正确实现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主要保证。要充分发挥和保障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机构的作用。权力不要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党的领导人不应在党内和政府内兼职，要保证集体做决定。

《行动纲领》提出改革国家政治体制，把民族阵线作为政治基础，由社会各阶级、阶层、各集团、各民族的代表组成的民族阵线，是社会多元化利益的代表者。从全社会需要和目的出发，通过民主协商，使劳动人民的不同权益，切实得到合理解决。

《行动纲领》强调要铲除过去滥用职权，破坏法制，压制人民的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弊端，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每个人、每个集体、基层和中央的每个管理环节的积极性开辟更为广阔的天地。强调要用法律手段彻底保障宪法所维护的言论自由和公民的一切政治权利和个人权利。

《行动纲领》分析了捷搬用苏联一套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带来的恶果，提出实行新的经济管理体制，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充分尊重客观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商品生产。给企业自主决定的权力，以便使企业能对市场的需求及时、灵活地做出反应。纲领还提出使小私有企业合法化。

在国家体制方面，实行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使斯洛伐克民族和捷克民族享有平等的地位。要在新宪法中彻底解决两个民族的平等问题。

4月《行动纲领》通过后，捷共为大批冤案受害者平反。5月15日成立了联邦筹备委员会和以古·胡萨克副总理为首的起草联邦法草案的政府委员会。

4月《行动纲领》得到全国广泛支持，改革运动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群众因获得广泛民主而迸发出来的激情犹如山洪一样爆发出来。但是，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新领导，从一开始就受到左右两方面势力的阻挠和干扰。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在中央和地方机构中仍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竭力阻挠运动的发展。诺沃提尼仍利用总统身份，频繁接见干部，访问工厂，并不止一次地发表讲话，攻击改革运动，另外还同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频繁接触。保守派势力，还通过写信、组织召开全国万名工人纠察队会议等方式向杜布切克示威，反对新的改革方针。由于保证结社自由，社会上一些人，成立了各种社团，要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如非党人士俱乐部主张按照第一共和国的样板建设人道的社会主义，进行自由选举等。一些人企图通过这些组织，形成与捷共抗衡的力量。另一方面，由于广开言论自由，取消书报检查，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偏激情绪和极端倾向，要求加速改革步伐，对保守派采取行动。由作家瓦丘利克执笔，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科学家、运动员签名的《两千字》声明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一声明敏感地指出苏联干涉的危险正向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袭来，他们表示支持新领导，甚至准备拿起武器，同时呼吁群众采取积极行动，通过做出决议、游行、罢工等方式逼迫保守派分子下台。这给保守派和苏联以攻击杜布切克等新领导的借口。杜布切克等新领导提出在改革运动中，既要反对保守势力的阻挠，也要反对极端自由化倾向，

强调改革运动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在《行动纲领》的基础上，有组织地进行，以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民主原则。杜布切克等捷共新领导人均严肃地批评《两千字》声明对改革运动的顺利进展造成危害。

尽管改革迅猛发展，出现复杂的局势，但是由于捷共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布拉格之春”期间，社会秩序稳定，既未发生反革命骚乱，也未出现无政府状态。

苏联威逼无效　纠集60万大军镇压

随着捷共新领导的改革纲领主张越来越明确，苏联的不满日益加深。它以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为名，打着“保卫社会主义”的旗号，纠集波兰、匈牙利、民德、保加利亚四国，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威逼其放弃改革措施，并且加紧策划武装干涉。3月份，苏联领导人召集除罗马尼亚以外的华约国家领导人到东德的德累斯顿，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对捷共改革派发出警告。

5月初，捷共领导人被召到莫斯科，就捷克斯洛伐克局势问题向苏联领导人做出解释。会谈一结束，苏联领导人立即召集民德、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领导人，举行五国首脑会议，研究对付“布拉格之春”的办法。

6月，苏联纠集上述四国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演习，并以各种借口迟迟不撤走演习部队。勃列日涅夫集团攻击《两千字》声明，是“反革命宣言”，“反苏”，并打电话向杜布切克表示抗议。苏联掀起了对《两千字》声明口诛笔伐的浪潮。

7月8日，杜布切克收到勃列日涅夫、乌布利希、卡达尔、哥穆尔卡和日夫科夫的信件，要求他到华沙参加华沙条约国最高领导人会议，讨论《两千字》声明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威胁。7月9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开会对此进行讨论，以多数票决定拒绝参加这一会议。复信表示不反对召开国际会议，但应先召开双边会谈，澄清事实，增进了解，为会议做准备，并协商会议的日期、地点、参加国等问题。但苏联领导人又迫不及待地向捷共领导人发出到华沙参加共产党最高级会谈的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如同9日的复信一样，主张先举行双边会谈。

7月14日，苏联、波、民德、匈、保五党的领导人举行会谈，15日，五党向捷共发出联名信，称国内外的敌对势力正在使捷克斯洛伐克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而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和大家庭的安全是大家庭各国的共同责任。联名信以最后通牒的口气要求捷共“动用国家防御手段向右派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发动进攻”，“停止一切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控制报刊电视，并且在党内向以行动帮助敌对势力的人开展斗争”，联名信还直接向捷共内的所谓健康力量发出呼吁，要他们动员起来，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

面对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如此粗暴的干涉，捷共的改革派在7月17日以主席团名义发出、后又得到中央全会批准的复信中，捍卫了改革运动的原则，强调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政不容干涉。杜布切克7月18日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反驳对捷克斯洛伐克出现“反革命活动”的指责，强调捷共决不从“一月道路”后退。捷共中央于7月19日举行的中央全会批准了复信的立场。

就在捷共举行中央全会的当天，莫斯科又在两条战线上发动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攻势。当天的《真理报》的报道说，在捷克西部靠近西德处发现了一个埋藏美国武器的地方，另一篇报道称，发现了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文件”，这些文件暴露了推翻布拉格当局的阴谋计划。苏联另一方面的行动是把捷共举行双边会谈的建议接了过去，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于7月22–23日在苏联某个地方——莫斯科、基辅或利沃夫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谈。捷共在答复中拒绝到苏联赴会，并坚持只有在参加军事演习的部队从捷克斯洛伐克领土上全部撤离后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会谈。他们明白，他们要是去苏联就再也回不来了。

鉴于高压未能奏效，苏联同意举行双边会谈。7月2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边境、捷克斯洛伐克一侧的切尔纳火车站的车厢中举行了3天的会谈。在同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苏方要求捷共解除民族阵线主席克里格尔、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

愤怒的捷克民众挡在苏军坦克面前

等人的职务，制止“右派势力”对苏联的攻击。但杜布切克拒绝了对方提出的一切指责，强调这场革命的唯一目标就是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最后双方同意8月3日6国首脑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会晤。这次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似乎是双方的某种妥协，承认各党可以根据本国的民族特点和条件，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的问题，然而声明强调“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但声明在列举大家庭国家间的关系准则时，竟然略去了“互不干涉内政”这个重要条款。据西方侦察到的材料，当时华约已有40万大军部署在捷德边境，在波兰和东德机场上至少集中了300架苏联军用飞机，只要一声命令，就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

正当捷共的改革派以为经过多轮谈判争得了一定的喘息时间之时，8月20日午夜，苏联纠集民德、保、匈、波四国军队，约60万大军，6000辆坦克，在巴甫洛夫斯基将军的指挥下从北面、东北、东面和南面分18路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在24小时内占领了这个国家。苏联塔斯社8月21日发表公告，诡称“苏联和其他盟国应捷克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的要求向捷提供包括武力在内的兄弟援助，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与国外的反社会主义敌对势力相勾结，威胁社会主义制度，触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触及社会主义体系的安全。”

捷党政机构齐谴责　万众一心反侵略

当苏军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正在开会。杜布切克回忆说，在开会期间，他曾得到消息，说在民德与捷边境有苏军调动，但他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以为又是勃列日涅夫在进行恫吓，因此照常开会。但是到了午夜时分，被苏军扣押在办公室中的国防部长楚尔根据苏军的命令向总理列纳尔特报告，苏军已经越过捷克斯洛伐克国境。这一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使他惊讶至极。他说，他一生都致力于捷苏友好，做梦也未想到会遭到如此卑鄙的进攻。

面对残酷的现实，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采取了军事上不抵抗，政治上不投降的做法。8月21日清晨，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声明，指出五国军队在未通知捷克斯洛伐克党政机构的情况下，非法越过捷克斯洛伐克的边境，谴责这一行动不仅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所有准则，而且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政府也相继发表声明，谴责和抗议五国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侵略，宣布不承认占领军委派的任何机构。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工作人员在枪林弹雨下坚持战斗，把党中央、国民议会和政府谴责入侵的声明反复播出，告知全国人民，直至侵略军攻占了电台。在电台无法在布拉格播出后，他们又通过地下广播网络继续播出。恼羞成怒的侵略军千方百计进行破坏，但却无法找到广播的地点，压制这正义的声音。

党中央和政府的声明，在全国点燃了反抗侵略的怒火。全国各地，人民群众同侵略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布拉格市民聚集在市中心的瓦茨拉夫广场和老城广场，怒斥侵略军。数百人用身体阻挡侵略军的坦克开往广播电台。一些青年面对坦克高呼：“你们有坦克，我们有真理！”建筑物的墙壁上刷写上“伊万，滚回去！”等大标语。商店的橱窗装饰了国旗，街名和门牌被涂掉，全国公路上的路标要么抹掉，要么改变其方

向，使占领军犹如瞎子，晕头转向。在捷共一些领导人的策划下，通过电台号召夏天选举出来的1543名捷共14大代表到布拉格开会。8月21日夜晚至8月22日上午有1192名代表，乔装打扮，以各种方式躲过占领军和秘密警察的追查和监视，到布拉格捷卡德工厂举行非常14大。大会选出以杜布切克为首的27人组成的中央主席团，144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大会重申支持改革路线和对杜布切克的信任，并对苏联非法囚禁他及其他几位领导人表示抗议。大会还通过了致全国人民书，谴责侵略，要求苏联撤军。

在人民抗击占领军的同时，一批被群众痛斥为卖国贼的捷共中央的领导成员——中央主席团委员比拉克、科尔德、什维斯特卡，中央书记处书记英德拉、捷共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主席雅克什等约50人在捷共的招待所布拉格旅馆开会，企图拼凑一个由他们组成的领导机构，但在全民抗议的怒吼声中，不仅无人敢于承认他们请求苏联出兵，而且赌咒发誓没有做出卖国家的勾当。他们妄图组成的通敌政府也胎死腹中。

刺刀威逼下的莫斯科协议

8月20日深夜，占领军逮捕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以及总理切尔尼克等人，把他们押往莫斯科。在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中，只有代表国家的总统斯沃博达尚在布拉格的总统府中，侵略军没有逮捕他，不是出于仁慈，而是打算假借总统的名义，任命一个由通敌分子组成的伪政府，为它披上合法的外衣。据外电报道，8月22日上午，巴甫洛夫斯基将军和苏联驻捷大使契尔年科到总统府会见斯沃博达总统，要他承认一个以英德拉为总理的“工农政府”和英德拉、比拉克、科尔德3人组成的党中央领导。他们告诉斯沃博达说，反革命活动在蔓延扩大，盟军对此不能再容忍下去。如果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接受上述建议的话，盟军指挥部别无选择，只好组织占领军政府，迫令斯沃博达辞职，实行军事管制。面对占领者，斯沃博达没有屈服，他告诉苏联人，只要杜布切克和其他几位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仍被囚禁，就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如果这些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不能获释，他就无法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了。他还说，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迫切需要同华沙条约最高领导人会谈。经过3个小时会谈之后，巴甫洛夫斯基和契尔年科同意把这一要求向莫斯科报告。当晚斯沃博达被告知，8月23日他将赴苏联谈判。斯沃博达抵达莫斯科后，围绕捷克斯洛伐克四位领导人的命运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坚持只要四位领导人仍在关押，只要他们不参加谈判，他不会同苏联领导人谈任何问题。他告诉苏联领导人，8月22日在布拉格举行的捷共第14次代表大会一致拥护杜布切克等领导人。经过斯沃博达顽强不屈的斗争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在国内对占领军进行的如火如荼的反抗，勃列日涅夫宣布，“为了苏捷友谊”，苏联政府决定释放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和克里格尔四人。8月24日凌晨，杜布切克等人被带到克里姆林宫。为了在世界舆论面前掩盖侵略面目，勃列日涅夫集团不得不把这些阶下囚“请出来”谈判。

在捷苏联领导人进行的会谈中，苏方提出了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如按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改变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方向，宣布捷共非常14大无效，苏军留驻捷克斯洛伐克，不得要求联合国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实行书报检查制度，将哈耶克外长、副总理希克、内务部长帕维尔、中央书记齐萨日等撤职。在最后一轮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大放厥词，奢谈他的“有限主权论”。他还强调是苏联军队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斯洛伐克的边界就是苏联的边界。鉴于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受到威胁，苏联不得不出兵。参加会谈的杜布切克据理进行了反驳，他坚决维护革新路线，甚至对干涉者进行了控诉。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宣布退会。杜布切克也在会后一再表示，“不签字了”。但在捷方人员的一再劝说下，他怀着保住改革路线的幻想，最后在双方经过拉锯战方才达成的“莫斯科协议”上签了字。杜布切克等改革派虽然在苏联的逼迫下做了很多让步，但仍不承认入侵和占领合法，并坚持“一月道路”和《行动纲领》。

10月4日，杜布切克等又被招到莫斯科，在刺刀威迫下签署了“苏军暂驻捷克斯洛伐克条约”。

这项条约不仅规定，捷需为占领军提供部署

区、住房、机场等等有关设施，而且其军人、家属等有关人员皆可自由出入，不受捷海关的检查，运输的物资不收关税，而且捷方还需要为苏联驻军提供经费。条约规定，捷人民不许反抗苏军，否则视作对苏军的侵犯，并将受到惩罚。而苏联军人在捷不受捷法律制裁。俯视捷克斯洛伐克的地图，可以看到占领军在捷的一条长长的防线，从西部边陲，经过司令部的所在地——距首都布拉格不远的姆拉达-博莱斯拉夫附近，一直延伸到东南部的斯洛伐克地区。根据捷克斯洛伐克“天鹅绒革命”后，苏联公布的撤军人数，在捷克斯洛伐克12.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从西到东在数十个城市中都驻扎有苏联7.3万苏军，近4.5万名文职人员和家属，100多架飞机，1200多辆坦克，30多个战术导弹发射装置。这些武器准备随时用来屠杀反抗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

面对强权，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反抗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10月28日，即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国庆日，布拉格群众举行大规模示威，高喊“俄国佬滚回去！”“打倒勃列日涅夫！”1969年1月，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哲学系大学生帕拉赫为抗议苏军占领而自焚，引发全国对苏联的抗议热潮。1969年4月，杜布切克被解除第一书记职务，由胡萨克取代，开始了所谓“正常化过程”。其他改革派人士也遭到和杜布切克同样的命运。全国共有50万党员遭到清洗。“布拉格之春”被来自莫斯科的严寒摧残。但它播种下的火种仍在这个不屈的民族心中燃烧，搏击严寒，孕育春天。

杜布切克被解除职务和流放岁月

杜布切克回国后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为在强权下遭到的失败和耻辱而难过得多次哽咽。他虽不能公布全部会谈情况，但他明确告诉大家说，“我们失去了行动自由”，今后的活动将在“不仅仅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下”开展。使外国军队尽快全部撤走是一切努力的最重要的目标。他要求大家团结起来。为了暂时稳住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侵略者还让杜布切克再担任一段原来的职务，并从1969年4月至10月还有名无实地担任联邦议会主席。但苏联加紧策划，使拥戴它的人上台。1969年4月，见风使舵的胡萨克抛弃原来支持“布拉格之春”改革纲领的立场，忘却了他是如何从50年代冤案的牢狱中被解救出来，爬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宝座，后又掌握共和国总统大权。他根据苏联的旨意，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所谓“正常化”时期，清洗了50多万支持“布拉格之春”改革纲领、反对苏联侵略的党员。以胡萨克为首的捷共领导集团，为迫害杜布切克，策划把他赶到国外。让他到土耳其任大使。杜布切克在土耳其，处处受到胡萨克派去的人员的监视。就连他赴土乘坐的捷克飞机上的两名航空小姐，也因见到杜布切克夫妇忍不住流泪，并对他们热情招待，回国后就被解雇。杜布切克在土耳其期间，胡萨克力图逼他流亡。当时，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瑞典等国均表示愿意接待他，但杜布切克决心回国。但回国之途受到种种阻挠，捷航不售给他机票。他只有通过在土耳其工作的捷克工程人员，购买了匈牙利航空公司的机票，把夫人留在使馆，佯装他依然在使馆。6月份的一天夜里他偷偷溜出使馆，坐出租车到火车站，买车票到伊斯坦布尔，然后乘匈牙利航空公司的飞机到布达佩斯。杜布切克抵达布达佩斯后，胡萨克集团根据匈方提供的情报早就派人在机场等候他。杜布切克回国后，立即被开除出党。但他感到欣慰的是，他又回到了祖国，和祖国人民在一起，胡萨克集团企图逼他流亡的计划没有得逞。

杜布切克回国后，不得不找工作养家糊口。但是许多招工单位，根据当局命令，都把他拒之门外。这一年的10月份，斯洛伐克当局为他安排了三个他可去工作的单位，最后他只好选择了一个离家稍近的西斯洛伐克林场克拉斯尼亚尼林业管理局，从1970年12月起一直在那里的一个车间修理西方生产的机器。在林场工作期间，常常有两三个特务跟踪他，在他的家门口不论白天黑夜都有警车监视，家中不止一处安有窃听器。信件一律受到检查，国外的信件一律查封。他坚持“布拉格之春”的改革纲领，不断抗议当局对他的攻击和限制，直到1992年逝世。■

（作者为新华社参编部原主任编辑）

（责任编辑　杨继绳）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价	邮费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刘维开	48.00	8.00
蒋介石与国共合战:1945–1949	蒋永敬	刘维开	48.00	8.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49.00	8.00
难忘的非常岁月		陈瑞生	26.00	7.00
启蒙与中国社会转型		资中筠	29.00	7.00
雾霭　俄罗斯百年忧思录(内部发行)		[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	280.00	12.00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上、中、下)		陶菊隐	148.00	18.00
共同的底线		秦　晖	48.00	8.00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78.00	9.00
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88.00	12.00
走进怀仁堂(一)(二)		董保存	70.00	11.00
我眼中的改革		[德]汉斯·莫德罗	45.00	8.00
亲历苏联解体:二十年后的回忆与反思		李慎明主编	59.00	9.00
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		沈志华	58.00	9.00
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雷　颐	32.00	7.00
观念的水位		刘　瑜	36.00	7.00
官僚主义的起源和元模式		孙越生	35.00	7.00
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看待三大战役的		金冲及	32.00	7.00
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	陈铁健	黄道炫	48.00	8.00
国史札记(史论篇)		林蕴晖	38.00	7.00
蒋介石初上台湾岛(1949—1953)	李庆	根志优	58.00	9.00
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		金　雁	68.00	10.00
苏东剧变之后:对119个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左凤荣等	246.00	20.00
超越左右激进主义——走出中国转型的困境		萧功秦	48.00	8.00
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		马立诚	39.00	7.00
金正日与朝鲜		高秋福	36.00	6.00
陈布雷与陈伯达——历史转折点上的两个"秀才"		张希贤	56.00	8.00
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		沈志华	148.00	18.00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赵　诚	38.00	6.00
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	托洛茨基著	施用勤译	58.00	8.00
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		俞可平	45.00	7.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锐著	29.50	7.00
苏北利亚		于　疆	22.00	6.00
《转折》《起点》:亲历中国改革开放	吴思	李晨主编	72.00	12.00
亲历记(一)(二)		吴思主编	58.00	11.00
天下得失　蒋介石的人生		汪朝光等	42.00	6.00
中山舰事件:国共关系史上的秘案		张聿温	32.80	6.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19.00	12.00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150.00	12.00
国家记忆(一)		章东磐	98.00	10.00
国家记忆(二)	章东磐　晏　欢	戈叔亚	88.00	9.00
可操作的民主	寇延丁	袁天鹏	28.00	7.00
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		杨奎松	48.00	8.00
官场怪圈定律		李茗公	46.00	8.00
黄埔恩怨	王晓华	张庆军	38.00	6.00
我想重新解释历史		吴　思	28.00	7.00
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		萧冬连、谢春涛等著	88.00	10.00
读史求实		杨奎松	38.00	7.00
历史的碎片:侧击辛亥		张　鸣	26.00	7.00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共四卷)		金冲及	128.00	12.00
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全七册)		北京电视台卫视节目《档案》栏目组编	216.00	26.00
母亲杨沫		老　鬼	45.00	6.00
血色黄昏		老　鬼	39.00	6.00
血与铁		老　鬼	39.00	6.00
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		老　鬼	38.00	6.00
1911–1912 亲历中国革命		埃德温·J·丁格尔	36.00	7.00
亲历民主　我在美国竞选议员		龚小夏	28.00	6.00
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		史景迁	19.60	6.00
李锐反左文选		李　锐	22.80	6.00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		杨继绳	42.00	7.00
通往立宪之路	刘刚	李冬君	60.00	8.00
1943　一盆红红的火(谢韬日记选编)		谢　韬	49.00	8.00
高岗传		戴茂林、赵晓光	59.00	7.00
西路军——河西浴血、生死档案、天山风云		冯亚光	126.00	12.00
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	陆南泉	黄宗良等	246.00	20.00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		雷　颐	29.80	7.00
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杨奎松	88.00	10.00
底层的叩问——肖复兴人生笔记		肖复兴	25.00	6.00
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内部发行)		乔云华	58.00	8.00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	49.00	8.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6.00	7.00
三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四野名将		吴东峰	28.00	7.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Ⅰ		杨天石	60.00	8.00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 Ⅱ		杨天石	38.00	6.00
"中间地带"的革命		杨奎松	54.00	9.00
烙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		林贤治主编	38.00	7.00
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		朱　正	26.00	7.00
走出个人崇拜		冯建辉	16.50	5.00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薄一波	88.00	11.00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始末		沈宝祥	39.80	8.00
夹边沟记事		杨显惠	34.00	7.00
定西孤儿院纪事		杨显惠	25.00	7.00
军事学院在南京(1951–1969)	钟德东	张利娜	498.00	30.00

图书介绍

《古拉格:一部历史》:　"古拉格"是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的缩写,同时代表着苏联的镇压体系本身。它有一整套被囚犯称为"绞肉机"的程序:逮捕、审讯、用没有取暖设施的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毁灭家庭、常年流放、过早及无谓的死亡。从1929年到1953年的斯大林时代,古拉格死亡的囚犯达270余万人,这个数据仍然没有反映斯大林时代司法制度的全部受害者的情况……。

这是一部古拉格的历史,是一部苏联集中营的历史。无论承认与否,它也是一部斯大林统治期间的镇压史和清洗史。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从建国初至文化大革命历次的政治运动,到处"敌人",遍地冤狱,大量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这段惨苦的历史令人痛心不已。胡耀邦以"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大无畏的精神,以超人的胆识,以"两个不管"打破"两个凡是"的神话,大力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驱散长期笼罩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阴云,使得国家步入新的历史时期,没有他拨乱反正和平反冤假错案,就不会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中国的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雾霭》——俄罗斯百年忧思录:　亚力山大·雅科夫列夫,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前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被喻为戈尔巴乔夫的影子。配合戈尔巴乔夫将苏联带入解体,亦被称为"苏联改革的设计师",曾提出"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建议。

他曾是正统的共产党人,也曾是党内的自由派,既是马列主义者,也是反苏共分子和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曾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宣传者,最后却作了社会主义的掘墓人。

"反斯大林主义"是他思想的主线。对于雅科夫列夫的评论褒贬不一。反对者斥其为"苏共的掘墓人""苏共政治局中的反共产主义者",而自由派却对他赞赏有加。

在他去世后,"这是所有为了自由和民主斗争的人们的损失"——戈尔巴乔夫如是说。

《雾霭》:值得读的一本书。

《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　就蒋介石个人而言,1949年恐怕是其一生中最感屈辱的一年,即使在时隔数年依然是"悲惨""侮辱"。除了自我反省外,在对国民党党员的多次演讲中,他曾以"亡国"来形容当年的处境。

1949年蒋介石下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重庆撤退时,为何下野的蒋介石突然出现在前线指挥战斗并最后撤退,而代总统李宗仁却早早地在香港就医?紧急关头代总统李宗仁为何突然出国?其间,蒋介石如何完成角色转换,从幕后走上前台?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谈判条件,为何被国民党高层认为是"降书"和"罪状"的供认?

不过,换个角度来看,1949年亦是蒋介石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虽然他被指为"失去中国的人",却是建设台湾的奠基者。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北京炎黄春秋杂志发行部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炎黄春秋QQ在线:2368298257

见证历史，传承文化！

——三千元五十本起编印文集自传、家史家谱

沙龙与讲座

1、 老人出书沙龙：凡在本机构签约出书的作者，均可申请举办一期专题讲座或亲友聚会，回味生活、交流心得、分享愉悦！正规出版的组织举办签名售书活动。

2、 寻根修谱讲座：欢迎自荐或推荐家族、姓氏文化研究者、爱好者开办“姓氏文化”或“寻根修谱”讲座，重点讲座我们将在媒体推介。

出版著作　传承文化

家譜傳記 www.jpzjw.cn

服务热线：010-6892 0114　　6252 5116

接待地址：北京中关村海淀图书城“家史·家谱·传记书店”　　邮编 100080

网　　址：《个人出书网》（www.grcsw.com）　《家族出书网》（www.jzcsw.net）

人人出版

全国免长话费咨询
400-668-0650

愿人人都有作品传世

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国内一家从事图书合作出版的文化公司，公司成立以来与多家出版社建立了密切业务关系。

A类出版套餐优惠
（新华书店发行销售）

32开1000册23800元起
16开1000册27800元起

代理出版：

个人出书：诗歌、散文、小说、生平专记、学术著作等。
老人出书：回忆录、自传、诗词、散文、思想理论著作、书画图册等。
家庭出书：家庭照片画册、家史档案、家谱族谱、先辈遗文、家族音像等。
学生出书：优秀作文集、书画作品集、学生纪念集、孩子成长图册等。
学校出书：教学经验谈、教研论文集、名师纪念集、名校成就图册等。
博客出书：个人博客作品集、网络专题作品合集、社区网文合集等。
旧书翻印：旧书急用少量翻印、书刊资料整编重印等。
电子音像：音乐、戏曲、录像摄影、光盘复制、磁带复制等。

另有：合作出书 常规出书 宣传推广 合作教材 录入排版设计 著作/署名/挂名/编著

出书类型：

A类：国内出版社出版，国家标准书号，可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备案查询。可在国内主渠道（新华书店等）发行销售。
B类：无书号出版，用于交流与赠送，不进入书刊发行渠道，数量一般在300册以内

基本价格：

1、大32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三千元，300页印刷100本四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2、16开本：封面用250克铜版纸，赠送勒口，内文用70克蒙肯纸或胶板纸。200页印刷100本5千元，300页印刷100本6千元；排版、设计与增加彩页费用另行计算。
（注：A类型代理出版的书，1000册起印；所有书籍无论开本印量越大越便宜。）

服务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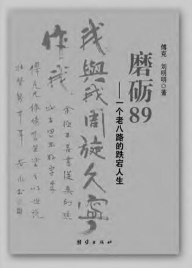
作者来电说明书稿详情（如需要公司寄送参考样书）→公司报价→签约支付定金→电脑录入编排校对→报送出版社(如需正规出版)→出版社三审三较(如需正规出版)→邮寄样书→作者终审签字付款→回邮样书→印刷送书（附赠成书光盘）。

欢迎　“组稿代理”与“项目合作”

目前，中国中产阶层不断发展壮大，传统文化精神逐步回归，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与出版渐成热点；本公司大力开拓民间文化、家族文化的网络数字传播与纸质书代理出版业务。尤其自（学生出版网）（老人出版网）（人人出版网）（出版发行网）开办以来，深受离退休老人与各地文联、作协、民间作者、学校老师和家长的欢迎，每年代理出版作品近百余部；为方便作者就近洽谈与交稿，我公司设立“地方组稿代理”与“编辑出版分站”，请有写作经验与组稿能力的单位或个人洽谈合作。

服务热线：010-57223540　58426176　58608409
传　　真：010—58608407　　投稿邮箱：5805191@163.com
登陆网址：（人人出版网）www.rrchuban.com（自费出版网）www.51isbn.com
（老人出版网）www.lrchuban.com（学校出版网）www.xxchuban.com
公司名称：北京天禾佳诚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邮编:102218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立汤路188号北方明珠大厦三号楼1509室

A类出版作品展示



B类出版作品展示

北京回忆久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eijing Memo99 Culture & Media Co., Ltd.

回忆久久，记录您的真实人生故事

口 述 回 忆 录

画 传 回 忆 录

视 频 回 忆 录

咨询电话：400—688—9999
网　　站：www.huiyi99.com
公司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歌华大厦B座11层1120室，邮编100007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2013年‘回忆久久杯’老年书画、摄影展”。
详情请登录www.huiyi99.com；咨询电话400-688-9999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2013年第7期

"张赵反革命集团"案始末

毛泽东时代的国际报道

对"特异功能"和"人体科学"的高层争论

青海核武基地的劫难

柏各庄农场的劳教岁月

德国：中国的一面镜子

ISSN 1003-1170
07>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8.00 元